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宋代襄陽地區區域研究——
以社會文化為研究中心



指導教授：韓桂華

研究生：趙婉君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地理環境與歷史沿革	18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政區變革	18
第二節 宋代以前襄陽地區歷史發展	29
第三節 兩宋時期襄陽地區的政軍經情勢	38
第三章 社會生活	51
第一節 人口結構與移民	51
第二節 風俗民情與節慶	65
第三節 地方勢力與社會秩序	82
第四章 文化發展	105
第一節 學術教育	105
第二節 藝文成果	126
第三節 宗教與民間信仰	139
第五章 結論	157
參考書目	165

附圖

圖 2-1 襄陽地區地形圖.....	23
圖 2-2 北宋政和元年（1111）京西南路政區圖.....	24
圖 2-3 南宋嘉定元年（1208）京西南路政區圖.....	25

附表

表 3-1 兩宋時期全國諸路戶數與增長率一覽表.....	51
表 3-2 宋代太宗、神宗時期主客戶分析表.....	54
表 3-3 北宋太宗、神宗兩朝襄陽地區各州軍主客戶統計表	55
表 3-4 襄陽地區士人統計表.....	83
表 3-5 襄陽地區鎮撫使表.....	101
表 4-1 宋代京西南路州縣設學暨重修表	108
表 4-2 襄陽地區寺院表	140

謝辭

看著所書寫的文字，印成鉛字，裝訂成冊，內心百感交集。彷彿去年剛撰寫論文時，韓桂華老師對我說的話猶言在耳，的確，當看到論文完成的那刻，有點不敢相信自己達成了這項挑戰。從大學研讀教育與法文，到研究所毅然決然將史學作為研究學科，課業的繁重與研究的艱辛，不禁一度感到茫然、困窘，這一路上得到許多人的鼓勵、支持與建議，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寫成論文，心中感激是難以傾訴。

最要感謝韓桂華老師的細心教導與鼓勵，其亦師亦母對我關懷備至，時時叮嚀我注意時間調配與身體健康，一次次的論文討論過程中，反覆耐心校閱，每每指出我所未能發現的盲點，並為我澄清思緒與疑惑，最是感念。另外，在研究所修業當中，有幸修讀吳智和老師、盧建榮老師的課程，不僅習得論文寫作基礎與寫作方法，更得到思維的啟發以及兩位老師追求與熱愛學問的態度，皆使我獲益良多。而本論文得以順利通過、付梓，則要感謝李天鳴老師撥冗閱讀我的論文，並針對政治、軍事、戰役等方面提出精闢見解與建議，開拓了我的視野；黃繁光老師費心閱讀、不吝指導，在論文寫作內容架構、排版格式、用字遣詞等各方面，皆提出詳盡的建言與指正，使我受益良多；王明蓀老師在小論文其間，先行校閱了論文部分章節，並指出結構上了問題與盲點，讓我得以重新思考論文中的諸多問題疑點。老師，謝謝你們。

得以投身史學研究，是君州的建議與鼓勵，而在人生路上轉了個彎，並且熱心在論文題目、資料蒐集及寫作上，給予不少意見並提供許多協助，真的是非常的感謝。學習及撰寫論文期間，身旁有一群可愛又貼心的好友打氣團，時時給我加油鼓勵，給我莫大的信心及勇氣，崇銘、怡秀、珮文、馥筠、意娟、宥瑜等，生命因為有你，使我的生活總是充滿歡樂。此外論文繪圖幕後大功臣，要感謝與我相識超過十六年的同窗好友宜珮，在日常工作繁忙之餘，花費不少心力及時間為我製作地圖，聽我叨念，反覆修改，以及感謝加豐學長，在寫作資料與地圖繪

製上亦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與你們同在的日子，每一刻都值得記念。

最後，則要感謝我最愛的父母及哥哥，總是作我最有力的後盾，讓我無憂無慮追尋夢想並得以恣意徜徉在學問之海當中，使我有勇氣面對諸多困境與挑戰，謝謝你們！得之於人太多，而付出的太少，因此要感謝的人太多。我想，在草山學習的數千個日子，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美好的開始。

趙婉君 仲夏

撰於華岡大義館

2009. 7. 28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襄陽地區，不僅為歷代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更是聞名古今的軍事重鎮。襄陽之名，始見於漢，時於南郡置襄陽縣。¹而漢大抵因循秦制，或許秦時已有襄陽之名，亦未可知。即便從漢初算起，襄陽之名至於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歷史。其之所以成為歷史名城主要在於地理形勢之殊勝。襄陽位於中國中部，即今湖北省北部，四周高山綿亙，而此處地勢平坦，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水自西北向東南流經其間，形成南北往來的天然孔道。唐代詩人白居易有云：「下馬襄陽郭，移舟漢陰驛」，²是為南船北馬轉運匯集之地，更是「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³交通便利、四通八達之區，明清時有七省通衢之稱。因此，在政治上，襄陽一直是歷代州、郡、路、道、府的治所；經濟上，由於位居南北水陸交通中心，故舟楫往來商販雲集；文化上則兼有南北特點，匯集中原文化及荊楚文化於一身；在軍事上，襄樊峙立於漢水兩岸，據有臨江靠山之險要地勢，被譽為得天下之根本、兵家必爭之地，其戰略價值不言可喻。

兩宋時期（960-1279）政治重心向東南轉移，其社會、經濟及文化發展的重心漸移往東南地區，由此奠定了地域經濟與文化的新格局。而目前宋代區域研究在經濟方面之研究成果仍以史料較多的南方及東南地區較為豐碩；⁴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亦著重於當時政治、經濟中心或人文薈萃之區，如東京開封府、兩浙、四川等地。對於北方區域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探究則多受限於史料，成果較少。本文將研究焦點放在襄陽地區，主要是由於襄陽地區一向為南來北往之重要交通

¹ 參見(東漢)班固，《漢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2版），卷28上，〈地理志八上〉，「南郡」條，頁1566。

²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江南圖書館藏日本活字本，《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8月臺1版），卷15，〈襄陽舟夜〉，頁15上：「下馬襄陽郭，移舟漢陰驛，秋風截江起，寒浪連天白，本是多愁人，復此風波夕」。

³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6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版）卷79，〈湖廣五·襄陽府〉，頁13。

⁴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台北：雲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頁6指出，宋代地域經濟的研究成果最多為兩浙及四川有專著出版，其次為兩廣、江西、湖北、陝西、東京開封府、福建等地。

樞紐，既是軍事戰略要地，亦為南北經濟、社會、文化交匯之場所，古往今來人才輩出。宋人陳亮曾指出，進入隋唐五代，荊襄之地遂為偏方下州，北宋一百多年間，更是降為荒落之地，然其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足以為進取之機，應加以開發，以利於爭衡中國。⁵至於襄陽為何落為荒蕪之地，除了唐末五代戰亂因素外，北宋百年間卻未能有所發展，若以戰爭因素而言，北宋前期為對遼、西夏用兵，兵防重地主要在於河北、川陝西北一帶，相形之下對位處京西南路之襄陽地區而言影響不大；若以經濟來論，襄陽乃地近兩京（汴京與西京洛陽）的腹心地區，南來北往運輸堪稱便利，故北宋時期襄陽地區的社會經濟實際狀況如何？是否有分區發展上的差異？除了戰爭因素外，影響其社會經濟發展盛衰的可能因素為何？或可值得深入探究。而兩宋期間的襄陽，除了在大環境的時空背景下南北經濟與文化重心轉移外，襄陽自身區位角色的轉變——從近京畿的腹心地區轉變為與金人交界之重要邊防地帶，從核心到邊區、和平到戰亂的過程，可以想見對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必有一定的衝擊與影響。

襄陽地區雖為政治軍事重鎮並具有位於南北交界的過渡性與特殊性，然有關歷代襄陽地區的研究成果，相當零散且篇幅有限，且多半著重於政治、軍事、戰略等方面的探討，除了戰略上的價值外，襄陽地區本身的地理環境區位所帶來的優劣及特點顯現在當地經濟、社會、風俗、文化等面向上的發展，及其在宋代整體歷史發展上的角色及價值，仍值得進一步去探究。

故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

其一，以襄陽地區為研究之主體，對其所在的地理環境位置與歷史發展沿革

⁵ (元)脫脫，《宋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版），卷436，列傳195，〈儒林六·陳亮〉，頁12936-12937：「荊、襄之地，……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作一統整性的整理探討。

其二，兩宋時期的襄陽地區在以政治軍事經濟為背景下，對當地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發展的樣貌型態，及其內部發展上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作較完整及全面性的窺探。

其三，試圖將襄陽地區各面向的發展，以宏觀的角度，分析比較此區域在宋代全國性的歷史發展上，具有何種特殊之價值及地位。

二、研究範疇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向是從其地理環境及歷史發展為根本，明其發展脈絡與淵源，並進一步拓展至兩宋時期整個襄陽地區發展之全般面貌。本文研究的範疇若區分為空間與時間兩部分而言：空間方面，以襄陽地區為主體，其他區域則為輔助項目；時間方面則著重兩宋時期的襄陽地區，針對其社會文化等面向發展進行探討。

在研究資料方面，本文所參考的史料方面除以《宋史》、《宋會要輯稿》、⁶《續資治通鑑長編》、⁷《文獻通考》⁸等正史、政書為主要依據外，為免侷限於政事與制度面，亦搜羅宋人筆記小說、詩詞文集、傳記、叢書等資料作為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民俗等面向之參考。由於從事地方與區域性之研究，地方志書成為了解地方發展的第一手資料，因此除參考唐宋地理書與宋元方志，如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⁹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¹⁰王存《元豐九域志》、¹¹王象之《輿

⁶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10月初版。

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新定本，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9月再版。

⁸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以下簡稱《通考》），武英殿本，台北：新興書局，1963年10月初版。

⁹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6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¹⁰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69-47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¹¹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7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地紀勝》、¹²歐陽忞《輿地廣記》、¹³祝穆《方輿勝覽》¹⁴等，亦參酌明清後大量出現的地方通志，如明代薛綱《（嘉靖）湖廣圖經志書》、¹⁵章學誠《（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¹⁶等，以及襄陽地區的府、州、縣志等作為輔助，如明代張恒《（天順）重刊襄陽郡志》、¹⁷吳道邇《（萬曆）襄陽府志》¹⁸等。此外，亦包括石刻史料、遺蹟、地圖等資料並參閱近人研究成果及各類工具書。

在研究方法上則主要運用歸納、綜合及比較分析三種方法。在歸納法方面，此法主要針對本研究地區之相關文獻史料、各時代之地方志書及其相關著作、檔案、地圖等作內容的分析與解讀工作，並進行系統性的整理分類與安排，從而歸納出襄陽一地之環境地貌、經濟活動、社會生活、風俗文化等自然和人文要素及特色，進行區域整體的歷史探討。由歸納之所得，再運用綜合與比較分析法，將研究地區與宋代其他區域之發展相互比較分析，並進一步作整體的歷史考察，進而了解襄陽地區之獨特性、地域性與時代之共通性。

三、研究回顧

本文運用區域研究的概念及方法，故先對中西方歷史學界對區域研究的發展及其趨勢，做一簡介。

（一）有關宋史區域研究方面

1. 西方

¹²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版。

¹³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7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¹⁴ (宋)祝穆，《方輿勝覽》，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7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¹⁵ (明)薛剛修、吳廷舉續修，《湖廣圖經志書》，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20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1991年1版，。

¹⁶ (清)章學誠，《（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據民國十一年(1922)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6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¹⁷ (明)張恒，《（天順）重刊襄陽郡志》，4卷，收入《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明天順三年（1459）刻本。

¹⁸ (明)吳道邇，《襄陽府志》，據明萬曆十二年刊本，8冊51卷，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

西方區域史的研究，受到二次大戰後新史學中法國年鑑學派空間史學的影響，主要透過區域的方法與方法論了解掌握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體歷史。歐美新史學的研究取向對於中國史研究的影響，¹⁹大致要到一九六〇年代才嗅得到些許的轉變，例如何炳棣所撰寫的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s of China, 1368-1953*，²⁰主要研究人口、移民、社會流動史；人類學家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將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例如地理學的中地理論）應用到中國現代史方面，其後並倡導區域系統研究法。真正稱得上地方史的研究則要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七〇年代初期 Philip A. Kuhn 的著作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²¹運用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清代團練組織，帶動其後的研究轉向地方史研究上及社會經濟面向的分析；而 1977 年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所編的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²²集結多篇探討單一城市個案或城市特殊現象的論文，皆應用了大量社會科學方法於歷史研究上，其後八〇年代歐美的漢學家提出不少關於地方史方面的研究論著。

西方有關宋代區域研究興起，亦是直到八〇年才蔚為風氣，區域研究的風氣除了受到施堅雅理論的影響，不過最直接的影響還是 Robert Hartwell 於 1982 年發表的“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中國人口統計學、政治與社會的轉變 750~1550）一文中，對於宋代開封經濟圈人口及社會流動的地域研究，其後引發了不少討論及迴響，開啟了學界對宋代地方史的研究。²³如：1983 年羅文以英文撰寫的《宋代中央集權制度下之四川》從科舉

¹⁹ 關於西方二十世紀的史學發展概況及對地方史研究的發展，可參見艾愷（Guy Alitto）〈論目前在西方的中國地方史研究的趨向〉，《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3 年 12 期，頁 439-468。

²⁰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s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中譯本：何炳棣著、葛劍雄譯，《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 版。

²¹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²² William Skinner(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32. 中譯本：施堅雅著，陳橋驛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²³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JAS* 42: 2, pp.365-442, 1982.

角度論中央與四川地方關係的維繫、²⁴1985 年 John Chaffee 對宋代科舉研究、²⁵1986 年 Hartwell 的學生 Robert Hymes 則繼承其師的理論研究宋元時代江西撫州士大夫的轉型、²⁶Richard L. Davis 從家族史的角度研究南宋明州史家的崛起、²⁷1987 年 Richard Von Glahn 的博士論文研究北宋朝廷和四川瀘州西南少數民族烏蠻間的關係、²⁸1991 年 Paul Smith 的博士論文以宋代四川地區的茶馬貿易為題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等。²⁹

2.日本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中國史的研究仍執世界之牛耳。戰前日本對制度史的研究主要放在制度本身的探討，戰後則是由制度去研究其時代意義及其在歷史發展之主體性，由此在社會經濟史領域興起土地佃僕制度、精英份子的社會流動問題，以及對於歷代叛亂集團的研究。由於對中國史研究方向的轉變，地區性的研究及探討空間差異問題之研究方式，慢慢獲得採用。例如 1940 年岡崎文夫、池田靜夫合著的《江南文化開發史》³⁰等。農業經濟史家天野元之助也在 1962 與 1979 年出版《中國農業史研究》，及 1977 年的《中國農業の地域的展開》³¹中對不同地域加以考察研究。當然在社會經濟史及宗族史方面，除了時間的演變推移外，更需運用區域研究的方法，對地域社會及空間的差異性，做考察及研究，以了解人、事、時、地彼此的關係，因此日本的中國史區域研究也以此類成果為

²⁴ Winston W. Lo, *Szechwan in Sung China :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aipei :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Press, 1982.

²⁵ John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85. 中譯本：賈志揚，《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初版。

²⁶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²⁷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n of Ming-C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²⁸ Richard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2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²⁹ Paul J. Smith,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 the Szechwan tea monopoly and the Tsinghai horse trade, 1074-1224*, Thesis (Ph.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3.

³⁰ 岡崎文夫、池田靜夫，《江南文化開發史：その地理的基礎研究》，東京：弘文堂書房，1940 年。

³¹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東京：農業總合研究所，1962 年；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の地域的展開》，東京：龍溪書舍，1979 年。

多，例如：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³²與《宋代江南經濟史的研究》、³³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³⁴等。

有關宋代區域研究六〇年代以前並不多見，即便是六〇年代以後，也僅有論文而無專著。六〇至七〇年代，日本學者青山定雄等人以不同角度發表過有關區域性研究的文章。七〇年代，伊原弘曾就宋代官戶的婚姻關係做過考察、佐竹靖彥從唐宋變革的角度，考察宋代初年各個地域社會的特質及其變貌。³⁵八〇年代以來，日本宋史學界受到明清鄉紳論論戰的影響，試圖以鄉紳支配論的概念深入探究宋代士大夫層，故八〇年代前後的區域研究，多半以此為中心課題。九〇年代日本宋史學界主要著作為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的研究》，其書主要提出一種新區域觀，認為區域差異可能是由人口移動、土地利用、農業水利、社會菁英流動、社會組織變遷，甚至是政治、軍事、行政建置等因素所形成；其次除運用施堅雅以地文學區分的中國經濟區域外，並加入生態系變遷模式作為考察的依據；最後，則提出了社會間的比較與社會內的比較，尤其社會內的比較為個案及亞區域內考察，佔本書大半，例如考察宋代湖州長期性的生態變遷、寧波區域的內外貿易及紹興地區的水利史等等。

3. 中國

具有現代意義的宋史研究相較於其他斷代起步較晚，直到上世紀二、三〇年代，方才出現相對獨立的宋史研究。五〇年代以前的宋史研究屬於開創期，區域研究尚未成形。五〇至八〇年代間，宋代區域研究在政治環境影響下，主要集中在地方史料典籍的彙整及出版，稱不上有所發展。區域史的相關論著成果仍不脫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型態、概況及地方民眾的抗爭起義事件等議題，此時期比較重

³²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

³³ 斯波義信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1版，據日本汲古書院1988年版譯出。

³⁴ 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京都：京都大學，日中國際共同研究，1988年。

³⁵ 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市：同朋舍，1990年。

要的著作為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³⁶注意到宋代南北地域經濟的轉移問題，研究整個南方地區經濟。³⁷

八〇年代開始，跨領域學科理論研究方法的運用成為趨勢，區域研究開始蓬勃發展，區域社會研究的開展主要借鑒國外區域研究和當代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及方法，為區域社會研究提供理論模式，³⁸由於區域社會史研究範圍廣泛，有關從基層社會制度、宗教與民間信仰及地方宗族、鄉族等研究議題探討國家與社會關係，在中國大陸也成為研究重點，近年來更結合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研究理論方法的研究方式，擴大各級研究區域，並注重區域社會整體的歷史與區域間的比較。

在宋代地域經濟研究方面，總體性的研究，如：漆俠《宋代經濟史》，³⁹從宏觀的角度對綜合區域經濟進行研究，在勞動人口分佈、主要地區的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單位面積畝產量、手工業佈局、區域性市場的形成及劃分諸方面，做出了富價值的論述，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⁴⁰一書，繼張家駒之後，對宋代地域經濟的不平衡問題，作了相當深入的論述，對兩宋區域經濟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討。單一區域的社會經濟研究上，以兩浙最多，四川方面亦有專著出版，其次為兩廣、江西、湖北、陝西、東京開封府、福建等地，也有專題文章專著發表，如：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⁴¹對宋代四川經濟作了盡可能詳細的論述，他與周原孫合撰的《四川通史》第四冊，⁴²又在此基礎上對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面，以及宋代四川在四川通史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全

³⁶ 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台北：帛書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³⁷ 黃寬重，〈宋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頁67-90。

³⁸ 許多歐美區域研究的論文與論著成果被引進歷史學界，如：德國的中地理論、美國學者施堅雅的區域系統分析理論等，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理論及方法被運用在中國區域研究新方向上。此外，早期海外中國學者的論著也被翻譯、再版或重獲重視，如：社會人類學家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2月，重印 London：Allen & Unwin, 1936。

³⁹ 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版。

⁴⁰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台北：雲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

⁴¹ 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1版。

⁴² 賈大泉、周原孫，《四川通史（五代宋元卷）》冊4，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1994年1版。

面論述。林文勛《宋代四川商品經濟史研究》⁴³和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⁴⁴兩書，著重論析宋時兩個重要的地區性市場。在文化教育科技方面，如：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⁴⁵一書，旨在論宋代文化在地域上的差異，對南北宋文化重心的轉移與各區域的文化發展有所闡述；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⁴⁶等。學位論文方面主要有：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⁴⁷陳曦《宋元時期江漢平原經濟開發若干問題研究》；⁴⁸廖寅《宋代兩湖地區民間強勢力量與地域秩序》、⁴⁹陳麗霞《溫州人地關係：960-1840》、⁵⁰金強《宋代嶺南謫宦研究》⁵¹等。

另外，在八〇年代中期興起的古代城市研究方面，傳統視角主要在考古發掘、歷史地理、地方史方面，新方向則在於強調城市的特點，把城市作為整體的特殊區域來探討它的結構與功能，並注重城市人群、城市的發展與變遷、城市管理、行會組織、城市風俗與文化等面向，對城市史研究有了一定開展，如：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⁵²是古代城市研究的重要著作。歷史學的市鎮研究除了重視傳統的經濟問題外，也把視野擴展到整體探討，取得了重要成果，除了特定地區的研究外，斷代性市鎮研究則有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⁵³

4.台灣

⁴³ 林文勛，《宋代四川商品經濟史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1版。

⁴⁴ 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1版。

⁴⁵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1版

⁴⁶ 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版

⁴⁷ 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4年。

⁴⁸ 陳曦，《宋元時期江漢平原經濟開發若干問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4年。

⁴⁹ 廖寅，《宋代兩湖地區民間強勢力量與地域秩序》，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年。

⁵⁰ 陳麗霞，《溫州人地關係：960-1840》，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年。

⁵¹ 金強，《宋代嶺南謫宦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4年，將宋代的貶官制度與嶺南社會環境相結合，對兩宋政治史的演進和波動、宋代嶺南的發展狀況以及謫宦心態加以探討，並藉身為外來族群的謫宦對嶺南社會經濟發展加以闡述，可謂除了從制度面探討外亦兼及社會經濟與心理層面的多面向研究。

⁵²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2月1版。

⁵³ 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1版。

台灣史學之發展，⁵⁴五〇至六〇年代中期主要受中國近代傳統史學「史料學派」的影響，以中國史為研究中心，此一時期史語所學者全漢昇在研究宋代經濟史方面，吸收西方經濟理論，先後編成《中國經濟史論叢》和《中國經濟史研究》論文集，⁵⁵涉及了宋代農業、商業、行會、市場、貨幣、物價、漕運、經濟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貿易、寺院經濟等諸多問題，對於近代的宋代經濟史研究有所開創。其後，自六〇年代以來，西方史學思潮傳入台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歷史研究，造成社會史的興起，此後研究領域日益擴大，尤其是社會經濟史更是成為研究主流，如梁庚堯的宋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等。

台灣之宋史研究，1963 年在美國學者劉子健連絡推動下，成立宋史座談會。介紹歐美、日本宋史研究概況及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使研究方法與學術方向更為多元，並出版《宋史研究集》，迄今已出版三十六輯，進一步推動宋史研究在台灣的發展。而宋史學界亦集結出版大量專著和論文集，主要研究方向為宋代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人物學術、工具書的編纂與古籍出版。

八〇年代由於宋史研究與歐美日本漢學界往來頻繁，拓展新的研究議題，在社會經濟、軍事政治及教育學術為主要研究領域。在社會史方面議題尤其廣泛，運用各類型史料與文本，結合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對於地域集團、區域社會經濟、社會組織與階層、地方秩序、家庭與宗族、生活方式、城市等主題，選擇若干重點長時段的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討或跨地域的比較研究，成為新的研究趨勢。

⁵⁴ 王晴佳，《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台北：麥田出版，2005 年 5 月初版），一書將台灣史學的發展變化主要區分為三個時期：首先從 1950 年至 1960 年代中期，代表台灣史學初創期，其發展受政治環境主張復興中華文化及中國近代傳統史學「史料學派」的影響，主要以中國史為研究中心，而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成為研究重鎮，同時並與美國學術界保持關係；第二個時期大致從 1960 年代中期至 1987 年，西方史學思潮傳入台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歷史研究，造成社會史的興起，而史學領域的擴大，又轉向地區史研究，進而發展出台灣史；1987 年以後為第三個時期，台灣史逐漸成為顯學，此外為生活文化史的勃興，研究的角度由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制度史等公領域議題，轉向關心邊緣、女性、弱勢、下層、家庭、日常生活等私領域議題。

⁵⁵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2 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年初版；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1976 年初版。《中國經濟史論叢》收入各學術期刊上登載的論文及書評三十三篇，若干篇未及編印入前書的論文及專刊共二十一種，再輯印為《中國經濟史研究》。

台灣地區宋代區域研究方面，專書部分有：俞垣濬《北宋前期太湖流域賦稅之研究》。⁵⁶論文部分主要為兩浙路與四川之研究為主，如：林敏明〈宋代對兩浙路的經營〉，⁵⁷分述兩浙路行政區劃與地方建設、經營繁榮與人才勃興。林天蔚〈南宋時四川特殊化之分析〉，⁵⁸分別就四川宣撫使、類省試以及總領所財權之特殊來討論。葛紹歐〈北宋對四川的經營〉⁵⁹就軍事、經濟、政治三方面來討論。

學位論文主要為宋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以福建、四川為主，如：蔡尤惠《宋代福建路的對外貿易》、⁶⁰俞垣濬《北宋前期（978~1067）太湖流域賦稅之研究》、⁶¹李錫全《南宋福建路的經濟活動》、⁶²陳家秀《區域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之關聯：探討宋代成都府路》；⁶³宋代地方家族、宗族研究為何晉勳《宋代地方士大夫家族勢力的構成——以鄱陽湖地區為例》、⁶⁴蔡惠如《南宋的家族與賑濟：以建寧地區為中心的考察》。⁶⁵此外，政治軍事與對外關係的研究有：楊宗霖《宋代嶺南的對外關係》、⁶⁶曾冠雄《從化外到門戶——論政權南移與南宋廣西的發展》、⁶⁷梁賢章《宋代邕、宜、融、欽、廉五州控管西南地區的軍事與經貿政策》。⁶⁸

⁵⁶ 俞垣濬，《北宋前期太湖流域賦稅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年。

⁵⁷ 林明敏，〈宋代對兩浙路的經營〉，《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8期，1996年。

⁵⁸ 林天蔚，〈南宋時四川特殊化之分析〉，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十六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7月初版），頁599-645。

⁵⁹ 葛紹歐，〈北宋對四川的經營〉，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十六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7月初版），頁523-597。

⁶⁰ 蔡尤惠，《宋代福建路的對外貿易》，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

⁶¹ 俞垣濬，《北宋前期（西元九七八-一〇六七）太湖流域賦稅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⁶² 李錫全，《南宋福建路的經濟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⁶³ 陳家秀，《區域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之關聯：探討宋代成都府路》，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⁶⁴ 何晉勳，《宋代地方士大夫家族勢力的構成——以鄱陽湖地區為例》，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⁶⁵ 蔡惠如，《南宋的家族與賑濟：以建寧地區為中心的考察》，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⁶⁶ 楊宗霖，《宋代嶺南的對外關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⁶⁷ 曾冠雄，《從化外到門戶——論政權南移與南宋廣西的發展》，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⁶⁸ 梁賢章，《宋代邕、宜、融、欽、廉五州控管西南地區的軍事與經貿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二）有關宋代襄陽地區研究方面

由上述區域研究之發展及其趨勢，大致可看出研究成果仍以明清時期的地方社會經濟、地方組織及宗族方面的議題為多，宋代區域研究則多以四川、福建及東南沿海地區之社會經濟史為取向。本文所探討的襄陽地區，其相關的研究成果仍相當有限，因此以下的研究成果將不拘泥於一時一地，然儘可能條列與論題有關之襄陽地區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之發展研究，並進而擴大到現有相關研究資料，作全面性的回顧與探討。為俾於了解現有之研究成果，筆者依本研究項目，將相關研究成果劃分成四類，以利評述。

1.政治軍事

由於襄陽地區歷代為軍事重鎮，故有關兩宋時期襄陽地區的研究成果，多以政治軍事方面研究為多。在專書部分如李天鳴《宋元戰史》、⁶⁹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⁷⁰等。單篇期刊論文方面，如匡裕徹〈淺析宋元襄樊戰役勝敗的原因〉、⁷¹黃寬重〈宋元襄樊之戰〉、⁷²何忠禮〈試論南宋孝宗朝初年與金人的和戰〉、⁷³傅駿〈端平年間京湖襄陽地區的戰事〉、⁷⁴方震華〈賈似道與襄樊之戰〉⁷⁵等，主要皆著重在襄陽地區於宋金間或宋元間所發生之戰役，在歷史中的勝負因素與地位的探討。學位論文方面如李天鳴《宋元襄樊戰役之研究》、⁷⁶石文濟

⁶⁹ 李天鳴，《宋元戰史》四冊（台北：食貨出版社，1988年3月1版），是一部個別戰爭史，由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至宋帝昀祥興二年（1220-1279）南宋滅亡為止，六十年間宋元爭戰之歷史，論述爭戰經過、軍隊戰備、政府組織、攻勢戰法等，章節末尾則是對戰事作總檢討，內容十分詳盡，並有附圖以供參照。

⁷⁰ 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

⁷¹ 匡裕徹，〈淺析宋元襄樊戰役勝敗的原因〉，《歷史教學》，1984年4期，頁13-16。

⁷² 黃寬重，〈宋元襄樊之戰〉，收入氏著《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豐，1985年8月初版），頁1-18，其文旨在說明宋元交戰襄陽實為宋代興亡之關鍵，先論襄樊形勢與南宋經營策略，次以襄樊戰役為核心論述宋元交戰之始末，末以雙方勝敗之因與評呂文煥功過為結語。

⁷³ 何忠禮，〈試論南宋孝宗朝初年與金人的和戰〉，《浙江學刊》，1998年6期，頁102-106。

⁷⁴ 傅駿，〈端平年間京湖襄陽地區的戰事〉，《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1期，頁95-101。

⁷⁵ 方震華，〈賈似道與襄樊之戰〉，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三十四輯》（台北：蘭臺出版社，2004年7月初版），頁131-152。其旨在透過賈似道對襄陽地位之看法及其在襄樊之役（1268-1273）期間的作為，釐清襄樊之戰與南宋政局發展間的關係，其得出襄樊失守雖權臣賈似道難逃責任，然而南宋缺乏人才提供具體戰略、邊將間的不合、主政者的貪於安逸等皆是促使國勢日益敗壞、南宋最終亡滅之因。

⁷⁶ 李天鳴《宋元襄樊戰役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6月。

《南宋中興四鎮》、⁷⁷馬繼業《宋代城池防禦探究》⁷⁸等主要仍著重軍事戰略上的研究。

2. 歷史地理

有關襄陽地區地理環境與歷史沿革之研究，在區域通代的著作中為多，如：湖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著《湖北簡史》；⁷⁹王瑞明《湖北通史·宋元卷》⁸⁰以各朝代先後次序為經，湖北地區分區為緯，將湖北地區之地理環境、歷史沿革、行政區劃，重要戰事起義、社會生活文化等做一簡介。一類屬歷史地理概論類著作，如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⁸¹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⁸²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⁸³等；在地方志方面，如湖北省襄樊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襄樊市志》、⁸⁴姜道章《湖北棗陽鄉土志》⁸⁵等近人著作，雖編纂上以近、現代之地方發展為紀錄要點，然論述上必先統整本地地理環境、發展沿革與行政區劃等

⁷⁷ 石文濟，《南宋中興四鎮》，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4年6月。本論文主要探討南宋初期沿宋金交界區的抗金四大軍區之形成與罷廢，雖兼及四鎮之軍事措施、行政財政社會措施及四鎮之內外關係，然主要在於制度面之施行與軍事戰略之探討，關於襄陽地區一帶僅散論在各章節中。

⁷⁸ 馬繼業，《宋代城池防禦探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5年4月），分別根據不同作戰對象與城池防禦的階段性特點，分成宋遼、宋夏、宋金、宋元四個階段；與襄陽有關的在宋金部分有以《襄陽守城錄》論南宋後期守城理論；宋元部分則有荊襄城池體系的崩潰以及襄樊戰役所採行的防禦戰略及影響。

⁷⁹ 湖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湖北簡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2月1版），頁189-224第六章宋元湖北地區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有關宋代襄陽地區主要為第一節論宋代湖北的政治及南宋時其抗金、抗蒙之戰役；第二節為宋代湖北經濟的恢復及發展，分農業、礦業、手工業、商業、城鎮、人口、人民生活等子題簡述；第四節為宋元時期之湖北文化與風俗，其中論及宋代荊襄地區文化教育及社會風俗等活動。

⁸⁰ 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9年6月1版。

⁸¹ 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1990年5月1版。

⁸² 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台中：高文出版社，2004年1版。

⁸³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將全國分為八區共八章：西北、西南、中原、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南沿海、嶺南、東北、蒙古地區，每章均分四節，分別為歷史自然地理概況、歷史交通地理、區域經濟開發與城市、歷史文化景觀，章節比重及內容各依其區域本身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⁸⁴ 湖北省襄樊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襄樊市志》，武漢：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初版。

⁸⁵ 姜道章，《湖北棗陽鄉土志》，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06年7月初版。作者將多年蒐集而來之棗陽文獻與歷代方志整理而成此書，除棗陽歷史地理沿革概述外，內容多描述棗陽城市人口風物等現狀。棗陽宋時屬襄陽地區，本書卷一即分朝代敘述棗陽的建置與行政區劃之演變。

歷史背景，可作為了解前朝歷史之參考。至於期刊論文方面，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發展旅遊與古蹟保存工作，故有關襄陽之研究成果多侷限於城市定位、建城考辯等範疇，⁸⁶雖對於襄陽地區歷史沿革發展有基本的認識，然未能在史料基礎上深入探討殊為可惜。

3.經濟活動

宋代經濟活動發達，研究成果亦多，除通史類或通論性的專著如：程有為、王天獎主編《河南通史》、⁸⁷漆俠《中國經濟通史·宋代經濟卷》⁸⁸等外，經濟活動尚可細分諸多面向，如人口、移民、農林漁牧、手工業、商業貿易、交通等，而各方面的專書與論文亦十分豐富，如：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⁸⁹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中國移民史》、⁹⁰江立華等《中國流民史·古代卷》、⁹¹張錦鵬《宋代商品供給研究》、⁹²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

⁸⁶ 此類期刊論文如：白俊奎、張學文，〈襄樊市「樊」城得名新探——兼論廩君系巴人的起源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總 22 卷 6 期，2001 年 6 月，頁 69-73；柯美成，〈襄樊建城考辨〉，《襄樊學院學報》，24 卷 6 期，2003 年 11 月，頁 93-96；杜漢華，〈襄樊旅遊的形象定位與開發〉，《襄樊學院學報》，25 卷 3 期，2004 年 5 月，頁 90-93；魏平柱，〈樊城建城考辨〉，《襄樊學院學報》，26 卷 1 期，2005 年 1 月，頁 94-96；王先福，〈鄧城—樊城演進歷程考〉，《襄樊學院學報》，28 卷 1 期，2007 年 1 月，頁 82-85。此外，丁寶齋編，《襄樊名城保護與建設》（出版地不詳：人民出版社，1993 年 9 月 1 版），則為單篇文章集結成冊，主要論襄陽地區歷史文化特色、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與歷史沿革政區變化等議題。

⁸⁷ 程有為、王天獎主編，《河南通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1 版），第三卷為宋金元明清時期，章節大致以斷代分論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社會生活各個面向。宋時京西南路的唐、鄧二州屬河南境內，故亦須參考河南地區的相關文獻。例如頁 70 指出唐鄧間多產水果大柿、頁 81 指出神宗元豐元年鄧州產鐵及頁 86 指出唐州產硯、頁 275 指出金朝在河南蔡、唐、鄧州等地設有榷場與宋方貿易等。

⁸⁸ 漆俠《中國經濟通史·宋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 年 1 月 1 版。

⁸⁹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 版。

⁹⁰ 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中國移民史》卷 4，宋代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初版）。第八、九、十章，由吳松弟撰寫，其內容大致同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初版）第二、三、四章之內容，其餘第六至八章則論移民對南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影響。

⁹¹ 江立華、孫洪濤，《中國流民史·古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 月 1 版），對歷代流民潮、流民發生原因及流向、生活方式與歸宿、影響與政府對策分章論述。第一章第五節宋元時期的流民，頁 47 指出宋代多次減免租賦，招集鼓勵農民墾荒種地，並取得一定成效，如京西唐、鄧一帶原是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後經地方官招集，流民自歸，及淮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為膏腴；另頁 49 則指出南宋頻繁的戰爭，使大量北民南遷，如蒙軍攻打南宋，襄陽一帶難民多南遷江陵。

⁹² 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1 版），以宋元朝代分上下編，宋代上編為十章，分官、民營手工業、紡織、礦冶與金屬加工、鑄錢、建築、

卷》⁹³等。

如前所述，早期在學者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一文，將全國經濟分區討論水利問題後，區域性的經濟發展開始被探討。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雖其章節劃分仍以農業、手工業、商業及物資流通、財政等各經濟活動面向探討，然其主要將宋代地域以政區劃分，先論各地生產環境，再以各項經濟活動論各區域之發展狀況及其主要特徵，末尾探討各地域經濟之歷史變化，除了強調局部區域之特點，並著重各區域在宋代全國中經濟地位之比較，對於襄陽地區所屬京西南路而言則多所散論其中。

研究襄陽地區經濟活動方面，最重要的屬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⁹⁴以宋代襄陽地區之襄陽府轄地為研究區域，包括襄陽、鄧城、穀城、宜城、中廬、南漳六縣，大致相當於今湖北襄樊市範圍。研究內容則聚焦在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先論工商業基礎之農業和漁業發展，再探討本區手工業，如紡織業、漆器製造業、造船業、釀酒業等，以及商業貿易、市鎮、貨幣、水陸交通等。此外，對於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特點，作歷史的縱向考察與宋代江漢平原範圍內的橫向考察，最後歸結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受軍事刺激興盛起來，也因戰火連綿而重創。

4. 社會文化

介紹宋代社會文化生活等通論性著作較多，如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⁹⁵《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⁹⁶姚瀛艇《宋代文化史》、⁹⁷陳高華、徐吉軍等著《中國

軍器製造、造船、食品加工、製鹽、造紙印刷、瓷、漆器業等項目，對其經營管理、生產技術、生產地等加以描述；在地域性的產業經濟介紹方面，並未系統性的介紹，而是以某產業為主軸，進而舉出某地為主要產地及其生產情況，例如以襄陽所在的京西地區而言，散論於部分章節。

⁹³ 張錦鵬，《宋代商品供給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1版。

⁹⁴ 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7年6月。

⁹⁵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

⁹⁶ 朱瑞熙等著，《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8年8月1版），考察遼宋西夏金時期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內容廣泛涵蓋食、衣、住、行、宗教信仰、婦女、醫療保健、家族、節日、喪葬等，如頁191指出火葬習俗在宋代流行甚廣，其據《馬可波羅行紀》所載襄陽府大城等地皆有人死焚其屍的習俗、頁256則指出宋代亦有巫師活動，如鄧城縣有巫師，能

風俗通史·宋代卷》⁹⁸等，僅能得到全國性的社會文化概況，對地方性區域性的描述，多為個別例子；部分論著或單篇散論某項社會生活、文化技藝、習俗節慶等再將之集結成冊，或以宋代首都及城市為中心，描述城市中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民俗、生活等各個面向⁹⁹，這些論著中有關襄陽地區之研究則不多見。將宋代全國作區域性之文化研究則以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一書最具有系統，其主要以宋代行政區劃作為地域文化上之分區，所探討範圍則包括風俗、文化、人材、教育科舉、宗教、學術、藝術等，其除了分析各地域之文化發展概況與特點外，探討重點主要在於南北文化之比較，襄陽地區於此書中屬北方京西路分，在各章節中皆有比重不同之散論，提供廣泛性與地方概況之參考。

由於社會文化的層面廣泛，如學術教育、書院科舉、風俗民情、宗教信仰、詩畫藝術等，皆有相關專著與大量論文，除了全國通論性的專著外，近年來中國大陸地區出版大量地域文化專書，多以歷史地理學為中心作文化探討，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襲或俗成的歷史區域，隨時代變遷其疆域界線變得模糊不，僅剩大致區域範圍，然而其地域概念卻轉化為文化疆界的概念，如齊魯文化大致為山東，中州或中原文化為河南一帶發展出的獨有文化。以襄陽地區而言北部唐州、鄧州一帶大致是中原南陽文化之延續，南部則受到荊楚文化的感染，因此此類地域文化的論著中對襄陽地區社會文化風俗有所描繪。若僅侷限在兩宋時期社會文化的區域性研究而言，仍多集中在南方與東南經濟文化富庶之區，對於襄陽所在京西地區亦是偶有散論於專著論文中，故在此不逐一列舉。

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

⁹⁷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1版。

⁹⁸ 陳高華、徐吉軍主編，《中國風俗通史》冊7，〈宋代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版），如第一章飲食風俗，頁65-67指出農民的飲食由於統治階級的剝削，就算幸而收成，大半收歸官府地主已非己有，故難以溫飽，常靠野菜草根等為生，然也有食盡之時，故難逃飢餓凍餒至死的命運，此種現象就算在京師及其附近兩淮、荊襄地區也同樣存在。

⁹⁹ 前者如尚園子、陳維禮編著，《宋元生活掠影》，瀋陽：瀋陽出版社，2002年1月1版；後者則如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2版），主要以宋代開封、洛陽、臨安、建康等城市的經濟、文化、民俗及政治各個領域，展現一幅連綴的城市生活長卷。

四、預期成果

（一）採區域研究方法對襄陽地區更深一層的認識

區域史研究的方法，主要依據某些自然和人文要素為指標，而將地表空間劃分成一系列的地理區或特定區域，然後針對區域內的各種相互關聯現象，包括自然環境的地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以及人文活動的人口、經濟、交通、聚落、政治、社會、文化等，結合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及方法，進行整體性的歷史探討。襄陽地區的研究是呈現點狀分散或片面的資料，因此應歸納蒐集相關史料及研究成果，從更多不同的面向與視角研究探討，以期能對襄陽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二）除襄陽地區以外與其他地區能有所對照分析

中國疆域遼闊，各地域人文與自然風貌不盡相同，區域間發展或快或慢，並非處於平衡狀態，區域研究就成了對各地區深入瞭解的一大研究途徑。然而區域研究除了內部發展的瞭解與探究外，應更與其他地區相互比較，透過比對得以開闊視野，從而獲取對研究區域歷史發展的新角度，避免陷於狹隘的地方史研究。

（三）得出兩宋時期襄陽地區獨有的價值與地位

試圖將襄陽地區置於宏觀的角度，除了在空間上擴大視角，以瞭解研究地區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亦須將研究區域置於長時段的歷史時序中，在不變中求其變，在宋代三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得出襄陽地區在社會、文化等不同面向上，有何特殊的價值與地位。

第二章 地理環境與歷史沿革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有疆域變遷和政區調整，特定地理概念和行政概念在不同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時期也有變動。因此，為研究之便，有必要首先明確宋代時期襄陽地區的地理範圍和行政轄屬。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政區變革

一、地理環境

宋代地方行政區畫基本上分為路、府或州（軍、監）、縣三級，本文所討論的襄陽地區，在行政區畫上意指宋代京西南路所轄州縣。北宋時期，其地理位置大致位於今日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與西北部間之地帶，居整個北宋國土的中央略偏西，地近京畿腹心區域，地跨南北，據交通地利之便；南宋時期，秦嶺、淮河以北，盡為金人所據，京西南路所轄唐、鄧二州（今河南省南陽一帶）均沒入金國之手，故地理範圍大致為丹水、桐柏山以南至荊山、大巴山以北間，居整個南宋國土之北疆，亦即從北宋時期的中心區域轉為與金國交接之沿邊重地。

京西南路轄下的襄陽地區大致由四個地理區所構成：其一為京西南路的東北部的唐州、鄧州、隨州西北部的棗陽縣一帶、光化軍一帶，地理上是屬於南陽盆地的範圍；其二為整個襄陽府、襄州屬位於漢水中游的襄樊平原；其三為東南部的鄧州屬部分的兩湖盆地；以及西部的均州、房州、金州屬於位在秦嶺巴山區間的漢中盆地。地理位置上，若以襄樊平原居其中，北連南陽盆地與華北黃淮平原，西北接秦嶺山地，東南為江漢平原與兩湖盆地。

地形上，南陽盆地西部、北部為伏牛山脈，東北部有方城山，東南是桐柏、

大別等山組成的淮陽山脈，¹⁰⁰中央為堆積平原。盆地南與襄樊盆地相連，為一向南開口之扇形山間盆地，盆地東北，由於伏牛山脈東延至方城東北驟然陷落，沒於黃淮平原中，形成盆地的東北角有一缺口，為著名的「南襄夾道」，亦稱「方城廊道」。¹⁰¹而鄂豫川陝交界的大巴山及其支脈武當山、荊山及襄陽東部的桐柏山連接淮南的大別山，山勢陡峻，東西向綿延千里，將湖北、河南截然分開，唯襄陽及其周圍地勢較為平坦，漢水自西北向東南從此處平穩流過，形成一個天然孔道。方城、南陽、鄧州至襄樊一線，自古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間的往來孔道，方城與襄陽各為南北通衢的北口與南口，往昔由豫入荊，或由荊入豫，必經此兩大要口，因此，襄陽自古以來便是水陸的要衝，¹⁰²南船北馬的分途站，¹⁰³交通之樞紐，軍事上的捷徑。若由方城山口出擊，可以橫掃黃淮平原，直趨山東；亦可經由丹水越熊耳山，向東進攻洛陽，或北攻虢州；西北面逆丹水而上，過藍關（今陝西藍田東南）可達長安；西面從漢水逆流而上，可直搗漢中；西南面進向歸州（今湖北秭歸），可封鎖長江三峽，掌握四川的門戶；往南沿著漢水順流直下長江越過江陵（荊南），進向長江，可以控制兩廣。¹⁰⁴可見襄樊之重要性即在控扼南北，以南陽盆地為起點，沿漢水向江面展開，有利於大部隊騎兵護行兩岸，水陸互相連絡聲援，以攻滅東南政權為目的的大規模戰略行動，自以沿漢水中路南下為便；若由長江中游地區進取中原，由襄陽出發，既可由漢水西制漢中，又可從武關北出關中，還可東出許昌以爭中原，¹⁰⁵在戰略上的確為進之可圖中原，退之可固東南，故歷來總成為南北政權軍事上必爭之地。

¹⁰⁰ 王益匡，《中國地理》（台北：國立編譯館，1970年10月臺七版），上冊，頁15。

¹⁰¹ 南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陽市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1版），頁63。

¹⁰²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79，〈襄陽府〉，頁3370。

¹⁰³ 王益匡，《長江》（台北：正中書局，1957年7月初版），頁68。

¹⁰⁴ 王益匡，《中國地理》，下冊，頁497-498。

¹⁰⁵ 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頁303。

圖 2-1 襄陽地區地形圖.....	23
--------------------	----



圖 2-2 北宋政和元年（1111）京西南路政區圖.....	24
--------------------------------	----



圖 2-3 南宋嘉定元年（1208）京西南路政區圖.....	25
--------------------------------	----



在水文方面，襄陽地區主要為平原盆地地形，故境內河川多呈輻輳狀匯流於一。襄陽區域內最主要的河川漢水，今稱漢江，古名沔水，¹⁰⁶發源於陝西省西南部，自白河縣流入湖北省境，向東流經鄖鄉（今湖北鄖縣）、武當，再往東南流，於均口（今湖北均縣）附近有均水從東北匯入。下流至築陽（今湖北穀城）有粉水自西南匯入，接著再往東流過襄陽縣北面，其東合檀谿水，漢代應劭曰此水即為襄水，由於襄陽位於襄水之陽，故得名。往東南又有敖水、白水等支流匯入，漢水主流流至當陽縣章山東面，繼續流至潛江東南與夏水於沔陽合流，再往東南流則至漢陽（今湖北武漢）最終南流注入長江。¹⁰⁷全長約一千五百三十二公里，為長江最大支流。

襄樊平原與南陽盆地同屬漢水流域，不同的是襄樊平原直接由漢水沖積而成，而南陽盆地內的河川則是由白河、唐河及其他漢水支流所構成，在襄陽東面的宛口匯入漢水。¹⁰⁸白河，即古稱滸（育）水，導源於崧縣南境，經南陽城東，南流經新野，至襄陽東方注入漢江，流長二百八十公里；唐河，古稱比水，導源於方城北方的伏牛山中，南流經過社旗、唐河縣，最後與白河匯流。湍河，亦稱湍水，導源於內鄉北方之外方山，南流經新野東南，與白河會合。¹⁰⁹白河水系之規模雖不如漢水，但也頗有航運之利，南陽至襄陽一帶可通舟楫。¹¹⁰

氣候上，呈現南北過渡性特徵。偏北部為溫帶乾燥氣候，近南部則副熱帶溼潤氣候表現較為明顯，兼有華北與華南氣候的特色。據研究，此區域介於秦嶺與淮河一月攝氏零度等溫線分界之間，南陽、漢中盆地氣候近似，然漢中盆地屬中

¹⁰⁶ (後漢)班固，《漢書》，卷 28，志 8〈地理下〉，頁 1609 注釋：「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可知沔、漢為同水異名。

¹⁰⁷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7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28，〈沔水〉，頁 897-911。

¹⁰⁸ 鄧振男，《三至六世紀江漢地方豪族的發展歷程：以襄陽、江陵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14。

¹⁰⁹ 王益匡，《中國地理》，下冊，頁 499。

¹¹⁰ 鄧振男，《三至六世紀江漢地方豪族的發展歷程：以襄陽、江陵為中心的探討》，頁 15。

溫溼潤氣候之北界，一月的平均溫，在攝氏零度以上，夏季溫度很高，不過在攝氏二十度以上的月份，只有三個月。¹¹¹六月至九月，是本區的雨季；七、八月，是雨量最多的月份，乾季則長達七、八個月，¹¹²夏雨冬乾。春秋兩季較短、夏冬較長，四季較為分明，光照充足，雨熱同季。¹¹³襄樊平原則較偏屬副熱帶濕潤氣候，雨量分布大致為南大於北，東大於西，夏雨冬乾，降雨集中在四到九月，氣候溫和，雨量適中，物產豐富，宜稻宜麥。至於兩湖盆地以一月攝氏六度等溫線為南北兩型，北部氣候為華中型，三月至六月為雨季，六月雨量最多，十二月特少，秋季則受副熱帶高氣壓影響，天高氣爽為其特性。¹¹⁴

物產上，由於襄陽地區依漢水而立，亦不乏平原地形，加上氣候溫濕，田土肥良，因此物產豐富。農業與經濟作物種類眾多，主要為稻產區，亦產麥、豆、黍、粟等作物，蔬果有蔥、蒜、筍、芋、冬瓜、橙、橘、柿、木瓜等。漁產方面，因水利興盛，河湖眾多，魚類豐富，有鰱魚、鰻、鱸魚等。植物方面，襄州、房州多竹，民亦喜利用竹為建材，此外襄陽地區桑、柘、苧麻遍野，利於發展紡織業，故白縠、¹¹⁵火麻布、¹¹⁶白苧等織品，¹¹⁷皆為宋代上貢之物。花卉有梅、菊等，¹¹⁸尤其鄧州白菊花曾為土貢。¹¹⁹動物方面，除常見家畜如雞、豬、羊以外，尚有鹿、水牛、¹²⁰丹麕等動物。¹²¹（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¹¹¹ 鄒豹君、蔣君章，《中國地理》（台北：教育部社會教育司，1959年1版），下冊，頁109。

¹¹² 王益匡，《中國地理》，下冊，頁490、499。

¹¹³ 南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陽市志》，頁90。

¹¹⁴ 王益匡，《中國地理》，下冊，頁470。

¹¹⁵ 《宋史》，卷85，〈地理一·京西路〉，頁2113。

¹¹⁶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45，〈山南東道四·襄州〉，頁5，總頁470-377。

¹¹⁷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1，〈京西路·南路〉，頁26，總頁471-25。

¹¹⁸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6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15，〈襄陽賦秋日江梅菊花〉，頁1，詩云：「秋香冬艷各時宜，叵怪花神令出奇，金菊正含霜曉秀，江梅不待雪寒期。」

¹¹⁹ 同前書，頁18，總頁471-21。

¹²⁰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19，〈房陵十首〉之十，頁14，總頁1166-233：「視南視北皆春社，且放烏犍卧晏溫。」烏犍為水牛，因其為烏黑色，故名之。

¹²¹ 「麕」同「獐」，體形似鹿而較小而美，無角，毛粗長而呈褐色，性機警，善跳躍。其肉可食，皮細軟，可製成皮革。(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45，〈山南東道四·襄州〉，頁5，總頁470-377，載土產有丹麕皮。

二、行政區畫之演變

（一）宋以前歷代行政區畫

1. 先秦至三國時期

先秦時代，襄陽地區大致為「禹貢荊、豫二州之域，楚地翼、軫之分野。於周，諸國則穀、鄧、鄧、盧、羅、郢之地，春秋時屬楚。襄陽城本楚之下邑。」¹²²，轄境主要以荊山（今湖北省南漳縣內）為界，其北至黃河為豫州，其南其東為荊州，襄陽轄境地跨荊、豫二州。¹²³秦兼天下，分全國為三十六郡，設郡縣兩級制，「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取楚鄢郢為南郡」，¹²⁴「襄陽乃南郡、南陽二郡之地。」¹²⁵漢襲秦制，故西漢時仍因之未改，遂發展為大郡。西漢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漢武帝在全國設十三部刺史，作為流動巡察該部轄區吏政的巡察官。南郡、南陽郡均屬荊州刺史部。東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劉表任荊州牧，把州的首府從湖南漢壽遷至襄陽，使襄陽由縣級治所升為州級治所，轄區包括今湖北、湖南兩省，河南南部及廣東、廣西、貴州三個省區的一小部分。「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¹²⁶襄陽始脫離南郡獨立成郡。到了三國時期，赤壁戰後，「南郡以南屬吳，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為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¹²⁷其後，襄陽郡皆屬魏之荊州。

2. 兩晉南北朝時期

¹²²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京西南路〉，頁 1 左，總頁 2640。

¹²³ 丁寶齋〈襄樊市歷史沿革與政區變化〉（收入丁寶齋主編《襄樊名城保護與建設》，不詳：人民出版社，1993 年 9 月 1 版），頁 59。

¹²⁴ (唐)房玄齡等，《晉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月 2 版），卷 15，志 5，〈地理下·荊州〉，頁 453-454：「六國時，其地為楚。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

¹²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京西南路〉，頁 1 左，總頁 2640。。

¹²⁶ 《晉書》，卷 15，志 5，〈地理下·荊州〉，頁 454。

¹²⁷ 《晉書》，卷 15，志 5，〈地理下·荊州〉，頁 454。

兩晉南北朝時期沿襲舊制，實行州、郡、縣三級制。西晉統一後，共設十九州。荊州治所初期設於襄陽，後徙至江陵。東晉康帝時，庾翼為荊州刺史，遷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帝「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並屬襄陽。襄陽故屬荊州。」¹²⁸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將荊州北部地區畫給雍州管理，¹²⁹使雍州成為擁有實土的州治，治所襄陽，領襄陽等十七郡。襄陽郡轄襄陽、中盧、郢三縣，疆域僅為今襄陽南部、南漳東部、宜城西北部；今襄陽境內置新野郡、河南郡；今襄北、襄西置順陽郡、京兆郡；今穀城、老河口置廣平郡、義成郡、扶風郡；今宜城南漳置南天水郡、馮翊郡、華山郡；今隨州境內置隨郡。隨郡一度改屬雍州。今保康屬梁州新城郡房陵縣。齊永泰元年（498）蕭衍為雍州刺史，治襄陽；次年，蕭衍起兵於此，「梁置南雍州，西魏改為襄州。」¹³⁰侯景之亂後，襄樊地屬北朝西魏、北周，所立州郡縣多而雜，朝置暮改，屢分屢合。

3. 隋唐五代時期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廢郡存州。煬帝大業初（605-618），又廢州為郡，實行郡縣兩級制。因此襄陽地區包括襄陽郡，統縣十一：襄陽、安養、穀城、上洪、率道、漢南、陰城、義清、南漳、常平、郢；¹³¹南陽郡，統縣八：穰、新野、南陽、菊潭、課陽、順陽、冠軍、新城；¹³²安陸郡，其中的京山、應陽、富水；¹³³春陵郡，統縣六：襄陽、春陵、清潭、湖陽、上馬、蔡陽；¹³⁴房陵郡，統縣四：

¹²⁸ 《晉書》，卷 14，志 4，〈地理上·雍州〉，頁 432。

¹²⁹ (梁)沈約，《宋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月 2 版），卷 37，〈州郡志三〉，頁 1135，載：「雍州刺史，晉江左立。胡亡氏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實土郡縣以為僑郡縣境。」

¹³⁰ (後晉)劉昫，《舊唐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5 年 3 月 4 版）卷 39，志 19，〈地理二·山南道〉頁 1550：「襄陽 漢縣，屬南郡。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入為荊州治所。梁置南雍州，西魏改為襄州，隋為襄陽郡，皆以此縣為治所。」

¹³¹ (唐)魏徵，《隋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月 2 版），卷 31，志 26，〈地理下·襄陽郡〉，頁 891。

¹³² 《隋書》，卷 30，志 25，〈地理中·南陽郡〉，頁 841-842。

¹³³ 《隋書》，卷 31，志 26，〈地理下·安陸郡〉，頁 892-893。

光遷、永清、竹山、上庸，¹³⁵以及漢東郡治隨縣，領八縣：隋、土山、唐城、安貴、順義、平林、上明、光化。¹³⁶唐代太宗貞觀元年（627），因山川地形分全國為十道，襄陽地區屬山南道。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山南道為山南東道和山南西道，襄陽地區屬山南東道，道治襄陽。肅宗乾元元年（758）在襄陽設山南東道節度使，¹³⁷道由監察區域變為行政區畫，成為州、縣之上的一級政區。唐代山南東道的治所一直設在襄陽，¹³⁸轄襄、鄧、唐、均、房、隨、郢、復、荊、峽、歸、夔、萬、忠等州。所轄區域包括今湖北省西半部、河南省南陽地區，陝西安康、商洛地區，以及四川萬縣地區和涪陵地區一部分。¹³⁹至「五代梁唐之際改忠義軍，後以延州為忠義，復以襄州為山南東道」。¹⁴⁰

（二）兩宋時期行政區畫變革

宋代地方區畫有一演變過程，以路制而言，宋王朝從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不同的角度考慮，因時制宜來畫分行政區、監察區、軍區的轄境，使得其路制呈現出多重、繁複的型態。¹⁴¹宋初（960），因循唐代的道做為地方最大區畫，太祖乾德年間（963-967），設路負責為京城徵收和轉運財賦，與道並存。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以全國土地形勢為基本畫分成十五個路。太宗淳化五年（994），廢道存十路，路遂成為一級政區。至道三年（997），復分天下為十五路。¹⁴²真宗咸平四年（1001）王均之亂後，又析為十七路。¹⁴³天禧四年（1020），改為十八路。經過以後的不斷分合調整，至神宗元豐八年（1085），定全國為二

¹³⁴ 《隋書》，卷 31，志 26，〈地理下·春陵郡〉，頁 892-893。

¹³⁵ 《隋書》，卷 29，志 24，〈地理上·房陵郡〉，頁 818。

¹³⁶ 《隋書》，卷 31，志 26，〈地理下·漢東郡〉，頁 892-893。

¹³⁷ 《舊唐書》，卷 10，本紀 10，〈肅宗·乾元元年〉，頁 251。

¹³⁸ 《舊唐書》，卷 39，志 19，〈地理二·山南道〉，頁 1549。

¹³⁹ 丁寶齋，〈襄樊市歷史沿革與政區變化〉，頁 61-62。

¹⁴⁰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襄陽府〉，頁 12 左，總頁 2644。

¹⁴¹ 周振鶴編、李昌憲著，《中國行政區域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 1 版），頁 40。

¹⁴² 周振鶴編、李昌憲著，《中國行政區域通史·宋西夏卷》，頁 49。

¹⁴³ 《宋史》，卷 85，志 38，〈地理一〉，頁 2112。

十三路，是年頒布的《元豐九域志》，即依據這一區畫編制而成。¹⁴⁴宋徽宗宣和年間，增至二十六路。¹⁴⁵

京西路建置，據《玉海·乾德轉運使》言：「乾德元年（963）正月，以沈義倫為京西、韓彥卿為淮南轉運使，諸道置轉運始見此。」¹⁴⁶故京西路應始建於乾德元年。至道三年（997），定制為十五路之一。京西路建置後，歷經兩次分合。第一次為太平興國三年（978），四月甲戌，京西分為南北兩路。北路轄孟、滑、衛、陳、潁、許、蔡、汝等州，以轉運使程能統之；南路轄襄、均、房、復、郢、金、隨、安、鄧、唐等州及信陽軍，以副使趙載統之。後復併，併在何時，諸書均未言。從太宗一朝出任京西路轉運使的官銜看，可能是在一、兩年後即併。第二次在熙寧時。熙寧五年（1072）八月二十四日，「詔以京西路分南北兩路，襄、鄧、隨、金、房、均、郢、唐八州為京西南路，西京、滑、許、陳、蔡、汝、潁七州，信陽軍為北路。」¹⁴⁷《宋史·地理志》亦載：「京西路。舊分南北兩路，後併為一路。熙寧五年（1072），復分南北兩路。南路。府一，襄陽。州七：鄧，隨，金，房，均，郢，唐。軍一，光化，縣三十一。」¹⁴⁸

徽宗宣和元年（1119），改襄州為襄陽府，領襄陽、鄧城、穀城、宜城、南漳、中盧六縣。路轄其他各州，仍以州名。南宋時，京西南路變動極大。建炎初（1127），京東西、淮南、湖北等地，多已淪入盜賊、土豪之手。宋廷於是仿藩鎮法，設鎮撫使。京西遂以桑仲、霍明、李橫相繼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又以忠於宋室的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紹興初，諸州為金、齊所得，四年（1134），岳飛收復襄漢，以襄陽府，隨、郢、唐、鄧州，信陽軍六郡為襄陽府

¹⁴⁴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頁9。

¹⁴⁵ 程有為、王天獎主編，《河南通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12月1版）卷3，頁5。

¹⁴⁶ （南宋）王應麟，《玉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94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182，〈乾德轉運使〉，頁34，總頁947-681。

¹⁴⁷ （清）徐松輯，《宋會要》，方域5之18，〈京西南路〉，頁7378。

¹⁴⁸ 《宋史》，卷85，志38，〈地理一〉，頁2112-2113。

路。五年（1135），以金、均、房州隸襄陽府路。六年（1136），復以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同年七月，以金州隸川陝宣撫司。十一年（1141），紹興和議成，約以淮水中流為界，割唐、鄧二州畀金，又「升光化縣為軍」。¹⁴⁹故和議後，京西路實領襄陽府，均、房、鄧、隨、郢州，信陽、光化軍等七州軍十五縣。紹興十九年（1149），信陽軍撥隸淮西，京西南路實領襄陽府等六州軍十三縣。¹⁵⁰嘉定十二年（1219），隨州「棗陽升為軍，又卻割德安府應山縣來屬」。¹⁵¹端平元年（1234），宋蒙聯合滅金，京西南路又增唐、鄧、息三州十一縣，凡領襄陽府等十州軍二十五縣。

第二節 宋代以前襄陽地區歷史發展

襄陽在戰略上有著重要地位，歷代有識之士都將其視為得天下之根本，故在此上演著一齣又一齣的爭奪戰。

秦、漢時代襄陽所在之荊州南郡、南陽郡日漸發展為大郡，東漢末年爆發黃巾之亂，隨即為軍閥的割據混戰。¹⁵²其後劉表受命為荊州刺史，據《後漢書·劉表傳》所載：「時江南宗賊大盛，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¹⁵³而蒯越則言：「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¹⁵⁴劉表遂聽其言，視襄陽為重要據點，並將州之首府遷於此地，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起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

¹⁴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京西南路〉，頁 1 左，總頁 2639。

¹⁵⁰ 同前註，頁 54。

¹⁵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3，〈隨州〉，頁 2 左，總頁 2698：「中興以來陷於偽齊，岳飛始復隨州。舊領縣三，棗陽陞為軍，又卻割德安府應山縣來屬」。

¹⁵² 鄧振男，《三至六世紀江漢地方豪族的發展歷程：以襄陽、江陵為中心的探討》，頁 26。

¹⁵³ (劉宋)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年 11 月 3 版），卷 74，〈劉表傳〉，頁 2419-2420。

¹⁵⁴ 同前註，頁 2420。

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因而初平二年（191），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然孫堅夜襲峴山卻中箭身死，被劉表反擊，大敗於此。袁術由是不能勝劉表。¹⁵⁵由此觀之，劉表能以襄陽一地為根據地，利用山巒形勢加強戰守，以克敵致勝，並統一安定荊州州境，雖其後政策保守未能開疆立業，然此時襄陽地區在政治戰略上的重要性，已逐漸顯現。

三國時期的襄陽，自赤壁之敗，曹操失南郡而率眾北歸，重兵戍守江陵、襄陽以備吳。此時，周瑜力勸孫權道：「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¹⁵⁶而除孫權外劉備亦將目標對準了襄陽，若襄陽再失，對曹操而言則沔水、漢水以北之地皆將不保，因此襄陽成為鞏固北部天下的關鍵，盡全力加強襄陽的防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自江陵發動北伐，與曹軍大戰於襄樊，並利用漢水暴漲之機，屢獲大勝，兵威大振，一時「威震華夏」，曹操甚至欲「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後，曹操以大將徐晃救援並利用劉備、孫權之間的矛盾，「遣人勸權躡其後」，¹⁵⁷以襲擊荊州，造成關羽腹背受敵，終致失敗，亦使襄陽始終被曹操所控制。此後諸葛瑾、陸遜之師，屢攻襄陽，而終無尺寸之功。魏人保襄陽，亦如手足之救

¹⁵⁵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版），卷60，〈漢紀五十二〉，頁1927-1928，其原文載：「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眾就袁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

¹⁵⁶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66，〈漢紀五十八〉，頁2101：「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而圖之，是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相事，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¹⁵⁷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68，〈漢紀六十〉，孝獻皇帝癸，頁2162：「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陸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於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頭目，¹⁵⁸司馬懿亦言：「襄陽水陸之衝，御寇要害，不可棄也。」¹⁵⁹直接點出襄陽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至西晉，司馬炎果記取前人所言，視襄陽為滅吳之本，終於在此安坐而弋吳，統一天下。

東晉偏安江左，得以保有江南，實因「強兵巨鎮，盡在荊襄」。¹⁶⁰庾亮任荊州刺史時，聽說趙國主石勒新死，曾建議立即發兵襄陽北伐，認為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¹⁶¹庾亮死後，其弟庾翼繼位，也屢思北伐。康帝建元元年（343），翼上表請移鎮襄陽，欲以此為北伐基地，以伐後趙，然朝議不許，但他仍違詔北行，行至夏口，復上表論移鎮襄陽之重要性：

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¹⁶²

此議因隨著庾翼遷至襄陽之兵力日盛而漸被採用。至次年（344），康帝去世才又還鎮夏口。後來，庾翼死，荊州刺史之位為桓溫所奪，¹⁶³桓溫北伐即以襄陽為前進基地，一攻長安伐前秦，二收洛陽復舊京。晉之號令，復接於中原。太元四年（377）二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¹⁶⁴晉大將桓沖聞訊，率荊州七萬精兵爭奪襄陽，終未能收復。直至淝水戰後，前秦元氣大損，晉將趙統才收復襄陽，

¹⁵⁸ 胡阿祥等著，《兵家必爭之地：中國歷史軍事地名要覽》（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8月1版），頁340。

¹⁵⁹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高祖宣帝紀〉，頁3：「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魏文悔之。」

¹⁶⁰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4月初版），卷87，〈紹興五年三月壬寅〉，頁1453：「夫淮甸、荊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

¹⁶¹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73，列傳43，〈庾亮〉，頁1923。

¹⁶² 同前註，頁1934。

¹⁶³ 潘明志，〈歷代軍事重鎮〉（收入丁寶齋主編《襄樊名城保護與建設》，不詳：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1版），頁54。

¹⁶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孝武帝紀〉，頁229。

¹⁶⁵重新鞏固了東晉上游這塊戰略要地。可見兩晉時期襄陽一地實為南國北伐、北國南征的關鍵地帶，而北方中原雖為胡族所據，然襄陽可謂荊州地區的前哨站與防禦指標，無襄陽，荊州亦難守。

南北朝時期，地處守戰雙方中央地帶的襄陽，被視為王業之本。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宋為爭奪中原，特意加強襄陽「資力」，將雍州、湘州所收賦稅「悉給襄陽」，¹⁶⁶並派兵力與大臣鎮守此地，其後宋軍曾據此北伐，一度打到陝西潼關，改變歷來對於南朝國力衰弱不振的印象。襄陽一地的崛起，除了有本身環境形勢及歷史發展背景的條件外，劉裕篡晉後對荊州一地之政策有極大關聯。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一文即指出，由於東晉以來荊州的壯大及重要，造成地方與中央政府的磨擦不斷，使東晉國力與北伐事業未能成功，甚至一再受阻，而劉宋建國之初，劉裕便對荊州進行一連串的防制計畫：其一為限制荊州將吏之數目，使不得自由擴展武力；其二為割荊州部分土地，建立新州，以縮小荊州面積；其三為以宗室出鎮荊州，以防異姓之二心。¹⁶⁷其後的宋文帝亦依前例緩慢而持續的割裂荊州，然宗室久任荊州可能存有貳心的問題日漸浮現，至孝武帝時加緊削弱荊州亦不親任宗室，荊州實力因而大衰。荊州的割裂與衰弱，造就了襄陽一地的發展與壯大。

南北朝時期，地處守戰雙方中央地帶的襄陽日漸崛起，除了入宋後荊州持續被有意的割裂，¹⁶⁸造成襄陽所在的雍州實力甚至超越荊州之上，更由於南朝君主

¹⁶⁵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05，〈晉紀二十七〉，頁 3329：「（太元九年四月）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秦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

¹⁶⁶ (梁)沈約，《宋書》，卷 79，〈竟陵王誕傳〉，頁 2025：「二十六年，出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25，〈宋紀七〉，頁 3935-3936：「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¹⁶⁷ 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文史哲學報》4，1952.12；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年，頁 109。

¹⁶⁸ 同前註。

多能明瞭襄陽的重要性，因此，襄陽一地甚至影響著南朝政權之轉移，例如由宋入齊，蕭道成的得勢與崛起與襄陽關係密切。元徽五年（477）宋廢帝遇弒，蕭道成迎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宋順帝時期，荊州刺史沈攸之據荊州多年，充足實力後欲發兵反叛，此時的蕭道成已得勢，並看出雍、郢兩州之重要性，欲「以襄陽重鎮」，授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一職，¹⁶⁹彼此互為表裡，暗中牽制沈攸之。朝廷因有雍、郢二州而坐收牽制荊州之效，因而能盡速平亂，卻也使蕭道成坐收其利，順利消滅政敵獨攬大權趁機坐大。在廢帝死、順帝立，加之政敵掃平，蕭道成不必血洗宮廷還能得到禪位之美名。在此例中可看出蕭道成擅於謀畫，更能夠看出雍、郢二州之重要性，在此時已超越荊州實力，甚至左右政權的輪替，朝代的興亡。

再看梁的興起與襄陽間的關係為何？梁武帝蕭衍曾謂諸將：

荊州本畏襄陽人；加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¹⁷⁰

等於明白指出襄陽已令實力一向強大的荊州人所畏懼，更不諱言的暴露其希望擁有荊、雍之兵力，開創一番事業。蕭衍不僅口出此言，更是步步往目標邁進，齊明帝建武四年（497），魏帝自率兵眾寇雍州，明帝令蕭衍赴援。永泰元年（498）七月，蕭衍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自此時起，蕭衍建立功勳順利取得雍州刺史一職。東昏侯

¹⁶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33，〈宋紀十五〉，頁 4185：「蕭道成以襄陽重鎮，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居之；而敬兒求之不已，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裡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無言。三月，己巳，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為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¹⁷⁰ (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年 11 月再版），卷 1，本紀 1，〈武帝上〉，頁 4。

永元元年（499），蕭衍欲拉攏其兄蕭懿，派張弘策予以遊說，《資治通鑑·齊紀八》載：

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

171

從張弘策之遊說內容可知，郢州為荊、湘下流，兩州之所不及也，而蕭衍所在的雍州即包含襄陽一地士精馬強，若兩者合作圖謀江山將所向無敵，然蕭懿不從。衍乃轉與其弟合作，迎驃騎外兵參軍蕭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蕭憺二人至襄陽。

永元三年（500），雍州刺史蕭衍反，朝野震動，西中郎常史蕭穎達對於局勢詭譎不定，頗不自安，故密與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席闡文曰：

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眾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¹⁷²

從席闡文之言可見蕭衍兵力強大，甚至可成霸業，造成朝臣們在朝廷與參與蕭衍舉事間游移不定。其後蕭衍奉荊州刺史蕭寶融為相國，不與寶融正面衝突，待寶融即位於江陵是為和帝，蕭衍再一路進軍建康掌握國政。中興二年（502）便廢

¹⁷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42，〈齊紀八〉，頁 4444-4445。

¹⁷² 《梁書》，卷 10，列傳 4〈蕭穎達〉，頁 187。

和帝為巴陵王而自即帝位，是為梁武帝，於是齊亡。由此觀之，梁的建國與蕭衍據實力強盛之雍州並且合郢州之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可以說位於雍州的襄陽一地，實力冠於西部各州。

梁的敗亡，亦與襄陽有關。梁中大同初年（546），岳陽王蕭詧為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蕭詧鎮守雍州，治所在襄陽，蕭詧深知襄陽乃形勝之地，為立國之基礎，遇亂可成其大業，於是有據地成王之心，《周書·蕭詧傳》即載：「雍州刺史蕭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¹⁷³

第二年（547），張纘奉命前來接替其職務，蕭詧因不捨丟失襄陽而投靠西魏，西魏宇文泰憑藉襄陽吞併荊州，又以荊州與蕭詧換取襄陽，《周書·蕭詧傳》載：

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詧為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兼防詧也。¹⁷⁴

蕭詧原以為憑藉西魏之力可成霸業，然沒想到投靠西魏等於引狼入室，不僅受制於人成為西魏傀儡外，更是國破家亡山河變色，莫怪乎蕭詧自是悔恨不已：「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畧不振，常懷憂憤。」¹⁷⁵而梁亡後，

¹⁷³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11月再版），卷48，列傳40〈蕭詧〉，頁855-856。

¹⁷⁴ 《周書》，卷48，列傳40，〈蕭詧〉，頁859。

¹⁷⁵ 同前註，頁560-561。

襄陽落入西魏之手，偏安江南政治腐敗的陳朝已無暇自顧，更無力再圖北伐，復興失土，於北朝間的分裂與紛亂間苟安於世，直到隋文帝楊堅於開皇八年（588）下詔伐陳，結束南北朝分裂局勢。

綜上所述，襄陽的崛起除了有其先天地理環境的優勢外，位居南北要衝對於政權分裂為南北對立時，亦起極大的作用。南朝劉宋的政策，對荊州的割裂與衰弱，間接助長了襄陽一地的興起，實力漸增，甚至左右著政治局勢乃至朝代的興衰。由宋至梁亡，一朝衰弱一朝興起之間，其共通點皆是起事者能體認襄陽的潛力，坐擁雍州以儲備兵力，並合郢州等地資源，進取荊州，立於不敗之地，順利建國。這或許是宋武帝劉裕當初分化荊州時，始料所未及。而單憑一地，不顧全局大勢，是無法稱霸一方，蕭督就是輕忽西魏，過度自我膨脹，因而被眼前利益所迷惑，造成兔死狐悲的慘劇。

隋文帝因得襄陽而亡陳，¹⁷⁶天下大定，中原復歸統一。襄陽一地於隋唐時穩定的發展。唐代「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¹⁷⁷安史之亂時，官軍據守「荊、郢之北門」襄陽，阻擋叛軍向荊楚的侵擾，「南夏得以保全」，¹⁷⁸足見襄陽形勝之險要。簡而言之，無論北伐南進、入主中原、圖謀江北亦或偏安於一隅，襄陽可謂南北通關的鎖鑰，誰先取得誰可進門，無怪乎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五代時期可說「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¹⁷⁹唐末藩鎮地方勢力之拓展，演變為群雄割據之局面，雖稱五代，然僅止華北，更尚有四分五裂之華南，十國先後並立，遠在東北之契丹更遙望中原虎視眈眈。五十餘年間，江山頻頻易主，山河破碎，中原殘破，民生凋敝，人

¹⁷⁶ 胡阿祥等著，《兵家必爭之地：中國歷史軍事地名要覽》，頁 341。

¹⁷⁷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台北：大通書局，1979 年 7 月 4 版)，卷 291，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碑銘〉，頁 6，總頁 3733。

¹⁷⁸ 杜瑜，《中國經濟中心南移：唐宋間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台北：五南，2005 年 4 月初版)，頁 376。

¹⁷⁹ 《宋史》，卷 85，志 38，〈地理一·京城〉，頁 2093：「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宇縣分裂，莫之能一。」

民苦不堪言。

由前述政治軍事之歷史發展情勢可知，襄陽臨江靠山，地勢險要，自古為軍事重鎮，兵家必爭之地。在經濟上，漢至隋唐時期，襄陽為北至洛陽，南通江陵之要道，加上漢水流經此地，白河、唐河自北東來匯，南可達長江，因此為南船北馬匯集之地，往來溝通南北經濟，工商業興盛，因而成為江漢間之大鎮。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帶來人潮，漢水邊大堤往來游人如織，商販文人亦喜至襄陽行樂。文化上，自東漢三國，襄陽地區即人才輩出，加上北方士人大量流寓襄陽，與本地士人相結合，如著名的諸葛亮躬耕於襄陽隆中；高士龐德公隱居鹿門山，與諸葛亮、徐庶、司馬德操為友。劉表數度延請，不至；以及龐統為德公之姪，號為鳳雛，與諸葛亮齊名。形成了以政治為中心的思想學術與文化高潮。東晉時，則有名士習鑿齒，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於時。時值高僧釋道安於襄陽弘法，兩人交遊甚密，一個稱為四海習鑿齒，一自稱彌天釋道安，人稱為佳對。¹⁸⁰而因道安的出現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於此弘法十五年，使襄陽極早被受佛法之洗禮，漸成為當時著名佛教重鎮之一，道安並於此設立寺院，如檀溪寺、龍興寺等至宋代仍存。至唐代則掀起另一波文化高潮，襄陽地區不僅文風鼎盛，出產詩詞才人眾多，更為騷人墨客匯聚之地，如杜甫之祖父杜審言（645-708），工詩、善書與李嶠、崔融、蘇味道三人齊名，為文章四友；孟浩然（689-740），隱居鹿門山，以詩自適，由於應士不第，故歸襄陽，¹⁸¹世稱孟襄陽，為唐代田園山水詩派的代表，與王維齊名，稱為「王孟」；此外，尚有詩聖杜甫（712-770）、李白、王維、元稹等著名文人，皆曾至襄陽遊歷，留下動人篇章詩句。

¹⁸⁰ 湖北省襄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襄陽縣志》（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1版），頁661。

¹⁸¹ 《舊唐書》，卷190，列傳140，〈文苑下·孟浩然〉，頁5050。

第三節 兩宋時期襄陽地區的政軍經情勢

一、政軍情勢

宋太祖趙匡胤開國創統一之大業，「革五季之患」，¹⁸²太宗繼而完成之，結束多年紛亂。北宋定都汴京，自古為四戰之地，無險可守，故重視周邊地區之發展，藉以屏衛中央。襄陽地區位近京畿，恃漢水而立，然自唐末五代以來，亦遭受慘烈戰禍，已如前述。

北宋末年黃河流域淪入金人之手，襄陽成為南宋邊防重鎮。靖康之難，金人陷汴京，擄徽、欽二宗北去。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趙構就帝位於南京應天府，改元建炎，形成新領導中心，以李綱為相、宗澤為將，策畫恢復。宗澤恢復汴京，屢請高宗回汴，然高宗仍恐金人復返，不欲回汴。丞相李綱對回汴定都之事曾奏言：

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¹⁸³

上述建議中，提及以「襄陽」為南都，顯示對該地之重視，而這恐怕也是襄陽以地理形勝之姿，在歷史上首次被議為都。惜李綱欲以巡幸方式加以鎮撫，等於為

¹⁸² 《宋史》，卷 167，志 120，職官七，〈府州軍監〉，頁 3972：「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節度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

¹⁸³ (宋)李綱，《梁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58，〈十議〉，頁 6 左-7 左，總頁 1125-972~1125-973。

高宗不回汴京一事解套。而巡幸之所，李綱則認為：

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¹⁸⁴

建議高宗三地擇其一以維繫中原安定，然高宗一心欲往東南躲避金人遠離中原，故李綱其後又奏曰：

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固，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¹⁸⁵

可見此時襄陽戰略地位雖重，曾列於帝都的候選名單之列，然襄陽受李孝忠等盜賊所亂，恐為殘破不堪，故李綱另行建議巡幸鄧州，扼守屯兵留據中原，若退避東南恐中原不保。高宗才剛打消往避東南念頭，下詔決定前往南陽，並經營鄧州準備秋末冬初巡幸，¹⁸⁶九月一聽聞金人南侵消息，便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¹⁸⁷十月初一，即登舟赴揚州。

¹⁸⁴ (宋)李綱，《梁谿集》，卷 63，〈議巡幸第一劄子〉，頁 2 右，總頁 1125-1023。

¹⁸⁵ (宋)李綱，《梁谿集》，卷 63，〈議巡幸第一劄子〉，頁 4，總頁 1125-1025。

¹⁸⁶ 《宋史》，卷 24，本紀 24〈高宗一〉，頁 447：「秋七月……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

¹⁸⁷ 《宋史》，卷 24，本紀 24〈高宗一〉，頁 449：「己酉，以諜報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是秋，金人分兵據兩河州縣……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

建炎元年冬天，金軍展開大規模攻勢，金軍粘罕攻西京，早知高宗可能退守鄧州，隨後遣兀朮可等兵馬攻往鄧州、漢水一帶，其後連下鄧州、襄陽、房、均、唐州，金人所致之處大肆焚燒劫掠，將鄧州大量綱運、糧草劫掠一空，又搜刮百工技師及金銀布帛，¹⁸⁸擄襄陽府、唐、鄧、均、房等州宋人北歸。短短建炎元年（1127）十月至二年（1128）夏季，不及一年的時間，京西南路轄下一府八州軍，即有七個被金人與盜賊竊佔擄掠，¹⁸⁹ 據《宋會要》載：「蓋荊襄之地，自靖康以來，屢經兵火，地廣人稀，不患無田之可耕，常患耕民之不足。」¹⁹⁰又，據莊綽《雞肋編》載：

而自靖康丙午歲（靖康元年，1126），金狄亂年，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相互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

191

可見連年爭戰，使襄陽地區飽經無情戰火，遂地廣土荒，人口流失嚴重，米糧缺乏，以致出現人相食之慘況。

至紹興三年（1133），偽齊帝劉豫遣部將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岳飛有收復之志，上奏說：「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¹⁹²紹興四年（1134）

¹⁸⁸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光緒四年歲次戊寅越東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9月初版），卷114，〈炎興下帙〉建炎二年正月九日甲午，頁14，總頁101：「遺史曰：金人至鄧州，官兵守禦劉汲被執。……時中之議欲幸襄陽，而鄧州為行宮，截留四川輕費綱及聚糧草，至是盡為金人所得，又需索百色技藝人及金銀物帛，如京師圍城中根括之法。」

¹⁸⁹ 據周振鶴編、李昌憲著，《中國行政區域通史·宋西夏卷》，頁225：「宣和五年（1123），京西南路轄有府一，州七，軍一為：襄陽府、唐州、鄧州、隨州、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光化軍。建炎初年金人攻陷襄陽府、唐、鄧、均、房州，而襄陽、唐、隨、郢州則被盜賊叛軍佔領過，故共計有七府、州。」

¹⁹⁰ (清)徐松輯，《宋會要》，食貨3-11，〈營田雜錄〉，頁4827。

¹⁹¹ (宋)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頁43。

¹⁹² 《宋史》，卷365，列傳124，〈岳飛〉，頁11381-11382：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紹興）四年，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

五月，岳飛率軍北伐，先復郢州。其後大敗李成，收復襄陽。七月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¹⁹³史載紹興間，岳飛收復襄陽，從此「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¹⁹⁴馮波認為此說為溢美之詞，¹⁹⁵據宋人陳亮言：

荊、襄之地，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民居稀少，土產卑薄……；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

196

洪邁《夷堅志》亦言：

紹興初，岳少保開闢於荊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為所虐。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簫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乾道中，王宣為副都統制，自襄陽往鄂渚，途次荊郢間，從馬且以百數，日猶銜山眾樂競奏，□吏報一篳篥部頭，為虎於眾人中馬上銜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笛部頭一人亦然。¹⁹⁷

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

¹⁹³ 《宋史》，卷 27，本紀 27〈高宗四〉，頁 510-511：「（紹興四年）五月……，岳飛復郢州，斬偽齊守荊超。……丙寅，李成棄襄陽去，岳飛復取之。……秋七月戊申朔，……岳飛遣統制王貴、張憲擊敗李成及金兵于鄧州之西，復鄧州。庚午，王貴、張憲破金、齊兵，復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

¹⁹⁴ （宋）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初版），卷 5，〈端平襄州本末〉，頁 83：「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一旦灰燼，禍至慘也。」

¹⁹⁵ 馮波主要舉出兩例說明，一為《宋史·汪澈傳》中，隆興元年（1163）孝宗即位時，「襄漢沃壤」還是一片「荊棘彌望」，汪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屯田，「功緒略就」；二為南宋初陳亮亦指出荊襄於「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可見至少至孝宗時荊襄地區仍是人少地荒，可能並未如宋人周密所言：「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參見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頁 80。

¹⁹⁶ 《宋史》，卷 436，列傳 195，〈陳亮〉，頁 12936-12937。

¹⁹⁷ （宋）洪邁，《夷堅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264-12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初版），支景卷 1，〈工宣樂王〉，頁 498。

又據《宋史·汪澈傳》載：

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荊、襄，將分道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侔於蔡。襄、漢沃壤，荊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¹⁹⁸

由此可知，至少由紹興初至孝宗乾道時期，荊襄地區猶為蕭條蠻荒、荊棘遍野、猛虎橫行之地帶。其後，隨著南宋政權與戰局的逐漸穩定，孝宗即位後銳意恢復，令襄陽地區招民墾田，並興修水利以廣灌溉，在政府政策的扶持和移民的開拓下，襄陽地區經濟漸次緩慢的恢復，然其經濟發展仍遠遠不及湖廣江南穩定。

宋金關係可說因蒙古崛起而產生遽變。早在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金章宗即位後，其內部與漢人族群問題叢生，外部除來自南宋的威脅外，又需應付北方幾個日趨強盛的游牧民族韃靼、蒙古部落南下侵擾。寧宗開禧初年（1205-1207），宋廷有意趁金勢危，用兵北伐，收復失土，然金人實力仍強，宋廷失敗以終。其後，嘉定年間（1208-1216）蒙古大規模攻金，迫使金廷自燕京南遷汴梁。為能擴地立國，嘉定十年（1217）四月，金人發動南侵，進犯襄陽、棗陽，宋將趙方派兵應戰，擊退金兵。¹⁹⁹時宋蒙間仍處於間接關係的狀態，然因金人的再次渡淮南下攻宋，對宋造成極大壓力。因而宋廷遂有兩議：一為與金斷交絕幣，聯蒙滅金，以收復失土；二為助金屏宋，避免重蹈聯金滅遼之覆轍，徒留唇亡齒寒之傷悲。其後宋金交惡，加之蒙古攻金益急，勢力日漸強大，宋蒙有著滅金的共同目標，促使雙方關係拉近。紹定年間（1228-1236），蒙古成功假道

¹⁹⁸ 《宋史》，卷 384，列傳 143，〈汪澈〉，頁 11815。

¹⁹⁹ 《宋史》，卷 403，列傳 162，〈孟宗政〉，頁 12211-12212：「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覆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

宋境，不但加速金國滅亡，更探得宋朝虛實。端平元年（1234）宋蒙聯袂滅金，金亡。屏障已失的宋朝，與之接境的是更加強悍的蒙古，雙方蜜月期一過，宋蒙關係隨即出現風暴。

在宋蒙戰爭中，襄陽地區主要位於三大戰場之一的京湖戰場，²⁰⁰並處於前沿邊面的地帶，主要戰略作用為控扼漢水，以屏衛長江，鞏固江南，也因此宋蒙戰爭中的勝敗起決定性的作用。蒙古滅金後，首先進攻金亡歸宋的唐、鄧州一帶，其後均州范用吉、鄧州趙祥相繼降蒙，光化軍亦被蒙軍攻下。端平三年（1236）二月，因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趙范撫御不當，致使襄陽城被叛軍焚掠一空。襄陽的失守，標誌著南宋京湖沿邊防線被突破，「大抵自失襄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隨、信不可守，近而棗、安為盜所有，遠而光、黃亦復凜凜，荆、鄂遂為劇邊矣。」²⁰¹南宋京西南路七府州軍全部喪失，荆湖北路之江北諸州縣亦形殘破，荆襄防線實際上被壓縮至長江一線。襄陽的陷落可謂嚴重之至，幸而蒙軍未識得襄陽戰略之險要，未屯兵於此為取宋之基地。襄陽城陷，蒙古南下，兵鋒所至，隨、荆、鄧州諸城亦相繼失陷；原欲突破長江防線，為宋將孟珙所阻，遂轉攻兩淮。嘉熙二年（1238），宋軍收復荆襄一帶，孟珙深具遠略，上奏曰：

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²⁰²

²⁰⁰ 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頁116、302指出：南宋立國東南，無百二山河，為曰長江為戶庭，兩淮為藩籬，以長江為最主要的屏障，形成了四川、荆襄、兩淮三大防區，向北展開防禦。故宋蒙戰爭即以此三大防區為主要戰場：其一為四川地區；其二為京湖；三為兩淮地區。

²⁰¹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冊6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臺3版），卷31，〈督府書·李大著（心傳）〉，頁12，總頁275上。

²⁰² 《宋史》，卷412，列傳171，〈孟珙〉，頁12376。

然此地已城毀民徙，加以宋廷財力不繼，兵源不足，未採納其議在此屯兵固守，荊襄一帶自此十餘年間毫無經營整建，宋蒙雙方對此地「付之榛莽，彼此視如棄地」，²⁰³殊為可惜。

淳祐十年（1250）接任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江陵府的李曾伯上奏要求增撥兵員、糧食於京湖，並對郢州、襄陽等處城池先後進行修復。經三年的經營，襄樊重新成為「城高池深，兵精食足，師出必克，敵入輒敗」²⁰⁴的堅固堡壘，亦即恢復了京湖沿邊防線，這對其後的宋蒙戰局具有重大的影響。

蒙軍與宋軍多次交戰，以往主要採取攻掠戰法，直至淳祐十一年（1251）蒙哥汗即位，欲以亡宋為目標，開始改變攻宋策略，大舉出兵川蜀卻屢屢受阻。開慶元年（1259）先有杜瑛答忽必烈滅宋之方，其指出「若控襄陽之師，委戈下流，以搗其背，大業可定矣。」²⁰⁵，其後有郝經否定以川蜀為主攻方向的選擇，提出了自荊襄、兩淮數道並進的想法，²⁰⁶主攻川蜀的戰略始受質疑。景定元年，（元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以荊襄作為重點突破的計畫正式被提出，郭侃稱：

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繼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驅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²⁰⁷

²⁰³ (宋)李曾伯，《可齋雜稿》（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84，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1 版），卷 16，〈三辭免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奏〉，頁 22，總頁 330。

²⁰⁴ (宋)李曾伯，《可齋雜稿》（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84，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6 月 1 版），卷 3，〈貼黃〉，頁 4，總頁 477。

²⁰⁵ (明)宋濂等，《元史》（標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3 月再版），卷 199，列傳 86，〈杜瑛〉，頁 4474。

²⁰⁶ 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頁 308。

²⁰⁷ 《元史》卷 149，列傳 36，〈郭寶玉〉，頁 3525。

明確的指出平宋之策在於「先取襄陽」，攻克襄陽後得以「直驅臨安」，江淮與川蜀地區則不攻自破，南宋乃平。然此時蒙古內部局勢不穩，必先安內而後攘外，故其議未被採用。至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漢將劉整入見忽必烈，提出「奏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²⁰⁸佔領襄陽後「浮漢入江，則宋可平」，²⁰⁹蒙古內外戰備已足，其議遂成，宋蒙間的襄樊之戰也據此展開。

咸淳四年（元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命阿朮、劉整圍攻襄陽，因襄樊城池堅固，且宋方已有防備，調兵糧增援，故蒙軍包圍襄樊歷四載未能順利攻城。襄、樊兩城間，中隔漢水，宋人中造浮梁以互通援兵，兩城固守互為唇齒。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1272）漢水漸涸，元將阿里海牙進言，認為「襄陽受圍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²¹⁰元世祖忽必烈採其言，派遣大批元軍猛攻樊城，先斷其橋樑以阻襄陽援兵，次率水師溯流而上毀垣入城，末以回回砲攻樊，終破之。樊城既破，襄陽驟失援軍，猶如唇亡齒寒，勢單力孤，元軍日以重砲擊之，且剿撫並用，襄陽城內人心惶惶，而宋廷卻未能及時提出援襄方針，坐看襄陽城毀人亡，終致襄陽守將呂文煥棄城降元。²¹¹

襄樊之戰導致宋亡元興之因，歷來已有諸多探討，²¹²然而最關鍵原因仍在雙方的政治心態與眼光，忽必烈即位後厲行新政，遷移戶口實施屯田以資兵糧，招徠宋將推行漢法以安民心，營造戰艦增練水軍以增軍實，戰略正確主攻襄陽。反觀宋廷朝臣軍心渙散各圖己利，將領之間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將從中御貽誤戰

²⁰⁸ 《元史》卷6，本紀6，〈世祖三〉，頁116。

²⁰⁹ （元）姚燧，《牧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0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初版），卷13，〈湖廣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神道碑〉，頁15，總頁527。

²¹⁰ 《元史》，卷7，本紀7，〈世祖四〉，頁144。

²¹¹ 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頁324-325。

²¹² 如金毓黻，《宋遼金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臺1版），頁113-115；陶晉生，《宋遼金元史新編》（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10月初版），頁191；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頁327-330等，皆指出宋亡元興之原因，宋廷方面主要為：宋士大夫出身的權臣誤國、軍政不修、將士士氣消沉、經濟財政困窘等；元朝則是原有軍力即十分強盛、善用宋金降將以熟知戰守形勢、改良軍備訓練水師。

機，戰略錯誤致使未能全力援襄。試問在一者積極整軍修備，另一者日益腐化沉淪之下，南宋何能不亡。其次則為總覽大局知人納言的識見。襄陽的首次失守，因蒙古未能認識襄陽之重要性以致拱手讓宋，復而取之的宋廷，未能採孟珙之言提高襄陽戰守能力，相隔十餘年後才早元人一步屯戍襄陽，此時蒙軍已識得襄陽為得天下之重鎮，重練水師，班師再來時，宋軍雖已有備，暫可抵禦，然元軍能隨局勢改變作戰計畫，宋軍仍死守孤城求援不及，導致襄陽再次失守，終而步向亡國之途。元將阿里海牙入襄陽城後，曾志得意滿的說：「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²¹³襄陽一帶對南宋而言可說是輔助地區，其軍事作用在於策應，一方面和淮河成犄角之勢，可從側面牽制北敵的攻勢；另一方面則可西連陝西、四川的外衛，故襄陽可稱之為聯衛地區。蒙古二攻襄陽，圍城五年，襄陽一降，如骨牌效應般長江水師接著投降，至其渡江，不出二年而取臨安，元軍順流東下，很快就佔領了南宋江浙、福建的基本地區，剩下廣東一帶，自然支持不久。²¹⁴由此可見，元廷最終仍採郭侃之議，也證明了襄陽一隅確實攸關全局之安危與勝負，因此，南宋覆亡與襄樊失守確有關聯。

二、經濟發展

兩宋中央集權統一帝國的再建，構成我國封建經濟高度發展時代，也是我國經濟重心完成南移形成的時代。宋王朝的南渡，標誌著南方經濟文化的空前發展，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國社會就完全進入南盛北衰的新階段。²¹⁵

（一）唐宋經濟重心的轉移

唐宋時期經濟重心逐漸從黃河流域南移到長江流域，一方面是由於南方長江流域經濟有更好的發展條件，後來居上；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北方黃河流域經濟因多方面原因走向衰敗。一漲一落，消長態勢不可逆轉，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²¹³ 《元史》，卷 8，本紀 8，〈世祖五〉，頁 153。

²¹⁴ 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收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出版社，2005 年 10 月初版），頁 25、27-28。

²¹⁵ 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頁 5。

1. 南方經濟的持續發展

南方長江流域經濟具有比北方更好的發展條件，表現在政治軍事上，從安史之亂開始，北方黃河流域軍閥混戰，社會經濟受到極大破壞，又進入停滯、衰退時期，南方則因保持相對安定，政府經營重心偏向江南而呈繼續上升的勢頭。五代十國時期，事實上為唐末藩鎮割據的延續。在數十年的大分裂狀態中，黃河流域受軍閥戰爭的破壞，呈現出戶口流移、田疇荒廢的景象；北方邊境又為契丹統治者侵略，深受蹂躪與劫奪。至於建立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諸國，雖唐末也曾受戰爭的摧殘，但各國政權建立以來，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在南方相對安定的環境下，實行有利於生產發展和安定社會的政策，如興修水利、獎勵耕織，使南方經濟文化雖處於五代十國的亂局中，仍能持續發展，在長期過程的積累上，進一步奠定南方經濟超越北方的優勢地位。²¹⁷至北宋朝廷定都汴京，也因其為廣大平原，無天險可恃，故金人南下時，宋廷一路南逃。南宋時則偏安於一隅，與北方民族隔於長江，定都臨安，北方自秦嶺淮河以北，多次淪為戰場或為金人控制；至於南方主要在長江流域以南地區，社會經濟皆穩定的發展。而宋人南渡，中央政府整體轉移南方，出現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開發。不僅原來已經得到比較充分開發的長江三角洲，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尚未充分開發的荊楚地區、閩越地區、南粵地區，都得到長足發展。整個南方經濟呈現全面繁榮的景象，並孕育著社會發展的新機緣。²¹⁸

在自然條件上，比起北方黃河流域來說，南方自然條件較好，不僅氣候溫和，一年之內，大多數時間裡植物都可以生長成熟，水系發達，便利灌溉與交通。在正常條件下，南方能比北方發展起更好的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農作物產量一般較高。由於山水分隔，地形複雜，南方經濟區往往以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為

²¹⁶ 甘霖，《變局——前 11 世紀以來至 21 世紀中國區域發展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 1 版），頁 133。

²¹⁷ 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頁 4。

²¹⁸ 甘霖，《變局——前 11 世紀以來至 21 世紀中國區域發展與社會變遷》，頁 121-122。

範圍，以一兩個較大的城市為中心。²¹⁹南方自然條件佳，有利於糧食與財賦的創造，若就開支及糧食供應的來源來看，早在隋朝時，主要是關東和黃河下游的糧食、布帛以給京師。唐初以來，關中糧食不足以供中央政府所需，唐廷常至洛陽就食。不過在唐玄宗以前，關中食糧除自給一大部分外，其他部分大多來自隴右、河西等地。安史亂後，關中糧食的供應則主要依靠江淮及江南地區。唐中葉以後，天下財賦更是一半以上出自江淮和江南。自黃巢起義發生，又進一步動搖唐朝的統治基礎。唐末方鎮林立，勢力壯大，將江南財賦據為己有，唐朝財源斷絕，因無法維持便滅亡了。至北宋時強化中央集權，集重兵於京師，兵多官多，朝廷開支驟增，更仰賴南方漕運，如真宗「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²²⁰北宋之所以建都開封，主要由於開封與東南財富集中之地靠近，且漕運便利。同時，統一王朝內各地方財賦收入的上供與留用，愈來愈不平衡，而江南六路是宋代的主要財源。其後，南宋以偏安政權，處於強敵威凌之下，而能享國一百五十年之久，這是由於據有經濟重心地區，經濟得以持續發展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宋人南渡，標誌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徹底完成。從此，以東南地區為中心的南方，取代黃河流域成為中國經濟重心之區。²²¹

2. 北方經濟的衰弱

綜觀一千數百年間南北地區經濟開發發展的過程，可以看到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即北方黃河流域經濟，大致隨朝代更替而出現破壞、恢復、繁榮的週期性現象，每一朝代發展水準皆高於前朝。南方經濟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尚處於不發達狀態，進入三國兩晉南朝，其後期發展呈現持續上升的態勢，直至唐代南北經濟出現全面繁盛的局面。唐中期以後，這種南北經濟的規律性現象，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南方經濟繼續持續發展，北方經濟的週期性發展則不復存在，並從此衰弱下去，中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南方地區確立以江南為中心，於此後

²¹⁹ 同前註，頁 121。

²²⁰ 《宋史》，卷 175，志 128，〈食貨上三・漕運〉，頁 4252

²²¹ 甘霖，《變局——前 11 世紀以來至 21 世紀中國區域發展與社會變遷》，頁 123。

千餘年在中國歷史上佔據了經濟上的主角地位。

探討北方經濟衰弱的原因，通常歸結為戰亂。戰亂是摧殘民生經濟的一個嚴酷因素，它不僅造成生產無法持續正常進行，且直接摧毀各種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戰亂並非導致北方經濟衰弱的最終原因，而是受戰爭破壞之後的恢復工作之中斷，如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和黃巢之亂之後，北方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黃河氾濫成災，北方經濟無法恢復。不僅如此，黃河氾濫的災害，影響到鄰近的淮河，使向稱水利之便的淮河也成為一條害河，直接導致富庶的兩淮地區也衰敗下去。淮河流域的兩淮地區，是秦漢以後中原經濟文化南向擴展的重要據點。昔時淮河東流入海，湖泊沼澤經整治，水利大興很快成為富庶之地。這一地區又是南北過渡地帶，南北對峙往往以此為交兵之所，即便如此，雙方於戰爭間隙多在這裡屯田，作為後勤保障基地。經唐代前期的建設，兩淮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後來兩淮地區的衰弱，始自宋室南遷，建炎二年（1118），南宋東京留守杜充決黃河由泗入淮，以阻遏金兵南下，是為河道南遷之始。淮河水系嚴重紊亂失調，水利破壞，兩淮經濟一蹶不振。由於淮河與黃河兩大流域經濟衰敗，有著緊密的相關性，遂將北方經濟在東南地區的南界由淮河一線推至長江一線。因此下文提及東南地區一般不包括江淮地區，而是指長江沿岸及其以南區域。²²²

（二）襄陽地區經濟地位的衰弱

襄陽地區亦是南北過渡地帶，也出現了經濟重心南移的現象。襄陽地區（在此主要指襄州或襄陽府的範圍）位在長江中游漢水流域上，當地工商業發展的特點在歷史發展的縱向考察下，可發現其發展具有歷史的不平衡性，只有南北對峙、社會動盪時，其戰略地位才能得以體現；而這種體現最突出的歷史時段就是在宋代，特別是南宋。唐宋時，襄陽地區繼南陽盆地後，成為漢水流域的核心地帶，而南宋時期自靖康之難至南宋滅亡，襄陽地區的歷史地位達到它的頂峰，其控扼南北重要的軍事地理位置無可取代，襄陽存亡成為南宋最後的精神支柱。

²²² 同前註，頁 126-132。

然而若由長時段的人口與城鎮密度發展，來看漢水流域經濟重心的轉移：由兩漢時期的南陽盆地，到唐宋時期以襄宜平原為重心，南宋後襄陽地區的核心地位逐漸旁落，漢水下游地區的鄂州則取而代之。

此外，再以江漢平原範圍內作橫向地理考察，比較襄州、江陵府（今湖北沙市市）與鄂州（今武漢武昌）三地工商業發展狀態。由商稅額觀之，襄州商業水準高於鄂州與江陵；以酒課額來看，則是區域面積最大的江陵府酒務數最多、酒課額也最大，其次才為襄州、鄂州，這與前述歷史發展來看鄂州的崛起與取代襄陽情形不合，因此，馮波再以兩宋時期三地的人口變化與襄州、江陵兩地人口密度來看。經唐末五代的混戰，三區的人戶皆有不同程度的衰減，北宋至北宋中、後期，襄陽與江陵府經濟逐漸發展，人戶數量也日漸恢復。靖康亂後，襄陽成為與金對峙的前線地區，大量中原人口南遷，加上盜賊四起，襄陽地區人口數量銳減，江陵與鄂州也是人口凋零。南宋時，襄陽地區因位於宋金兩軍折衝之地，受戰爭影響「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²²³經濟嚴重受挫，交通受阻。其後，隨著南宋政權與戰局的逐漸穩定，孝宗即位後銳意恢復，令襄陽地區招民墾田，並興修水利以廣灌溉，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移民的開拓下，經濟漸有緩慢的恢復，然其經濟發展仍遠遠不及鄂州在南宋一百多年間發展快速。鄂州的崛起，主要為南宋國都南遷後，造成政治重心轉移至臨安，經濟重心也完成南移，東南貢賦與物資的運送皆倚賴長江水系。位於江漢交會間荊鄂長江幹道，又是襄漢漕道起點的鄂州，因而取代了襄陽，成為重要的貨物轉運中心，作為長江航道運輸的重要城市，經濟與工商業發展水準已漸超過襄州。²²⁴

²²³ (宋)李綱，《梁谿集》，卷 81，〈論襄陽形勝劄子〉，頁 6-7，總頁 1126-128。

²²⁴ 以上有關襄陽地區之經濟重心南移至鄂州之研究，主要參見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第四章，頁 73-81。

第三章 社會生活

本章主要針對襄陽地區社會生活作一論述，共分為三節，一為人口與移民，探討襄陽地區人口組成之狀況、兩宋各時期襄陽移民情況，以及移民所帶來的影響；第二節由民俗風情、當地物產及娛樂節慶，來了解襄陽地區人民生活之概觀；第三節則探討襄陽地區富族土族的地方勢力，及其他當地社會團體，對於襄陽地區社會秩序之控制與影響。

第一節 人口結構與移民

一、人口

人口是最主要的生產力，人口數量的增減與組成質量，直接影響一地之經濟與社會發展。因此欲了解地區的社會生活榮枯，須掌握人口之演變及狀態。

（一）戶數

關於北宋各地戶口數目，有著比較完整、系統的資料主要為《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宋會要輯稿》與《文獻通考》，其餘零星戶口資料，散見於宋人文集與地方志中。現據上述資料製表 3-1 如下：

表 3-1 兩宋時期全國諸路戶數與增長率一覽表

太宗十道	元豐二三路	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戶數	神宗元豐三年（1080）戶數及增長率（%）		徽宗崇寧元年（1102）戶數及增長率（%）		高宗紹興 32 年（1162）戶數及增長率（%）		寧宗嘉定 16 年（1223）戶數及增長率（%）	
河南道	開封府	1,230,139	235,599	180	261,117	110	----	----	----	----
	京東東路		696,456		817,355	117	----	----	----	----
	京東西路		663,210		526,098	79	----	----	----	----
	京西北路		602,060		545,098	90	----	----	----	----

關西道	永興軍路	356,895	846,045	235	1,001,498	118	-----	-----	-----	-----
隴右道	秦鳳路	61,137	509,799	-----	449,884	98	-----	-----	-----	-----
河東道	河東路	261,053	567,198	220	613,532	106	-----	-----	-----	-----
河北道	河北東路	586,623	667,897	210	668,757	100	-----	-----	-----	-----
	河北西路		564,762		526,204	93	-----	-----	-----	-----
劍南道	成都府路	867,488	864,406	154	882,519	102	1,097,787	124	1,139,790	104
	梓州路 (潼川府)		478,171		561,898	118	805,364	143	841,129	104
江南道	兩浙路	1,883,957	1,778,953	368	1,975,041	111	2,243,548	114	2,220,321	99
	福建路		1,043,839		1,061,759	101	1,390,566	131	1,599,214	115
	江南東路		1,127,311		1,012,168	89	966,428	95	1,046,272	108
	江南西路		1,287,136		1,664,754	129	1,891,392	114	2,267,983	120
	荆湖南路		871,214		952,397	109	968,931	102	1,251,202	129
	荆湖北路		657,565		580,636	88	254,101	44	369,820	146
淮南道	淮南東路	378,616	612,565	358	664,257	108	110,897	167	127,369	115
	淮南西路		744,499		709,919	95	52,174 (註①)	7	218,250	418
山南道	京西南路	433,712	314,580	208	472,358 228,650 (註②)	150	42,707	19	6,252	15
	利州路		336,248		295,829	87	371,097	125	401,174	108
	夔州路		254,361		-----	-----	386,978	-----	207,999	54
嶺南道	廣南東路	96,978	579,253	863	-----	-----	513,711	-----	445,906	87
	廣南西路		258,382		-----	-----	488,655	-----	528,220	108

註①：僅蘄、舒、黃三州戶口數，其餘缺。

註②：此數據為崇寧元年戶數 472,358，扣除割給金人的唐、鄧州兩州，以作為紹興三十二年計算增長率的基數。

資料來源：本表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 37、39，頁 151、161-163；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頁 61-62 之附表改動後編成。原始出處，太宗朝據《太平寰宇記》；神宗朝據《元豐九域志》；徽宗朝據《宋史》，卷 85-90，〈地理志一~六〉；高宗朝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十九；寧宗朝據《文獻通考》，卷 11，〈戶口二〉所載。

從長時段來觀察，太宗朝至神宗元豐時期，全國各地戶數皆呈現穩定成長的現象，京西南路亦是如此，約百年內戶數成長二倍之多。神宗朝至徽宗崇寧元年（1080-1102），據表可知，京西南路為此時段全國戶數增長最為快速的地區，增長率為徽宗時期的 150%。因此單就戶數的增長來看，可反映出當地經濟有一定的發展，但並不意味其經濟的發達，因為若以百分比來表示時，基數小的戶數增長率往往看似較高。若進一步分析比較，本路與神宗及徽宗朝的全國各路戶數相

比，可知元豐年間其戶數僅略高於廣南西路、夔州路。及至徽宗崇寧元年（1102），除前述兩路外，戶數增長率略高於利州路與秦鳳路，然此四路多半屬於偏遠邊陲之地區，不然就是屬經濟不發達的區域。

南宋紹興十年（1140），假若將崇寧戶數減去割給金人的唐、鄧兩州與已不屬京西南路的金州，則僅剩約崇寧時期戶數 472,358 的一半，即便如此，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短短二十二年的時間，八州軍之戶數由 228,650 降至 42,707 戶，僅剩不到原有數據的五分之一，可見宋金戰爭造成人口銳減與戶口破壞之速。據《文獻通考》所載，嘉定十六年（1223），京西路六州僅剩 6,252 戶，²²⁵如僅從數據上看可想見當地應為荒空一片、人跡杳然，然而數據僅為當地主戶數量，戰爭迫使北方流移軍民至此者或徵調而來的軍隊，因無法落籍歸戶，而成為隱匿未知之人口，至於詳細移民的部分，則留待下文說明。自嘉定十六年（1223）的數據後，直至宋亡（1279），因宋廷疲於戰事，長達五十六年的時間未有人口戶數之統計資料，殊為可惜。

（二）主、客戶分析

自中唐實行兩稅法後，主戶與客戶的記載正式見諸國家戶籍。這種戶口分類的制度，至宋朝仍沿用。與唐代相比，宋朝劃分主、客戶的標準有很大的不同。唐朝的主、客戶是依籍貫來區分，主戶是土著戶，客戶是僑寓戶。宋代主、客戶的區分則以有無常產，亦即有無田地、房產等作為主要依據，籍貫則降為次要因素。宋朝所謂主戶，乃是「有常產之人也，客戶則無產而僑寓者也。」²²⁶在鄉村中，客戶基本上也就是佃戶。²²⁷宋人石介有言：「鄉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傭而耕者，謂之客戶。」²²⁸即是借耕牛農具，受僱於人，為人耕田者。

²²⁵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11，〈戶口二〉，頁 117-1。

²²⁶ (清)徐松輯，《宋會要》，食貨 12 之 19-20，〈身丁〉，頁 5003。

²²⁷ 楊果，〈北宋時期主戶與客戶的地理分布——以今湖北地區為例〉，《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 年 6 月，頁 63-66。

²²⁸ (宋)石介，《徂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8，〈錄微言者〉，頁 5，總頁 231。

就北宋而言，宋太宗時期所著的《太平寰宇記》與神宗時期之《元豐九域志》，在其戶口統計中，皆有主、客戶的區別，而據此整理為表 3-2。

表 3-2 宋代太宗神宗時期主客戶分析表

《太平環宇記》 所載一〇道	《元豐九域志》 所載二三道	主 戶		客 戶		總 戶 數		客戶占總戶數%	
		太宗時	神宗時	太宗時	神宗時	太宗時	神宗時	太宗時	神宗時
河南道	總 計	3,560,797	10,883,686	2,547,838	5,686,188	6,108,635	16,569,874	42	34
	開 封 府		183,770		51,829		235,599		22
	京 東 東 路	662,694	404,092	567,445	292,364	1,230,139	696,456	46	42
	京 東 西 路		451,038		212,172		663,210		32
關西道	京 西 北 路		331,904		270,156		602,060	45	45
隴右道(1)	永興軍路	21,259	626,412	146,636	219,633	358,895	846,045	41	26
	秦 鳳 路	25,204	345,172	35,969	164,027	61,173	509,799	59	32
河東道	河 東 路	204,993	465,408	56,060	110,790	261,053	576,198	21	19
河北道	河北東路		473,818	205,239	194,079	586,624	667,897	35	29
	河北西路	381,385	417,858		146,904		564,762		26
劍南道	成都府路		620,523	300,749	243,880	867,488	864,403	35	28
	梓 州 路	566,739	248,481		229,690		478,171		48
	兩 浙 路		1,418,682				360,271		1,778,953
江南道	福 建 路		580,136	733,842	463,703	1,833,957	1,043,839	40	44
	江南東路		926,225		201,086		1,127,311		18
	江南西路		835,266		451,870		1,287,136		35
	荊湖南路		475,677		395,537		871,214		45
《太平環宇記》 所載一〇道	《元豐九域志》 所載二三道	主 戶		客 戶		總 戶 數		客戶占總戶數%	
總 計		太宗時	神宗時	太宗時	神宗時	太宗時	神宗時	太宗時	神宗時
淮南道	淮南東路	3,560,797	10,883,686	2,547,838	5,686,188	6,108,635	16,569,874	42	34
	淮南西路		409,884		202,681		612,565		33
山南道	京西南路	161,776	425,753	216,840	318,746	378,616	744,499	57	43
	利 州 路		147,871		166,709		314,580		53
	夔 州 路		189,133		147,115		336,248		44
嶺南道	廣南東路	173,131	75,453	260,581	118,908	433,712	254,361	60	70
	廣南西路		355,986		223,267		579,253		39
		72,501	195,144	24,477	63,238	96,978	258,382	25	31

由北宋全國客戶占總戶數的比例來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至端拱二年（989）為 42% 和神宗元豐初年全國客戶約占 34%，客戶占總戶數約三成至四成。但就針對襄陽地區所在範圍來看卻不然，在太宗時期的十道之中，客戶占總戶比例超過五成的有山南道、淮南道與隴右道，其中客戶所佔比重最高者為包含襄陽地區的山南道，占總戶數 60%；淮南道客戶占總戶數為 57%；隴右道則占總戶數 59%。而神宗時期，全國分為二十三路，客戶之比重超過總數之半的路分則有：夔州路、荊湖北路與京西南路，客戶占總戶數分別為 70%、57% 與 53%。可見北宋太宗至神宗時期，襄陽地區主要為客戶集中的區域之一。

接下來將焦點放在襄陽地區其境內各州軍之主、客戶的分布情形上。下列整理為表 3-3 如下

表 3-3 北宋太宗、神宗兩朝襄陽地區各州軍主客戶統計表

項目	《太平寰宇記》				《元豐九域志》			
	太宗朝太平興國年間				神宗元豐三年（1080）			
	主戶	客戶	總戶數	客戶占百分比	主戶	客戶	總戶數	客戶占百分比
州軍別								
唐州	2,387	5,041	7,428	68	21,785	11,243	33,001	34
鄧州	6,010	14,366	20,376	71	17,370	17,105	34,475	50
襄州	11,363	15,529	26,892	58	40,772	52,255	93,027	56
光化軍	3,685	3,345	7,030	48	----	----	----	----
均州	3,792	3,827	7,619	50	21,946	5,032	26,978	19
房州	4,882	690	5,572	12	14,118	7,113	21,231	34
隨州	3,164	3,049	6,213	49	12,135	25,977	38,112	68
郢州	1,308	2,658	3,966	67	6,640	24,935	31,575	79
金州	3,617	8,415	12,032	70	13,132	23,049	36,181	64
合計	40,208	56,920	97,128	59	147,871	166,709	314,580	53
屬山南東道 9 州					屬京西南路 8 州 30 縣			
資料來源：據(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2-145，〈山南東道一~四〉；《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南路〉，頁 15-28，總頁 471-20~471-26。								

據上表來看，太宗初期襄陽地區客戶占總戶數的 59%，其中客戶比率大於總戶數一半的州境為唐州、鄧州、襄州、均州、郢州、金州等六州；而神宗時期其中客戶仍過半，占總數的 53%，其中客戶比率超過總戶數一半的州境則為襄州、隨州、郢州、金州五州。整體而言，太宗至神宗朝超過半數州境主戶皆持續增長，也接受為數不少的客戶。相較之下，房州為太宗時客戶比例最少的州，僅 12%，至神宗時才增至 34%，可能與其位在自然環境較為閉塞的山區，造成交通不便，不易促使客戶到來；均州則是太宗朝客戶比例占半數，至神宗時則降至 19%，主要是表現在主戶數量明顯增加，可能與地方經濟日漸發展，使得在地人戶得以安業有所增長，相形之下便壓低了客戶的比率。

二、移民

（一）北宋時期

由前述主客戶的分布情形可知，至少北宋時期襄陽地區客戶所占比例較高，可見接納了許多外來移民。造成人民遷徙的主因，大致可分為：朝廷政策之推動、自然災害的影響，以及戰亂迫使人民自發性的避難。

北宋初期，襄陽地區的移民主要是來自朝廷政策的考量，宋太祖時統一大業尚未完成，為了削弱北方其餘政權之勢力，故移入大批北漢及遼國統治區域的人民進入河南、京西等地。此外，對於經濟開發緩慢的地區，朝廷下詔廣招流民屯墾，除了可充實本土人戶並可開發更多有利的資源。

在五代十國區域政權中，位今山西中部和北部的北漢是唯一建立在北方的割據政權。由於離首都開封近在咫尺，北宋建國之後即視其為腹心之患，開始攻打北漢，但屢攻不克，直到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才予以平定。²²⁹為了削弱北漢政權，自太祖時即採取擄掠北漢人民遷移至宋朝中心地區，以削弱其軍事力量的作法，例如開寶二年（969）正月，太祖下詔親征太原，²³⁰久攻不下，²³¹乃採

²²⁹ 《宋史》，卷 4，本紀 4，〈太宗一〉，頁 62。

²³⁰ (宋)李燾，《長編》卷 10，「太祖開寶二年春正月戊午」條，頁 2。

絳州（今山西新絳縣）人薛化光之建議：

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今河南洛陽市）、襄（治今湖北襄樊市）、鄧（治今河南鄧州市）、唐（治今唐河縣）、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²³²

此一建議主要是由戰時擄掠之人民遷徙至內地之策略，進一步擴大到將連一般民戶亦成批遷入宋境，以強制移民削弱北漢國力，最後予以平定。閏五月「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²³³遷移的人戶多達萬戶，才能造成國力的動搖。而襄州、鄧州、唐州也因此接受了大批北漢人民。

對遼方面，因宋遼政府一般情況禁止人民相互遷移，因而移民現象較為少見。引起遷移的主因有時來自遼國境內發生重大自然災害，例如仁宗天聖七年（1029），因「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仁宗以雖契丹為境外，然「皆吾赤子可不賑救之」為由，詔河北轉運使將其「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閑田，所過州縣給食人二升」，使之定居下來。²³⁴因此，除了太祖、太宗初期直至仁宗時期，襄陽地區亦陸續接收不少來自燕雲地區的遼國災民。

襄陽地區除了有因北宋朝廷政策推動下的強制移民，亦有不少因政府招民墾荒而遷入的墾殖移民。京西一帶自唐末五代以來因戰爭造成農業與經濟衰退，如前所述朝廷於太宗至仁宗年間曾多次下詔，廣招流民屯墾，積極地促使流民得以於此安居復業。然而，至少直至仁宗康定元年（1040）其間「自京以西，土之不

²³¹ (宋)李燾，《長編》卷 10，「太祖開寶二年閏五月己未」條，頁 9。

²³² 同前註。

²³³ 同前註。

²³⁴ (宋)李燾，《長編》卷 107，「仁宗天聖七年三月庚辰」條，頁 11。

闢者不知其數」，其中尤以「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²³⁵可見京西地區尤其唐州、鄧州一帶，未開墾之田土仍多，且土地利用情形仍然不佳。對於此種情形，朝中議論不一，「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²³⁶。嘉祐年間（1056-1063），唐州知州趙尚寬，對上述議論則認為：

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²³⁷

如此積極修復水利設施、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因而召集四方之民前來墾耕，其更按口授田，並與民貸款買牛。其政策實施一年，「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且「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為膏腴」。²³⁸及至三年，人口增至萬餘戶，因其政績卓著，「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²³⁹且「遂留再任」。²⁴⁰

英宗治平元年（1064），高賦繼任唐州知州，延續趙尚寬廣招流民闢地墾荒之政策，除了「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處）」，並減輕賦稅，「流民自占者，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²⁴¹其任滿後亦再留任，「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²⁴²並使州境內之「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幾無曠土，政府稅收亦有所增長。²⁴³

²³⁵ (宋)李燾，《長編》，卷 129，「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條，頁 16。

²³⁶ 《宋史》，卷 173，志 126，〈食貨上一·農田〉，頁 4165。

²³⁷ 《宋史》，卷 426，列傳 185，〈趙尚寬〉，頁 12702。

²³⁸ 《宋史》，卷 173，志 126，〈食貨上一·農田〉，頁 4165。

²³⁹ 《宋史》，卷 426，列傳 185，〈趙尚寬〉，頁 12702。

²⁴⁰ 《宋史》，卷 173，志 126，〈食貨上一·農田〉，頁 4165。

²⁴¹ 《宋史》，卷 174，志 127，〈食貨上二·賦稅〉，頁 4210。

²⁴² 《宋史》，卷 426，列傳 185，〈高賦〉，頁 12703。

²⁴³ (宋)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24，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1 版），卷 43，〈高公墓誌銘〉，頁 5。

至於鄧州地區常與唐州並提，因此亦有為數不少的移民至此墾荒。熙寧四年（1071）七月，神宗分田給流民的詔令，也下達唐、鄧二州。²⁴⁴韓維任汝州知州時，聽聞唐州因招誘百姓墾荒，造成「河東貧民多入唐鄧間以就熟請田」，其統計汝州城門所過人數，「十日中約有兩千餘口」，²⁴⁵由於短期內移民人數眾多，韓維憂慮大批移民至唐、鄧間，若未能盡應其求，可能造成百姓再度流離失所，以致滋生事端，故奏請朝廷督促當地官員檢括閒田、撥發牛具糧種等，使民安業。

由此可見，唐、鄧諸州因政府與地方官員採取興修水利以改善生產條件、減輕賦稅使民樂輸、將荒地按口分田給移民等諸多政策，優渥的條件除了北宋初期來自北漢與遼國的移民投入農事外，更吸引了來自淮南、湖北、河東等地的貧民百姓前來墾荒，若加以妥善安置，對當地社會安定及經濟發展有相當助益。

襄陽地區還有因避黃河之害而流徙的移民。黃庭堅記載一次因河北水旱災害和地震而產生的人口遷移，提到：「幾州累累襁負襄（州）、葉（縣）間，問舍無所，耕無牛。初來猶自得曠土，嗟！爾後至將何怙？」²⁴⁶顯然為躲避自然災害向未全然開墾地區遷移的移民活動。宋代黃河決溢次數較多，加速了華北生態環境的惡化進程，為避災而形成的移民應有一定規模，只是文獻中缺乏這方面的記載。²⁴⁷

（二）宋金戰爭時期

北宋末期南宋初期，由於金國大兵壓宋，中原板蕩，江山失陷，上自皇室下至廣大平民百姓，在戰亂中紛紛逃離中原南下，形成了大規模的遷徙與移民浪潮。南宋時期，大約有五百萬人從中原南下江淮、閩廣等南方地區，這些南遷人口的流向，幾乎遍及南宋全國各地，但主要流入地是長江流域以及江南、福建、

²⁴⁴ 《宋史》，卷 15，〈神宗紀〉，頁 280。

²⁴⁵ （宋）韓維，《南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0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25，〈論河東流民札子〉，頁 1-2，總頁 1101-715。

²⁴⁶ 黃庭堅，《山谷外集詩注》（收入《四部叢刊續編·集部》，冊 3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1 版），卷 1，〈流民嘆〉，頁 13，總頁 14692 下。

²⁴⁷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 1 版），第四卷，頁 43-44。

荊湖地區，並具有沿交通主幹道移民的特點。至宋代，北方人口逃亡南遷已經形成了多條中原南下道路，其主要幹道有三：一是運河水道，經運河水道可以由東京開封直達江南各地；二是從南襄道南下，沿漢水至荊湖地區；三是從關中平原越秦嶺入四川地區（其實是多條越秦嶺入四川道路的總匯）。在南宋初期，這三路首當其衝成為中原兵民南遷的主要道路。²⁴⁸

第二條的南襄道，主要是指今河南南陽盆地與湖北襄樊之間的古代道路。從北部的開封、洛陽南下，經許州至南陽盆地進入襄陽；從東部的蔡州西進，經唐州進入南陽盆地即達襄陽；從西北長安經商山道可進入南陽盆地至襄陽。進入襄陽後，往南可入江陵，往東南可入漢陽一帶，再直驅長江，至江西、福建、兩廣等地，或是向西轉入房州，經竹山溯堵水而上，翻過大巴山入四川達州。²⁴⁹可見襄陽地區作為中原南下江淮、西進四川等地的主要必經通道，其交通區位十分重要。而宋金戰爭期間，也因其重要的交通地理區位，自然成為接納北方南逃民眾的第一線。

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軍大舉攻宋。至十一月，兩路金軍進逼開封，「河東、澤、潞州官吏多棄城走西京」，「士庶攜老提幼，適汝、潁、襄、鄧逃避者，莫知其數」。²⁵⁰及開封陷，奪門而逃的數十萬軍民，被金軍鐵騎驅散，部分軍民「有得脫者，悉走京西，聚為盜賊」，²⁵¹因而成為北方流民武裝集團，在靖康至紹興初年，襄陽地區成為其主要活動範圍。如建炎元年（1127）北方流民武裝集團李孝忠部「以眾寇襄陽府，京西安撫使黃叔敖棄城走，孝忠自南門入城……遂據其城而不去。」²⁵²建炎四年（1130）桑仲和紹興初之李橫部眾都佔據過襄陽一帶，²⁵³並且進犯光化軍、均州及房州等州境。其後，有的在這一帶被擊潰或是

²⁴⁸ 張錦鵬，《南宋交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1版），頁354-355。

²⁴⁹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頁142、143。

²⁵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64，〈靖康中帙三九〉，頁8，總頁(二)之46。

²⁵¹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70，〈靖康中帙四五〉，頁9，總頁(二)之91。

²⁵²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04，〈炎興下帙四〉，頁6，總頁(二)之303。

²⁵³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36，建炎四年八月戊戌，頁698；卷61，紹興二年十二月辛亥，頁1054。

被招安、任官，因此不少原有部眾定居在此。²⁵⁴

同時，建炎二年至三年間（1128-1129），因金軍的節節進逼，南下攻入唐、鄧、襄、均等州境，宋朝守將、官員或因怯懦遁走或率眾南逃，致使北方軍民百姓逃亡偏僻山間或轉徙江南，甚至兩廣、福建等山區。如：建炎二年正月二日，金軍「尼楚赫攻鄧州，安撫使范致虛棄城走」，河東制置使趙宗印，「以其兵帶挾民出城入房州往襄陽」；²⁵⁵金軍十一日陷均州，「知州楊彥明棄城走」，「境內百姓流徙而去」，而「彥明全家上武當山」；²⁵⁶建炎三年（1129），河東經制司屬官宣義郎王擇仁率軍萬餘人，原本欲自商州奔往漢中，但為金州熟瑱所拒，故屯於襄陽。²⁵⁷

至紹興四年（1134）岳飛收復襄陽、隨、郢三府州時，皆只剩空城一座，「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擄，或遭殺戮，甚為荒殘」，²⁵⁸土著人口數量已嚴重下降。當戰火稍息，襄陽地區也陸續招民安業，不少移民與北方歸正之人開始遷入，如著名將領孟宗政之父孟林，即在紹興年間遷入隨州。紹興五年（1135），知房州晉鷺因「招軍治城，招集餘民至四千餘戶，墾田及六分以上」受到獎勵。²⁵⁹紹興十三年（1143），均州知州黃牧之，「欲錄用歸正胥朝、杜海、馬清子孫」，²⁶⁰三十一年（1161）招到胥朝、杜海等率領的北界忠義人二萬餘人和老小數萬口。²⁶¹顯見胥朝、杜海等人及其子孫，和部分北界忠義人都定居在此。紹興中期在外避難多年的襄陽人王之望返鄉，賦詩敘其所見：「相逢訪親舊，十百不一遇。豈無新人民，往往皆旅寓。」²⁶²可見，當地原有住民流失嚴重，即使有新住民也都

²⁵⁴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頁 96、97。

²⁵⁵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14，〈建炎下帙十四〉，頁 8，總頁(二)之 365。

²⁵⁶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14，〈建炎下帙十四〉，頁 12-13，總頁(二)之 368。

²⁵⁷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27，〈建炎三年閏八月乙巳〉，頁 552。

²⁵⁸ (宋)岳珂，《金佖粹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4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0，〈條具荊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頁 15，總頁 446-400。

²⁵⁹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95，〈紹興五年十一月甲戌〉，頁 1569。

²⁶⁰ (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4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78，〈均州黃使君〈牧之〉墓碣〉，頁 13，總頁 1147-819。

²⁶¹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34，〈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四〉，頁 3，總頁(四)之 270。

²⁶² (宋)王之望，《漢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3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贈襄陽帥吳彥猷〉，頁 17，總頁 1139-671。

是僑寓至此地之人。

紹興三十一年（1161）四月，金海陵王欲發動南侵，據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報告，荊襄地區「西北來歸之人甚眾」，²⁶³如均州武鉅招納金界忠義歸明人兩萬餘人並老小數萬口、²⁶⁴金界鄧州人蘇儔率家屬和客戶四千餘人遷入湖北等，²⁶⁵可知宋朝此時又接納了許多北方來歸之人。孝宗隆興元年（1163）十二月，隆興和議成立後，宋金戰爭狀態解除，北方人口南遷也暫且告一段落。

（三）宋蒙滅金時期

寧宗嘉定四年（1211）秋，在蒙古猛烈攻金下，嘉定七年（1214），金宣宗被迫遷都南京（今開封），金國國土範圍大減，「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²⁶⁶十年（1217）四月，金軍開始攻宋。是故寧宗、理宗之際，宋金間因蒙古南來，戰事再度趨於頻繁，因此再次出現北方人口南遷的浪潮。不少北方百姓為避戰亂，自發性地遷入南方。如淄州人楊弘道、平州人王元粹都在金末避亂於襄漢。²⁶⁷理宗紹定六年（1233）五月，有金朝鄧州守將移剌瑗見「天興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納款，宋以兵馬轄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病死」，²⁶⁸宋朝因而「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²⁶⁹這些人口最初都留在唐、鄧，隨著蒙軍大舉攻宋，部分軍民可能隨宋軍南遷。²⁷⁰

除了逃亡的饑民百姓及來自金界的歸正人外，襄陽地區尚有大批宋廷由他處調派而來的駐防軍隊，以及新從北方遷入為數不少的「北軍」。據魏了翁所奏：

²⁶³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98，〈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壬辰〉，頁 3337。

²⁶⁴ (清)徐松輯，《宋會要》，兵 15 之 9，〈歸正上·蕃夷〉，頁 7007。

²⁶⁵ (清)徐松輯，《宋會要》，兵 15 之 10，〈歸正上·蕃夷〉，頁 7007。

²⁶⁶ 佚名，《兩朝綱目備要》（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冊 10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不詳），卷 15，〈（嘉定七年）九月甲申〉，頁 7。

²⁶⁷ (清)陳衍，《元詩紀事》（台北：鼎文書局，1971 年 9 月初版），卷 30，〈楊弘道〉，頁 578；卷 33，〈王元粹〉，頁 615。

²⁶⁸ (元)劉祁《歸潛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6，頁 10，總頁 1040-264。

²⁶⁹ 《宋史》，卷 412，列傳 171，《孟珙》，頁 12371。

²⁷⁰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頁 29。

臣聞之道路三邊之地，華夷雜居，號為中原遺黎者，猶能道政宣間事，以為籍口，而其間裔夷種類，包禍蓄亂者不可勝數。如襄陽朱屯數年前正軍猶是四萬餘人，而北軍三寨之在城外者不及三千，已有難制之憂。今正軍日闕，北軍已增近二萬。……況揚為淮東衝要，襄為湖北屏翰，今降附之人，居其太平（半），豈特可為廩廩，直可為痛哭流涕也。²⁷¹

由上文可知，北方遷入的「北軍」人數由三千增至二萬之多，已逐漸取代宋廷原有之「正軍」規模，而位居宋金邊界之襄陽地區，因大批北方平民遷入，故半數居民皆為降附之人，可見移民人數之眾多。此外，自南宋以來，大量北人南來，諸多因素引發南人北人間的猜忌不和，然而「懦怯南兵，不足為用」，²⁷²仍需依靠北人組成之軍隊，因此北軍雖曾因宋廷錯置失當而發生叛亂，²⁷³仍持續招北人組成新軍。如嘉定末，荊鄂都統制孟宗政知隨州棗陽軍，「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創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²⁷⁴端平元年（1234），孟珙「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組成「鎮北軍」。²⁷⁵其後，更「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²⁷⁶足見襄陽地區北來歸順之人眾多，並成為宋朝戰鬥力的重要來源。

（四）宋蒙戰爭時期

宋蒙對峙期間，襄陽地區一變而為移民輸出區，移民僅是短暫居留，更多是

²⁷¹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19，〈被詔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四劄〉，頁 14，總頁 186 下。

²⁷²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09，〈紹興七年二月戊寅〉，頁 1775 載：「趙鼎所言為四月丁未。」

²⁷³ 《宋史》，卷 42，〈理宗本紀二〉，頁 810 載：「（端平三年）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焚城郭倉庫，相繼降北。時城中官民兵四萬七千有奇，其財粟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亡，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乘火縱掠，襄陽為空。制置使趙范坐失撫御，致南北軍交爭造亂，詔削官三秩，落龍圖閣學士，姑仍制置職任」。

²⁷⁴ 《宋史》，卷 403，列傳 162，〈孟宗政〉，頁 12213。

²⁷⁵ 《宋史》，卷 412，列傳 171，〈孟珙〉，頁 12374。

²⁷⁶ 《宋史》，卷 412，列傳 171，〈孟珙〉，頁 12376。

避往江西、福建、兩廣等地及深山僻野之處。理宗端平二年（1235）蒙古軍全面攻宋以後，荊襄和淮南一帶重新淪為戰場，南宋政府下令江淮清野，百姓為避難紛紛南遷。²⁷⁷端平三年（1236），由於京湖安撫制置使趙范對駐守襄陽之南、北軍統治失御，北軍反叛，南軍趁火劫掠，致使蒙軍麾軍南下時未能阻扼，造成京西南路一府八州相繼失陷。嘉熙元年（1237），宋朝「已失京西諸州軍，士多徙寓江陵、鄂州」，²⁷⁸襄陽地區的陷落也迫使當地士人不得不往南方遷徙。嘉熙二年（1238），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兼知鄂州，收復襄陽地區，並召集北方流民、歸順人組成忠衛、先鋒軍以拱衛襄陽。其後，襄陽境內主要是移調駐防的軍隊在此，如孟珙、李曾伯等將領先後經理屯戍，雖然對襄陽一帶暫有恢復，但隨著咸淳年間戰事愈烈，蒙軍圍攻益急，使當地人口銳減，猶如荒城。

綜上所述，宋金戰爭期間，自靖康之變以來，陸續有河東、河南等地軍民向襄陽地區遷移，部分軍民成為武裝流寇集團，欲從荊襄地區南下，經宋廷招安與擊潰後，不少流民因而定居在此。隨著宋金戰事激烈，派駐襄陽境內之南、北軍亦成為當地人口之主體。金滅亡前後，宋朝又吸收大批金移民與歸正人。因此，襄陽地區雖入南宋後成為宋金戰爭之前沿地區，當地土著人口大量減少，卻也吸納了大量外來移民，使僑寓之人成為當地人口主體。端平年間，宋蒙間兵端再啟，戰事比以往更加激烈，互有攻防，襄陽地區成為廝殺戰場，然大半時間皆淪為荒城棄地（1235-1279，約 45 年之久），若有北方來歸之人則多招募收編為軍隊，原有居民得脫逃者則多南下避難。

²⁷⁷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頁 30。

²⁷⁸ 《宋史》，卷 156，志 109，〈選舉二〉，頁 3641。

第二節 風俗民情與節慶

一、語言民風

(一) 語言方面

襄陽地區除了在地理上位居南北疆界的秦嶺、淮河之間，其所屬漢沔水系亦溝通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其四通八達交通便利的特性，在南北政治動盪時期亦成為百姓流民匯聚與進出的地帶。從文化源流來看，其地處三大文化區的邊緣地帶，受巴蜀文化、秦隴文化與荊楚文化的交叉影響，因此形成一種過渡型態的風俗文化區，使得本地區的風俗民情雜染融合了南北的文化特性，並成為南北社會文化交流的中介與橋樑。

以襄陽地區北部州縣而言，因地近河南、陝西主要受北方秦隴文化的影響，例如位居南陽盆地的唐、鄧二州其地理位置上接汝洛，東往陳蔡，故其俗類同中原。越往南走則受荊楚文化的影響越深，如襄陽「言語輕清微帶秦」²⁷⁹，言語輕清的說話方式較似南方，然而卻略帶有秦音；西北部的金州地屬漢中，受秦俗影響較深，而房州風俗類同金州，其俗「有蠻夷之風」，且「自戰國時更屬秦楚，故其民實兼秦楚之俗」。²⁸⁰此外，由竹山沿堵水可通往四川，因此可能也受部分巴蜀文化之浸潤。即便是位置較南，地近荊門軍的郢州其風俗民情猶有北方風氣，²⁸¹可見整個襄陽地區大致都受到秦楚之風的影響，然因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文化混同亦有些微比重上的差距。

由前所述，宋人載記、判讀一地的風俗文化，很大一部分是透過方言樂音，因此語言、歌曲對於感知一地社會文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方言區並非恆久不變，可能會受到時空、移民等因素而緩慢產生推移。以襄陽地區而言，在唐代，

²⁷⁹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49-5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卷 7，〈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頁 3，總頁 88 上。

²⁸⁰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6，〈房州〉，頁 2776、2777。

²⁸¹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33，〈京西路·郢州〉，頁 2，總頁 471-819。

孟浩然經蔡陽時（今湖北棗陽縣西），從樂音歌謠中感受到歸鄉的情懷，其詩曰：「聽歌知近楚，投館忽如歸」，²⁸²可以推知當時楚語的北緣大致在襄州至棗陽一線的北界。至宋代，此地與關中地域接鄰，交通便利，靖康之難以來又接受大量北方人口遷移，北方移民眾多，已佔當地人口的主要成分，從而其方言受到了中原雅音的強烈影響。如前述，均州「俗好楚歌，民多秦音」、²⁸³房州一帶「語音勁正西帶秦」。²⁸⁴襄陽地區最南端的鄧州亦「有西北之風聲氣習焉」，²⁸⁵可見宋代楚語的北緣已由唐時襄州棗陽一線，退至鄧州一帶，距鄧州越北之地，楚語之影響越小，這正是文化區邊緣的常態。²⁸⁶

（二）民風方面

襄陽地區各州縣多受鄰俗浸潤的影響呈現出兩極化的特徵。大致而言，北部地近兩京地區的鄧州「其俗夸奢，尚氣力，好商賈」；²⁸⁷襄陽「其民尚文，俗尚豪奢」，²⁸⁸「人多偷墮，崇信鬼神、釋教」；²⁸⁹東部的唐州其俗類蔡州，「今其俗人性清和，鄉閭孝友」；²⁹⁰隨州則是俗同唐州，而「其地僻絕，其俗醇厚，庫貧薄陋，常有賢者」；²⁹¹位於唐、隨間的棗陽，「人性鯁直，詞訟少興」，且「商賈不事，士務學問而儉朴是敦」；²⁹²西部地近陝西的均州則「民人樸野，公庭無事」，²⁹³然「人性剛烈躁急，信巫兒，重淫祀」，²⁹⁴房州則是「州窮險有蠻夷之風」、「其人率多勁悍決裂」，然而「民俗安於山僻」，「少從學之士，其信巫重祀，子分贅」；

²⁸² 《御定全唐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2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60，孟浩然〈夕次蔡陽館〉，頁 25，總頁 1424-459。

²⁸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5，〈均州〉，引《晏公類要》、《圖經》，頁 2756。

²⁸⁴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8，〈次韵梁教授〉，頁 15，總頁 1166-97。

²⁸⁵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33，〈京西路·鄧州〉，頁 2，總頁 471-819。

²⁸⁶ 張偉然，《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 1 版），頁 10。

²⁸⁷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2，〈山南東道一·鄧州〉，頁 3，總頁 470-353。

²⁸⁸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32，〈京西路·襄陽府〉，頁 1，總頁 471-813。

²⁸⁹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5，〈山南東道四·襄州〉，頁 4，總頁 470-376。

²⁹⁰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1，〈河南道十一·蔡州〉，頁 4，總頁 369-85。

²⁹¹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32，〈京西路·隨州〉，頁 8，總頁 471-817。

²⁹² (明)張恒，《（天順）重刊襄陽郡志》，卷 1，頁 60，總頁 130。

²⁹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5，〈均州〉，頁 2755。

²⁹⁴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3，〈山南東道二·均州〉，頁 3，總頁 470-363。

²⁹⁵南端最近荆楚的郢州「其民朴，其俗儉」，²⁹⁶因俗同荊州，故沾染「其氣急悍，人多剽悍」²⁹⁷的性格特徵。

由上述各州縣之民風概況，可以得出一個大略的印象。整體而言，襄陽地區人民性格樸儉梗直、好利夸奢、文野兼雜、淳頑相半，造成文化性格有如此區域性的極端現象，因素之一為受到所在區位相鄰州縣之風俗民情的影響，因彼此相互接壤，民眾往來交通較為頻繁，民風習氣的感染傳遞與經濟文化的交流，從而產生文化的交叉影響是必然的結果。此外，造成一區內民風性格大相逕庭的因素尚有經濟力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有道是「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²⁹⁸人類有多種需求，需求有其層次高低，較低層次的「基本需求」如生理、安全、隸屬與愛、自尊需求漸次獲得滿足後，較高層的「成長需求」才會產生，如追求知識、美感與成就自我實現。

因此，一般說來地力資源較豐富的地區，其經濟發展水準多半也較高，待足食豐衣、生活水準的提高，人民安業，自然風俗淳美、知禮尚文。襄陽地區部分州縣生產條件不佳，地僻土瘠，如均州、房州等地較位居山僻窮險之地，以獵山伐木、刀耕火種為生，為求生存人民性格樸野強悍，以巫俗淫祀之事為務；襄、鄧、唐州等地，田土肥美，物阜民熙，「地近被二京之富饒」，民多從事商賈，性好豪奢，習文之人亦多。較特別的是隨州、棗陽之地，雖「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²⁹⁹民亦不事商賈，然風俗醇厚，士務學問。

二、民生物產

襄陽地區位居秦楚之地，向為南北要衝，地理環境與物產資源建構出特有的人文景觀與生活風貌。

²⁹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6，〈房州〉，頁 2776、2778。

²⁹⁶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4，〈郢州〉，頁 2729。

²⁹⁷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6，〈山南東道五·荊州〉，頁 6，總頁 470-385。

²⁹⁸ (唐)杜佑，《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0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自序〉，頁 1，總頁 603-9。

²⁹⁹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 13，〈李秀才東園亭記〉，頁 8，總頁 474 上。

（一）食的方面

關於襄陽地區物產，北宋歐陽修〈樂哉襄陽人〉詩云：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
羅穀纖麗藥物珍，枇杷柑橘薦清罇。磊落金盤爛璘璘，槎頭縮項昔所聞。
黃橙擣薑香複辛，春雷動地竹根走。錦苞玉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
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沄沄。
斜陽返照白鳥群，兩岸桑柘雜耕耘。³⁰⁰

這首描繪襄陽風物的詩，羅列了北宋初襄陽地區主要的經濟作物，如：桑麻織品製成羅穀；果蔬類有枇杷、柑橘、黃橙、玉筍；海產有槎頭縮項之稱的鮪魚，品類豐富皆為時鮮。以下分類介紹襄陽地區著名物產與飲食。

五穀主食方面，襄陽地區原以產稻為主，如：襄陽是「漢水南流峴山碧，種稻耕田泥沒尺」；³⁰¹均州為「魚稻之鄉，風物美秀，泉甘土肥」；³⁰²鄧州則是「玉炊稻粒長，縷切魚膾肥」，³⁰³皆是一片魚米之鄉的景象。然而糧食作物與飲食習慣受到移民的影響頗深，蘇轍的〈襄陽樂〉即寫道：「里人種麥滿高原，長使越人耕大澤。澤中多水原上乾，越人為種楚人食。火耕水耨古常然，漢水魚多去滿船。長有行人知此樂，來買槎頭縮頸鮪。」³⁰⁴詩所描寫的就是由兩浙遷到襄陽一帶的越人租種當地人田地的景況，襄陽原食米，古早以火耕水耨的方式耕作，即先將雜草燒去，然後引水灌溉，種植水稻，待雜草與稻長至七、八寸高時，全部

³⁰⁰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 居士集》，卷 7，〈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頁 3，總頁 88 上。

³⁰¹ (宋)蘇轍，《樂城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5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卷 1，〈襄陽樂〉，頁 11，總頁 55 上。

³⁰²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5，〈均州〉，頁 2755。

³⁰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4，〈鄧州〉，頁 2745。

³⁰⁴ (宋)蘇轍，《樂城集》，卷 1，〈襄陽樂〉，頁 11，總頁 55 上。

芟除雜草，再灌水入田，草死而稻長。此種粗放的耕作方式，隨著一波波的北方移民湧入，糧食短缺而提升農業技術改變為牛耕。

南宋大量北人南下亦帶來糧食作物種類的改變，當北方農民進入南方以後，往往於定居地種植小麥。例如：高宗建炎時，郢州曾為桑仲部將霍明佔據幾年，「（霍）明以措置郢州，頗有條理，……近城多種二麥」。³⁰⁵郢州向以水稻為主要糧食，然寫於南宋之《輿地紀勝》載郢州「其土饒粟麥，有西北之風聲氣習焉」，³⁰⁶可見當時霍明及隨後南遷的移民，在此大量種植麥粟。乾道三年（1168），德安府和郢州「夏秋兩料收五萬餘碩，其黑豆喂牛，大麥、稻穀充馬料，所有小麥、粟、穀、雜豆糶發價錢」。³⁰⁷可見所生產之稻米主要作為馬匹之飼料，市場上主要販售小麥等穀物，表示麥、粟已取代稻米成為當地主食。

麥粟大面積的種植，對於南方農業生產具有重要意義。除了促進麥稻複種區域的擴大，在相當多的平原往往是收了麥子再種稻，一年收穫兩次提高了單位產量。再者，促進了山區的開發，土地利用範圍擴大。³⁰⁸如房州早期主要亦是在山區燒畚為田，低土地利用的耕種方式，或許也隨著部分移民避難入山而改變。房州有詩云：「夏田少雨富來牟，多雨何妨穡事秋。已戒日供皮子麵，更教晚稻飽霜收」。³⁰⁹詩句中的「來牟」即指麥，而皮子麵作者自註解曰：「麵皆塹，不塹者曰皮子麵」，「塹」字本意為土或意為「沙土混入食物中」，為何將沙土混入食物中，原意不詳，或許混入非沙土而是穀物果實等雜糧於麵糰中，然至少可知，皮子麵為一種純淨的麵粉製成物，作為每日食品。而從詩句中可知，無論雨量多寡並不影響當地耕稼，房州既有麥亦有稻，麥歉收時可待霜降後成熟的稻。此外，另有詩云「已借蠟錢輸麥稅，免教緝捕闖門來」，³¹⁰此地更有收麥稅，更可確定有麥子的種植，且有一定的產量。

³⁰⁵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50，〈炎興下帙五十〉，頁 8，總頁(三)之 167。

³⁰⁶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4，〈郢州〉，頁 2729。

³⁰⁷ (清)徐松輯，《宋會要》食貨 3 之 17，〈營田雜錄〉，頁 4830。

³⁰⁸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頁 193-194。

³⁰⁹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房陵十首〉之五，頁 14，總頁 1166-233。

³¹⁰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房陵十首〉之六，頁 14，總頁 1166-233。

以果蔬類而言，枇杷主要產於四川梓州、³¹¹利州、³¹²湖北宜都³¹³等地，《證類本草》引《圖經》指出枇杷（葉）「今襄漢吳蜀閩嶺皆有之。」³¹⁴柑橘、柚、橙主要為亞熱帶作物，唐元和時襄州仍有貢橙子，³¹⁵然至宋代未見正史及地理志書中載記此地進貢橙、橘，其根本原因即為本區氣候的轉冷，從十一世紀開始，長江及漢水一帶，氣候逐漸轉向乾冷，已不太適宜柑橘類作物的種植與生長。³¹⁶元豐五年（1082）成書的《證類本草》即載：「橘柚生南山川谷及江南，今江浙、荊襄、湖嶺皆有之。……襄、唐柚色青而實小，皆味酢皮厚，不堪入藥。」³¹⁷果實小而青、酸而澀，顯然因氣候不佳、日照不足使果物無法熟成，何況上貢，若有生產可能僅供自用，而對照歐詩「黃橙擣蘄香複辛」所語，當地食用方式或許是將橙橘類的果物切碎，加工製成醃漬物食用。竹筍則因襄陽地區多竹林，故有部分鮮筍可供食用，如襄州有筍竹筍，「出襄州卧龍山諸葛亮祠中，筍堪食，甚美」。³¹⁸此外，柿原主要產在河南中西部地區，有紅柿、黃柿等品種，³¹⁹歐陽修《歸田錄》載：

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模植置其中，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³²⁰

³¹¹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82，〈劍南東道一·梓州〉，頁 3，總頁 469-669。

³¹²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35，〈山南西道三·利州〉，頁 8，總頁 470-308。

³¹³ (宋)李昉，《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冊 1-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臺 1 版），卷 871，〈果部八·枇杷〉，頁 3：「宜都出大枇杷」。

³¹⁴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 2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1 月臺三版，以下簡稱《證類本草》），卷 23，頁 25，總頁 504 下。

³¹⁵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 23，〈山南道一·襄州〉，頁 3，總頁 468-399。

³¹⁶ 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頁 11。

³¹⁷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 23，頁 6。

³¹⁸ (宋)釋贊寧，《筍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筍竹筍〉，頁 24，總頁 845-194。

³¹⁹ 程有為、王天獎主編，《河南通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1 版），卷 3，頁 70。

³²⁰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歸田錄》，卷 2，頁 15-16，總頁 994。

除載明唐鄧州產柿，更說明了時人催熟柿子的方法，主要是在百十個柿子中置一槁植於其中，所謂槁植者「一名蠻植」，「北土無之，中都有」，「槁植，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為木瓜，無此者為槁植也。」³²¹待放置一陣則可使柿子去澀透熟，此種土法名為「烘柿」。襄陽地區果物繁多，唐州方城有梨、³²²隨州有覆盆子，³²³據載：「覆盆子，長條四五月紅熟，秦州甚多，永興華州亦有，即時山中人採來賣，其味酸甘，外如荔枝、櫻桃許大。」³²⁴雖未見其他關於隨州覆盆子食用的記載，然覆盆子為上貢之物，故質量皆應有一定水準。

襄陽地區因漢水貫流其中，因此帶來豐富的漁產，襄陽最著名的即為「槎頭縮項鮪」。《襄陽耆舊傳》曰：「漢水中鮪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鮪」³²⁵古時鮪和鮪不分，是一種銀灰色，身體側扁，頭尖尾小的淡水魚。鮪魚為水族上味，其美味令古今騷人墨客念念不忘，以詩歌傳頌，如「鴈峯飄泊又經年，卻憶槎頭縮項鮪。」³²⁶「槎頭鮪熟物且旨，竹葉酒清人可思」³²⁷等，而蘇軾甚至因見鮪魚而有所感念，詩云：「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項，貪餌每遭烹。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吾今又悲子，輟筯涕縱橫。」³²⁸可見鮪魚除了是甘旨佳饈，更已成為一種特殊文化意涵。而襄陽座落漢水邊，一般百姓亦好食魚，除鮪魚以外亦食黿魚，有詩吟漢江邊「寄語飢羸莫深恨，西人無數飽魚黿」³²⁹之語，而黿魚即是鰲，鰲肉可供食用，甲殼可入藥，襄州有貢鰲甲，可

³²¹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 23，頁 20，總頁 502 上。

³²²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2，〈山南東道一·唐州〉，頁 15，總頁 470-395。

³²³ 《宋史》，卷 85，志 38，〈地理一·京西路〉，頁 2113。

³²⁴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 23，頁 14，總頁 499 上。

³²⁵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6，〈事實一·槎頭縮項鮪〉引《襄陽耆舊傳》，頁 2，總頁 850-590。

³²⁶ (宋)蔡戡，《定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9，〈江行阻風〉，頁 5，總頁 1157-751。

³²⁷ (宋)彭汝礪，《鄱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0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2，〈絕句·奉招正仲〉，頁 1，總頁 1101-312。

³²⁸ (宋)蘇軾，《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 5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卷 13，〈鮪魚〉，頁 27，總頁 259 上。

³²⁹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漢江岸二首〉之二，頁 11，總頁 1166-231。

見數量亦多。而當地還流行將魚製成鹹魚乾，亦有上貢。³³⁰

飲品方面，宋人嗜茶、好飲酒。以茶而言，茶樹屬於典型的熱帶與亞熱帶作物，主要分佈於秦嶺以東、淮河以南地區。³³¹襄州南漳縣亦產茶，³³²然品質卻不甚佳。房州地區亦有飲茶習慣，詩云：「底消山峽三分瘴，爭課盧仝七碗茶。」³³³當地因地處山區，不免受瘴氣之害，當地人早晨飲茶說可勝山嵐之氣，又稱可防三分瘴，³³⁴故飲茶成為房州消瘴癘的妙方。

再看酒類方面，時人張能臣，「好學喜綴文，嘗記天下酒名」，如襄州有金沙、宜城、檀溪、竹葉青等酒名；鄧州有香泉、寒泉、香菊、甘露；唐州有淮源、泌泉；郢州有漢泉、香桂；隨州有白雲樓；均州有仙醇；房州有瓊酥等酒。³³⁵雖僅知品目而未能知其詳，然可見襄陽地區幾乎每州皆產酒。襄陽地區最負盛名的應為襄州宜城美酒，宜城縣東一里有金沙泉，造酒極美，世謂之「宜城春」又名「竹葉酒」，³³⁶另有記載宜城美酒俗號「竹葉杯」。³³⁷蘇軾有〈竹葉酒〉詩曰：「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麴，留此千古情。」³³⁸以此可知宜城酒為春天釀成，清如漢江，名為竹葉。南朝人陳陰鏗有《侍宴賦得竹詩》云：「夾池一叢竹，青翠不驚寒，葉醞宜城酒，皮裁薛縣冠」，³³⁹即直指以竹葉釀酒。當然竹葉酒並非宜城獨有，竹葉入酒，有藥酒之功效。³⁴⁰《本草綱目》記載，竹葉酒以「淡竹葉煎汁，如常釀酒飲」，可

³³⁰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5，〈山南東道四·襄州〉，頁 5，總頁 470-377。

³³¹ 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頁 11。

³³² (宋)李埴，《皇宋十朝綱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3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初版），卷 16，頁 13，總頁 347-542 載：「（崇寧二年）乙丑，始權襄州南漳縣烏溪等四村茶」，可見南漳縣有茶出產。

³³³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房陵十首〉之四，頁 14，總頁 1166-233。

³³⁴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房陵十首〉之四，頁 14，總頁 1166-233，作者注曰：「土人早晨飲茶云勝山嵐氣，又曰防三分瘴」。

³³⁵ (宋)朱弁，《曲洧舊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7，頁 1-4，總頁 863-327~863-329。

³³⁶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32，〈京西路·襄陽府〉，頁 3，總頁 471-814。

³³⁷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5，〈山南東道四·襄州〉，頁 5，總頁 470-377。

³³⁸ (宋)蘇軾，《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 13，〈竹葉酒〉，頁 12-13，總頁 251 下-252 上。

³³⁹ (宋)釋贊寧，《筇譜》，頁 38，總頁 845-201。

³⁴⁰ 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頁 32。

「治諸風熱病，清心暢意」。³⁴¹房州亦有酒名竹葉青，詩云：「病肺還孤（沽）竹葉青，小園春去尚深局，春衫紅藥強相比，婢子可憐無性靈。」³⁴²作者病中猶買酒，並注竹葉青曰「房酒頗佳」，足見其質量並不差。此外，房州人為抗晨霧濛濛，亦有土法妙方為晨飲一杯酒，³⁴³甚為有趣。

（二）衣的方面

襄陽地區自古田土肥沃、桑麻遍野，北宋時當地土貢品有：襄州白縠、³⁴⁴火麻布；³⁴⁵隨州絹、綾、葛；³⁴⁶房州紵；³⁴⁷郢州白紵；³⁴⁸唐州絹，³⁴⁹而襄陽的南漳、穀城亦產素絹，³⁵⁰可見當地出產絲織品與麻織品且質量不差，這些各式織品為衣著布料提供了來源。襄陽地區紵麻的種植面積大於桑蠶，加上絲織品一般說來物美但價高，因此麻織品成為當地百姓主要衣飾，如房州「婦人績麻為布，以給衣食」、「衣裾盡是麻，蓋房無絲帛故」³⁵¹。至於天冷飄雪時，則多裹皮裘保暖，如宋人張嶠於下雪天泛游漢水時，即身著「重裘」³⁵²在皮筏上觀人捕魚，不謂「輕裘」稱「重裘」，可能指厚皮毛衣或言品質極差、分量很重的皮衣。

³⁴¹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7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25，〈穀之四·酒·竹葉酒〉，頁 41，總頁 773-504。

³⁴²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復次韻四首〉之四，頁 9，總頁 1166-230；(宋)袁說友，《東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6，〈復次韻四首〉之四，頁 9，總頁 1154-207，亦載同詩、同注，然詩句：「病肺還孤竹葉青」之孤作「沽」。

³⁴³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房陵十首〉之二，頁 13，總頁 1166-232 詩云：「陰晴未敢捲簾看，苦霧濛濛鼻為酸，政使病餘剛制酒，一盃要敵滯朝寒。（晨起霧久乃開，土人目曰滯朝）」。

³⁴⁴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南路〉，頁 16，總頁 471-20。

³⁴⁵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5，〈山南東道四·襄州〉，頁 5，總頁 470-377。

³⁴⁶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南路〉，頁 20，總頁 471-22。

³⁴⁷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南路〉，頁 23，總頁 471-24。

³⁴⁸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南路〉，頁 26，總頁 471-25。

³⁴⁹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南路〉，頁 27，總頁 471-26。

³⁵⁰ 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頁 14。

³⁵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6，〈房州〉，頁 2778、2790。

³⁵² (宋)張嶠，《紫微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3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3，〈雪中泛漢水觀捕魚〉，頁 16，總頁 1131-366 載：「既遊天漢地，復泛清漢流，我本襄漢人，對酒集百憂，是時雲氣昏，雪片迷汀洲，沉沉百丈潭，坐看漁子游，重裘憫渾脫，得雋憐深投，舞空清渚迥，遍積修篁幽，山川疑舊里，歌舞迷新遊，薄暮理歸棹，中流任夷猶，忽驚在鄉社，誰辨陰成樓，歎知非舊邦，汎漚涕難收。」。

（三）住的方面

民居作為一種載體，已成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人類在文化觀念的驅動下，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而從自然環境中分隔出來的人文空間，直接顯示出人類的一種藝術創造，並展現著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聯繫。而建築材料的選取，直接地反映了居民對於自然環境的認知態度，以及其開發利用資源的技術手段和水平。³⁵³襄陽地區的民居景觀主要有幾種建築形式，其一為最普遍的茅屋，茅草取得容易，因此對於建築材料缺乏或經濟不甚發達的地區，多半以茅草為覆蓋材料。時人王之望為襄陽穀城人，在靖康亂後曾回鄉，其詩云：「余襄陽人，亂後還鄉，登峴首光祿堂，茅屋數椽，此碑斷折殘缺為之悵然。」³⁵⁴雖光祿堂原始建築形式不得而知，但望去見有茅屋數椽。其另一詩可相參照：「我今還故鄉，陵谷亦易處。荆榛荒舊蹊，溪壑改新路。城中十萬家，碧瓦生煙霧。茅茨變閭閻，舊屋無一柱。」³⁵⁵雖詩主要描寫襄陽因戰火而荆榛滿目，然可見城中民居原為茅茨與瓦屋。因此除了茅屋外，襄陽地區亦有瓦屋。碧瓦通常指青綠色的琉璃瓦，以扁青石為藥料燒製而成的瓦片，多用於宮殿與廟宇，至於此處是否屬於琉璃瓦建材，有關記載不詳，難以詳考。時人李廌記襄州光化縣縣學重修一事，其曰：「初至，謁孔子廟祠，怪其堂序失次，而風雨鳥鼠侵敗，屋室土摧木腐，瓴飄甍裂，貌像欹殘，器用缺折，乃喟然歎曰……。」³⁵⁶可見原有廟堂屋身為土木所建，屋上為覆瓦並造有瓦溝，表示當地亦有使用陶瓦為建材。

除襄陽城中居民以瓦屋為居住型式外，其他各州更多是以竹屋為民居。這是由於「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³⁵⁷加上襄陽地區多產竹，對資源的開發利用自然以竹木為先。如襄陽一帶，其「居室多編竹以代陶瓦」；³⁵⁸紹興十二年（1142）

³⁵³ 張偉然，《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頁 100。

³⁵⁴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 15，〈跋光祿堂記〉，頁 2，總頁 1139-866。

³⁵⁵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 1，〈贈襄陽帥吳彥猷〉，頁 16-17，總頁 1139-670~671。

³⁵⁶ (宋)李廌，《濟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7，《襄州光化縣重修縣學記》，頁 7，總頁 1115-806。

³⁵⁷ 《宋史》，卷 300，列傳 59，〈周湛〉，頁 9967。

³⁵⁸ (明)張恒，《(天順)重刊襄陽郡志》，卷 1，頁 60，總頁 129。

襄陽重修州學，「屋皆因俗，以竹為瓦，獨殿宇土木雄傑」。³⁵⁹可見以竹瓦代陶瓦為建材的方式，在當地早襲以成俗。竹瓦的作法通常是將大竹剖開，弄成如陶瓦的模樣，並將竹瓦編排起來，編竹或許是為起固定的作用。³⁶⁰除襄陽外，房州亦是一片「竹屋高低正復斜，蔚藍影裏著人家」³⁶¹的景象。然而建造竹屋有其弊端，周湛知襄州時，發現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為害。」為了改善竹屋相鄰易生火患的弊病，因此「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³⁶²

三、娛樂節慶

（一）游樂之風

朱熹《詩集傳》云：「江漢之俗，其女好遊，魏漢以後猶然。」³⁶³江漢地區主要指漢水中游及其以南的江漢平原一帶，以襄陽為中心，自古即有好游之風，而朱熹則點出江漢之女好遊嬉尋樂，可見這是由女性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景觀。而關於「好遊」一事，金人李俊民言：「楚俗以嬉游為事」並引《襄沔記》云：「歲以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謂之天地穿日，移市於城北津弄珠灘。」注《襄陽志》云：「楚女於弄珠灘尋水竅石，穿簪於釵上帶歸。」又云：「楚俗三月游南山諸寺，移市於山壽寺，四月八日罷游，謂之辭山。」³⁶⁴可見由正月二十一日「天地穿日」至四月八日這段期間，當地有遊樂之俗，而地點從襄陽城北津之「弄珠灘」，至南山諸寺與山壽寺等地，皆為旅遊勝地。若先考其天地穿日，據《雞肋編》稱：

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

³⁵⁹ (宋)張嶠，《紫微集》，卷32，《襄陽府重修州學記》，頁6。

³⁶⁰ 張偉然，《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頁102。

³⁶¹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19，〈房陵十首〉之四，頁14，總頁1166-233。

³⁶² 《宋史》，卷300，列傳59，〈周湛〉，頁9967-9968。

³⁶³ (宋)朱熹，《詩集傳》（收入《四部叢刊廣編》，冊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2月初版），卷1，〈芣苢三章章四句〉，頁12，總頁7。

³⁶⁴ (金)李俊民，《莊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6，〈弄珠灘〉，頁19，總頁1190-606。

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為得子之祥。³⁶⁵

據上引言並與李俊民所言相對照下，可知，正月二十一日為襄陽「穿天節」，這天是「交甫解佩之日」，百姓至漢水濱泛舟，婦女則於城北之弄珠灘上尋有孔小白石，將石子穿簪上插於髮，以求得子祥兆。而此習俗之緣由一說與「交甫漢皋解佩」有關，《太平廣記》引《列仙傳》云：

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二女）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十步，視懷空無珠，二女忽不見。

366

而《列仙傳》文後有詩云：「靈妃艷逸，時見江湄，麗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珮虛擲，絕影焉追。」³⁶⁷早從《詩經》有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³⁶⁸之語，女子已有在漢水邊上豫游之風，而鄭交甫遇漢水仙女之傳說，或許實為載記早期先秦時男女交友的型態，而以珮石相贈作為信物或交往之表徵。江漢地區遠古有郊祀婚配之習俗，西周文王化行南國之前，江漢一帶的男女交友十分自由，成群結隊在萬山參加祭祀活動的同時，亦在漢水邊遊樂踏青，促使兩性間的接觸交往，為婚配生殖創造了基本條件。³⁶⁹如此承襲演變至後代，成為一連串節慶春遊之活動，南朝時漢水邊的大堤成為月夜踏歌的所在。而唐代，

³⁶⁵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頁 20。

³⁶⁶ (宋)李昉，《太平廣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59，〈江妃〉，頁 4-5，總頁 1043-296。

³⁶⁷ (漢)劉向，《列仙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5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上，〈江妃二女〉，頁 12，總頁 1058-494。

³⁶⁸ (漢)毛亨，《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芣苢三章章四句〉，頁 60，總頁 69-145。

³⁶⁹ 杜漢華，〈襄樊穿天節考辨〉，《民俗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239。

大堤行樂與春遊踏青的風俗，已相當發達，此種特殊的文化景觀也成為唐代詩人墨客筆下關注的題材。襄陽地區因位居南北交通要津，繁華熱鬧吸引當地遊客如織，而人潮帶來的商業行為，使春遊風俗沾染了商業氣息，也因而使傳統習俗產生質變。

及至宋代，每逢歲時節日，襄陽地區百姓仍好燕遊，如宋人葛勝仲有〈驀山溪〉一曲吟咏穿天節，云：

望雲門外，油壁如流水，空巷逐朱轡，步春風，香河七里，冶容炫服，摸石道宜男，穿翠靄，度飛橋，影在清漪裏。

秦頭楚尾，千古風流地，試問漢江邊，有解珮，行雲舊事，主人是客，一笑強頒春，燒燈後，賞花前，遙憶年年醉。

春風野外，卵色天如水，魚戲舞綃紋，似出聽，新聲北里，追風駿足，千騎卷高岡，一箭過，萬人呼，鴈落寒空裏。

天穿過了，此日穿名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誰哀老子，使得慙遨遊，爭捧腹，乍憑肩，夾道遊人醉。³⁷⁰

可見穿天節弄珠灘撿石求子的習俗仍保留至宋代，新年至春天賞花時節，當地民眾仍喜宴飲行遊，更有至郊外騎馬射箭之遊畋活動。然而此時襄陽一帶春遊景觀已大為轉變，如蘇軾云：「文王化南國，游女儼如卿；洲中浣紗子，環珮鏘鏘鳴；古風隨世變，寒水空泠泠。」³⁷¹「誰家游女戲江濱，纔見舟來競斂身；須信文王風化遠，至今猶自被行人」³⁷²等詩句，顯見以往江邊川流不息的遊人與仕女，一變而為人煙杳杳一片蕭瑟的形象，而女性對於男女之防的意識大為提高，這或可歸結為以下幾點因素，其一為禮教規範與社會風氣轉趨保守，使女性人身自由受

³⁷⁰ (宋)葛勝仲，《丹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23，〈驀山溪·穿天節和朱刑掾二首〉，頁 16-17，總頁 1127-665。

³⁷¹ (宋)蘇軾，《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 8，〈漢水〉，頁 6，總頁 167 下。

³⁷² (宋)鄒浩，《道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 7，〈泛漢江·又(二首)〉，頁 10，總頁 1121-225。

到限制，原以女性為主體的嬉遊之風，亦不如以往興盛；其二為受到戰爭波及，影響整個地區社會經濟之穩定發展；其三為交通網絡重心東移，其南北往來管道被汴杭間運河所取代；其四為北方移民南來成為當地人口主體，北方文化亦取代荊楚習俗。

（二）歲時節令

歲時節令是風俗文化中傳承性最強，亦是民族文化中最有共通性的部分。然而歲時節日會因地區自然環境條件的差異，及文化傳統的不同，而在內容形式上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尤其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依四時節氣收割播種，此種周而復始的生產活動與生活習慣，更強化與穩固了節令的各項習俗。³⁷³

襄陽地區因其地理位置、交通區位及其生活型態等因素，故風俗兼具南北特質的同時，亦帶有地方特色，一年之中亦有許多節慶點綴著日常生活，例如：

1.大年夜

大年夜即農曆除夕，為農曆十二月最末一日的晚上。除夕是一年之末亦是迎接一年之初的夜晚，據《東京夢華錄》載：「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于外。士庶之家，圍爐圍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³⁷⁴可見宋人除夕夜會燃放炮竹，一家團圓圍爐聚飲，並有守夜通宵不眠之習俗。宋人劉光祖寧宗時謫居房州，除夕夜其詩云：「房州亦是家，守歲落燈花，鄉信長憑鴈，僧餐自施鴉。」³⁷⁵除夕的夜晚，作者身在房州無法歸鄉團聚，帶著滿腹鄉情點燈熬油，辭舊歲迎新春守歲未眠，京城習俗如此，可能即使偏遠的襄陽地區之房州山區亦有團圓守歲之俗。

2.元旦

³⁷³ 周積明主編，《湖北文化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下冊，頁1400。

³⁷⁴ （宋）孟元老，（民國）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台北：世界書局，1999年9月2版），卷10，〈除夕〉，頁683。

³⁷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6，〈房州〉，頁2791。

「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呼為新年，一歲節序此為之首。」³⁷⁶北宋《東京夢華錄》記載開封正月一日年節，「士庶自早互相慶賀」，街市熱鬧，宴飲遊樂，即便「小民雖貧者，亦須新潔衣服，把酒相酬爾」。³⁷⁷而記南宋杭州風俗的《夢粱錄》亦有類似記載「細民男女亦皆鮮衣往來拜節」，「家家飲宴，笑語諠譁」。³⁷⁸然襄陽地區相關記載不多，宋人莊綽曾載：

余嘗行役，元日（元旦）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³⁷⁹

這段經歷見聞，若對照前述由正月二十一日「穿天節」開始的一連串活動，新春年節期間應為一派歌舞昇平、宴游拜會的景象，若由其成書時間推斷，雖難考其正確年代，但大致為宋室南渡前後之景況，因此可能受戰事的影響，故元日之鄧州呈現著家家閉戶的蕭索模樣，其僕人叩門買米，遭受到無禮對待，民居家中尊長會因他人拜訪而猶如驚弓之鳥，可見並非常情。

3.社日

社日為祭祀社神之日，社祭分為春秋兩季，立春後第五戊日為春社，立秋後第五戊日為秋社。春社以祈豐收，秋社以報神功，而春祈秋報對於農業社會是一項重大儀式，《荊楚歲時記》云：「社日，四鄰並結宗會社，宰牲牢，為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³⁸⁰可見在社日這天，鄰里聚集一處合為會社，祭祀土地神，春社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而秋社則懷感謝之意犒謝神明。祭祀完畢則

³⁷⁶ (宋)吳自牧，《夢粱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正月〉，頁 1，總頁 590-15。

³⁷⁷ (宋)孟元老、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卷 6，〈正月〉，頁 162。

³⁷⁸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 1，〈正月〉，頁 1，總頁 590-15。

³⁷⁹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各地歲時習俗〉，頁 20。

³⁸⁰ (梁)宗懷，《荊楚歲時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 3025，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初版），〈二月〉，頁 7。

歡欣群聚，分享酒食。詩云：「杯酒清濃肉更肥，咸言趁社極歡嬉。丁寧向去坐年日，要似如今斂脯時。」³⁸¹即描述社日百姓祭祀完成後的宴飲場景。

4.寒食、清明

宋代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為三大節，³⁸²而熱鬧繁華、權力核心所在的都城是全國的指標，可見寒食對宋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節日。寒食為每年冬至後一百零五日，約在清明節前一、二日。而寒食節的由來，為晉文公時為求介之推出仕而焚林，之推抱木而死，全國哀悼，於是乃定是日禁火寒食。《荊楚歲時記》載：「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餠大麥粥。」³⁸³餠為餠飴，即俗謂麥芽糖，³⁸⁴荊楚地區每至寒食則禁火三日，並習做大麥甜粥而食。寒食與清明節日十分接近，故自寒食歸鄉清明掃墓為宋人習俗。宋人張嶠為襄陽人，每年寒食必祭祖掃墓其受戰爭影響無法歸鄉，故作〈寒食行〉以叙其痛苦之意，云：

寒食由來古今重，四海人人作丘壠，……伊昔年年當此時，鈿車寶馬相追隨，紛紛錦樹滿原野，暖風遲日爭光輝，草間燒紙樹間哭，羅列杯盤，烏攫肉侵，晨祭罷，薄暮歸，旋風剪剪吹餘灰。……禮豐薄由來稱有無，咸具盤餐致醪醴，家家丘墳各為主，何人壠上無新土。自從遭亂去鄉關，幾歲松楸不曾覩，……新阡舊壠祇回首，無復原頭掛紙錢。……四時祠祭今寂然，五陵春樹生蒼烟。³⁸⁵

³⁸¹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 19，〈房陵十首〉之七，頁 14，總頁 1166-233，詩注：「年日飲食日坐年，社日斂脯。」

³⁸² (宋)孟元老，(民國)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卷 6，〈正月〉，頁 237 注：「陳元靚，歲時廣記 38，引歲時雜記，都城以寒食、冬、正為三大節。」

³⁸³ (梁)宗懷，《荊楚歲時記》，〈二月〉，頁 11-12。

³⁸⁴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25，〈穀部·餠飴〉，頁 25，總頁 773-496，載：「集解，……韓保昇曰：『餠，即軟餠也，北人謂之餠。』……時珍曰：『餠飴用麥蘖或穀芽同諸米熬煎而成，古人寒食多食餠，故醫方亦收用之。』」

³⁸⁵ (宋)張嶠，《紫微集》，卷 5，〈寒食行〉，頁 14-15，總頁 1131-384。

由引文可想見每當寒食節日，宋人返鄉祭祖，衣冠雜沓、車馬駢闐，晨間於墳前置杯盤水酒祀之，於草木間燒紙錢，壟墓上覆新土，墳前樹頭掛紙錢，至日暮時分歸家。寒食過了即清明，清明為二十四節日之一，距冬至日約一百零六天，故又稱為「百六」。清明時節襄陽地區亦有其獨特的習俗，如房州竹山縣東二里隔堵水約二頃有一鬼田，「不生樹木，只有茅荻。」³⁸⁶「每歲清明日，祭而燎之，以卜豐儉，草至盡即是年豐」，³⁸⁷此風俗甚為靈驗，延續至宋代亦然。此外，郢州清明節村落喜唱水調歌。³⁸⁸

5.端午

農曆五月五日為端午節，《太平寰宇記》引《襄陽風俗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夢告妻所祭食皆為蛟龍所奪，龍畏五色絲及竹，故妻以竹為粽，以五色絲纏之。」³⁸⁹而宋時，「俗其日皆帶五色絲、食粽，言免蛟龍之患。又（屈）原五日先沉，十日而出，楚人于水次迅楫爭馳，棹歌亂響有悽斷之聲，意存拯溺，喧震川陸，遺風遷流，遂有競渡之戲。」³⁹⁰可見襄陽地區端午節原有食以五色絲線所包裹之竹葉粽之習俗，至宋代則轉變為帶五色絲、吃粽子與泛舟競渡為戲。

6.重陽

九為陽數，俗稱農曆九月初九為「重陽節」。自古有於此日相率登高、飲菊花酒、佩帶茱萸以避凶厄之俗，而襄陽地區亦不例外。宋人張嶠之〈秋暑〉云：

涉旬秋暑不可觸，髮踈被汗如膏沐；忽然三日風撼山，冬裘未具膚生粟。

去年登高作重九，黃菊未開新酒熟；今年無酒不登高，獨行漫繞庭邊菊。

³⁸⁶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6，〈房州〉，頁 2780。

³⁸⁷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南路〉，頁 24，總頁 471-24。

³⁸⁸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4，〈山南東道四·郢州〉，頁 8，總頁 470-372。

³⁸⁹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5，〈山南東道四·襄州〉，頁 4，總頁 470-376。

³⁹⁰ 同前註。

中原季月欲折膠，江界隕霜無脫木；擁鼻從今四序移，遮眼殘書豈真讀。

391

其詩文描述重陽之時，仍飽受秋老虎肆虐，秋天如夏暑，頭髮亦被汗沾濕，忽然而起的大風，使尚未準備冬衣的作者起了雞皮疙瘩，便將去年重九與今年相比。可見登高、飲菊花酒相沿成習為宋人傳統，而重九之日為秋季最後一個月，亦是作為季節轉換、迎接嚴寒冬季的到來。

上述所言，雖受限於相關史料之零碎片段，難以一窺襄陽地區歲時節令之全貌，然仍試圖拼湊當地人士之生活點滴。總而言之，由於農耕仍作為襄陽地區主要生產型態，因此歲時節令的習俗內容，多半與占卜祈求五穀豐收、家宅興旺等基本生存需求有關，其歲時節日之風俗儀禮則是中原與楚俗兼而有之，這些祭典儀式帶給百姓心靈的慰藉與寄託，並豐富了百姓人家之日常生活，在農忙之外可享有的休閒樂趣。此外，亦由上述資料中看到宋金戰爭，使襄漢地區甚至整個北方社會經濟帶來巨大影響，連帶使得部分習俗與祭禮被迫中斷。

第三節 地方勢力與社會秩序

中國幅員廣大，地方的控制與社會秩序之維持，往往並非全然操控於中央政府之手，在中央政府與地方百姓之間，有一族群因挾有某種資源優勢，因而主導著中央與地方雙邊溝通以及社會控制的作用，形成一股民間勢力。而在宋代地方社會得以掌握這些資源者，通常為富族和士族。富族多半擁有經濟資源，可能為地主、商人以及手工業主等；士族則擁有文化和社會資源，或為官僚家族、希望入仕而尚未入仕的文人家族等。當然有時富族與士族難以截然劃分，經濟實力強

³⁹¹ (宋) 張嶠，《紫微集》，卷 5，〈秋暑〉，頁 15，總頁 1131-384。

大的富族常培養子弟，透過科考入仕當官以晉升士族，強化其社會與文化資源。然總而言之，相對於百姓而言，兩者皆屬於地方強勢族群，可憑藉己身優勢對基層社會產生或大或小之影響。

一、富族士族

宋代襄陽地區亦有其民間勢力之發展，而史籍仍不脫以士人為主要載記對象，由於襄陽地區對於士族研究極少，史料比起東南經濟發達地區亦不豐富，故主要以《宋史》中有列傳者且為當地士人，製成表 3-4 如下。

表 3-4 襄陽地區士人統計表

姓名	祖籍	出生地	安葬地	入仕途徑	參政時代	最高職位	歷官代數	出處	備註
王之望	襄陽	襄陽	台州	進士	高宗 孝宗	參知政事	二代	卷 372	父王綱
王襄	潁州 汝陰	鄧州 南陽	不詳	擢進士第	徽、欽 高宗	同知樞密院事	一代	卷 352	
別之傑	鄧州	鄧州	湖州	進士	理宗	參知政事	一代	卷 419	父湜，原籍北方
李庭芝	開封	應山	不明	進士	理宗 度宗	知樞密院	一代	卷 421	
周湛	鄧州	鄧州 穰人	不詳	進士甲科	仁宗	右諫議大夫	一代	卷 300	
范宗尹	襄陽	襄陽	台州	上舍登第	徽宗 高宗	宰相	一代	卷 362	
張士遜	清河	光化軍	登封	進士	真宗 仁宗	宰相	三代	卷 311	
張友直	清河	光化軍	登封	蔭補	仁宗	工部郎中	四代	卷 311	父士遜
張 嶠	襄陽	襄陽	湖州	進士	高宗	中書舍人	六代	卷 445	士遜玄孫
張問	襄陽	襄陽	許昌	進士	英宗 神宗	正議大夫	一代	卷 331	
連萬夫	應山	應山	應山	進士	仁宗	縣令	一代	卷 458	
賈黯	鄧州	鄧州 穰下	鄧州	進士第一	仁宗 英宗	翰林學士	一代	卷 302	

以下則以個案介紹宋代襄陽地區較具代表性之富族與士族，述其本身社會背景及其社會網絡交游。

（一）穀城王氏

王之望(1103-1170)，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初以蔭補，高宗紹興八年(1138)，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為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荊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其後累遷太府少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拜參知政事，罷。起為福建安撫使，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溫州，尋罷歸。³⁹²若以此觀之，王之望仕途堪稱順遂，如考其背景，王氏其先「自閩徙杭，唐開元中(713-741)旅游漢沔間，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且自王之望祖父而上「皆隱處不仕」，³⁹³可見其祖上並非士人，而若為一般地主則安土重遷較不喜旅遊他鄉，得以長途遊歷亦無田土之累，可能原為富豪商賈，其後因喜好襄陽風土，遂在此買田置地定居下來，及至入宋。王氏可說是標準的大族，「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³⁹⁴此法更深獲鄉人服之，共為取法。

王之望家族，實為富族轉向士族的典型。在曾祖王遷時，王氏開始有計劃的向士族轉型。王遷將財產分作三用：「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而在待賓客上尤為用力，「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³⁹⁵由此使王氏在士人社會中獲得了一定的聲譽。而王遷臨終則戒其子曰：「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³⁹⁶表明了希望王氏後人重文教、交俊士，

³⁹² 《宋史》，卷 372，列傳 131，〈王之望〉，頁 11537-11539。

³⁹³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6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卷 29，〈贈少保王公墓誌〉，頁 7，總頁 486 上。

³⁹⁴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 29，〈贈少保王公墓誌〉，頁 9，總頁 487 上。

³⁹⁵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 29，〈贈少保王公墓誌〉，頁 8，總頁 486 下。

³⁹⁶ 同前註。

其子王文果遵從父訓，「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詩筆清麗，所與遊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王文雖未中舉，然好學如儒者，往來交游皆公卿名士。至王綱，「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從學名士余幹、鄒浩，因「勤苦絕人」，元符三年(1100年)遂舉中第，成為宋代穀城第一位進士。王氏家族向士族的轉化，即便從王遷算起亦歷三代，至第四代王之望才終有大成，可見其中的不易。

王氏雖向士族轉化成功，獲得社會資源，但相對失去經濟實力。其主因在於，一為向士族轉化，需廣交士族名流，經濟資源是唯一重要的交際資源；二是隨著富族的儒家化，逐漸形成輕視生產的心態，使原有財富日用日消，終至貧困。穀城王氏用於與士族交際的財富難以估算，只能概之以鉅資。王遷對士人是有求必應，王文亦然。³⁹⁷自王文開始，因其「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家族經濟的發展交由女性來主持，而不若以往注重營生聚財。及至王綱，雖為進士，但「承祖、父之風，好施予」，加上「不蓄資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厚所產，至公益貧」，以至出現「糧食不繼」的窘境。³⁹⁸

王氏經濟雖日趨拮据，但社會資源卻日益豐富。除了王遷、王文的廣施博濟外，王綱因有知人之明，好獎掖後進，「所許予，後多顯達」，如范宗尹「為布衣時，年甫及冠，公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³⁹⁹後范氏三十二歲即為宋代最年輕的宰相，故致使王氏得以建立良好的士人社會網絡。王之望曾為太學博士，又官至參知政事，更是「門人弟子滿天下」。⁴⁰⁰靖康之難，王之望因「襄漢大亂，骨肉凋喪，數口避地，西走漢中」。其後遷居台州，娶婦張氏，生一子鏞，⁴⁰¹以聯姻方式融入浙江士人圈，其一女適錢塘大族錢慶祖，其子王鏞娶台州名士吳莆之女，憑藉著鞏固社會、文化資源，以免除因失去經濟資源，而使家族走向衰落之危機。

³⁹⁷ 廖寅，《宋代兩湖地區民間強勢力量》，頁20。

³⁹⁸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29，〈贈少保王公墓誌〉，頁10，總頁487下。

³⁹⁹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29，〈贈少保王公墓誌〉，頁11，總頁488上。

⁴⁰⁰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29，〈贈少保王公墓誌〉，頁6，總頁485下。

⁴⁰¹ (宋)王之望，《漢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3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16，〈祭宜州歐陽氏姊文〉，頁4，總頁1139-878。

（二）光化張氏

張士遜（963-1049），字順之，太宗淳化三年（992）舉進士，由均州鄖鄉縣主簿，轉射洪令，歷江南、廣東、河北轉運使、禮部尚書、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等職。仁宗康定元年（1040）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皇祐元年（1049）卒，年八十六，謚文懿。⁴⁰²考其先祖，本系清河（今屬河北），五世祖唐，任刺史，因僑于漢南。曾祖諱某，一說育，「以廷尉平總襄鄂七州都計，居帥趙凝府。凝為梁所敗，走漢南，因避地鄖鄉，卒葬於斯」。⁴⁰³祖父裕，「嘗主陰城監院，因家陰城」（屬光化軍，今屬湖北老河口市），⁴⁰⁴死葬河南府登封縣（今河南登封市），與許州陽翟縣為鄰。其父廷朗，「恬曠卷道翔去，弗仕」，⁴⁰⁵士遜未出生前即逝。其母產士遜後七日，「疾且革。有姑適全氏，以公屬其姑，曰：『娠是兒，覺有異，今疾不支，以是長累姑矣。』語訖即絕」。⁴⁰⁶由此可知，張士遜於襁褓中，父母已喪，由姑母一手帶大。曾祖時移居均州，雖曾祖與祖父曾任前朝官職，然關於其父，諸文獻皆語焉不詳，《行狀》稱其父「弗仕」，然張士遜曾自云：「三代衣冠聯貴仕」⁴⁰⁷，指其三代為官，至其已仕宦顯達，或許其父曾短暫為官，猶未可知。

據《青箱雜記》云：「少孤貧，讀書于武當山」⁴⁰⁸，張士遜雖家貧仍努力求知問學，其「幼即穎特」，「受經于嵩陽張恕先生」。⁴⁰⁹至淳化初，因「于時取士優先舊人」，本土鄉賢勸其覆試。取士過程亦很奇異，殿試按甲第唱名傳召時，傳「適有宮中之喜」，太宗臨時起意「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即止，遂唱第一甲」。

⁴⁰² 《宋史》，卷 311，列傳 70，〈張士遜〉，頁 10216。

⁴⁰³ （宋）胡宿，《文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8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40，〈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頁 1，總頁 1088-960。

⁴⁰⁴ 《宋史》，卷 311，列傳 70，〈張士遜〉，頁 10216。

⁴⁰⁵ （宋）胡宿，《文恭集》，卷 40，〈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頁 1，總頁 1088-960。

⁴⁰⁶ （宋）胡宿，《文恭集》，卷 40，〈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頁 1-2，總頁 1088-960~961。

⁴⁰⁷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5，〈均州〉，〈雍熙中植桐于蕭寺王辰登科後告老來寺留題〉，頁 2769。

⁴⁰⁸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 年 1 版 2 刷），卷 8，頁 87。

⁴⁰⁹ （宋）胡宿，《文恭集》，卷 40，〈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頁 2，總頁 1088-961。

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⁴¹⁰而張士遜則名列第二百六十人。可見其家族並未提供強有力的經濟資源，而是憑藉本身的天賦及努力有關。

張士遜的仕途並非就此一帆風順，「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為官邵武成為張士遜仕途的轉捩點，其結識當時福建士人圈的核心份子楊億，並以文贈之。某日，張士遜至楊億門下，「楊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為文，以為有宰相器。未幾，薦為御史，尋充壽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台輔」。⁴¹¹前文可能有些傳說成分，但受楊億的賞識與通力舉薦卻是事實，透過楊億的保舉，前途大為看好，而其後被選為壽春王師，壽春王即仁宗趙禎，身為帝王之師，更是日後拜相的關鍵所在。

張士遜為保持士族優勢，不免亦採聯姻的策略，其長子張友直娶度支郎中劉明恕之女，⁴¹²張士遜四女，分別嫁與安稹、李昭邁、呂公孺、王素，⁴¹³其中李昭邁為宋初太宗時期宰相李昉之孫、翰林學士李宗諤之子；⁴¹⁴呂公孺官至戶部尚書，為宰相呂夷簡之子；⁴¹⁵王素則為真宗朝位居太尉之名相王旦的季子，官至工部尚書，⁴¹⁶他們都是家世顯赫的士族之後。張士遜子四人，一早卒，長子友直（1002-1059），字清卿，晚更字益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明道中賜進士出身。慶曆初，知襄州，罷歸。後除史館修撰，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皆有政聲。⁴¹⁷嘉祐四年卒，年五十八，與其父親同葬河南之登封。二子友侁為殿中丞，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三子中僅張友直仕途較為順遂，幼子友正則獨好書法。

張氏一門，自張友直以下未能一路開枝散葉、飛黃騰達。張士遜貴後即定居洛陽，但每年仍回鄉祭祖，並未放棄在光化的產業。張士遜死後，張氏逐漸衰落，

⁴¹⁰ (宋)馬永卿，《懶真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 4，頁 3，總頁 863-431。

⁴¹¹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頁 87。

⁴¹² (宋)胡宿，《文恭集》，卷 38，〈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頁 5，總頁 1088-949。

⁴¹³ (宋)胡宿，《文恭集》，卷 40，〈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頁 11，總頁 1088-965。

⁴¹⁴ 《宋史》，卷 265，列傳 24，〈李昉〉，頁 9140。

⁴¹⁵ 《宋史》，卷 311，列傳 70，〈呂夷簡·子公孺〉，頁 10215。

⁴¹⁶ 《宋史》，卷 320，列傳 79，〈王素〉，頁 10402、10404。

⁴¹⁷ 《宋史》，卷 311，列傳 70，〈張士遜·子友直〉，頁 10219。

其孫輩遂返回光化發展，且家庭聯姻的層次也從顯赫士族轉為民間富族，如士遜玄孫張嶠母親駱氏為光化富族，而張嶠父母皆葬於光化軍。⁴¹⁸張嶠(1095-1148年)，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1121），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紹興九年（1139），除司勳員外郎。累遷敷文閣侍制、知衢州，終於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⁴¹⁹南渡後，張嶠入蜀避難，自竹山溯堵水而上翻大巴山至達州。⁴²⁰其後與表叔陳與義同寓居浙江湖州武康縣，其後可能葬在湖州。⁴²¹

（三）郢州別氏

別之傑（？-1253），字宋才，郢州人，寧宗嘉定二年（1210）進士，歷官差充京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京湖制置副使、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等職，理宗淳祐七年（1247），拜參知政事。寶祐元年（1253）三月卒，特贈少師。⁴²²其先世「謂以大別山得氏，歲久無可攷證，南渡後散居荆郢」。大別山位於鄂東北與皖西南的交界處，別氏家族可能由大別山一帶，經長江支流沿漢水，移居至荆郢間定居。別之傑上四代為高祖震，曾祖宗，祖中孚，祖母王氏。⁴²³父湜，「字景甫，生荆楚間」⁴²⁴，「甫入黨庠，習射於圃，升降揖遜，發必中鵠」，「年二十發憤力學，夙夜不懈」，別湜雖勤力向學，並遷戶籍於襄陽，然「三舉於禮部，而連黜於春官」，晚遇特恩，會天子試士以射，別湜善射而補官，「又遇郊賞授迪功郎監邛州合同茶場」。⁴²⁵適逢別之傑亦舉進士第，主應山簿以歸，父子並命，可說是榮歸鄉里，然別湜卻有官不仕自食於家，使親俾代者往，其後則掛冠歸里。別湜妻田

⁴¹⁸ (宋)張嶠，《紫微集》，卷 35，〈先夫人歸祔誌〉，頁 14，總頁 1131-650。

⁴¹⁹ (元)脫脫，《宋史》，卷 445，列傳 204〈張嶠〉，頁 13138-13140。

⁴²⁰ (宋)張嶠，《紫微集》，卷 4，〈復到生口作別明年六月十二日僕自竹山避地泝流上餘口道由生口復經分手之地感時書事奉寄致宏時建炎四年也〉，頁 5，總頁 1131-369。

⁴²¹ 廖寅，《宋代兩湖地區民間強勢力量》，頁 46。

⁴²² (元)脫脫，《宋史》，卷 410，列傳 178，〈別之傑〉，頁 12556-12557。

⁴²³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85，〈宣義郎致仕別公墓誌銘〉，頁 13，總頁 710 上。

⁴²⁴ (宋)吳泳，《鶴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7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34，〈別少師改葬墓碑〉，頁 5，總頁 1176-332。

⁴²⁵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85，〈宣義郎致仕別公墓誌銘〉，頁 14，總頁 710 上。

氏，有二子，「長曰之英，家事巨細悉傳之長男。季曰之傑，而季子則程勵課督，使之大肆于學，每黨庠術序，郡國校試必偕焉。」⁴²⁶

別之傑顯後，遷居湖州德清縣，因荊州以北，戎馬騷擾，故將原葬於荊門上泉的父母之墓遷葬於湖州，可能不打算再回鄉，而別之傑墓誌則未見，可能也與父母同葬於湖州。別之傑早年即與搢紳之士常相往來，⁴²⁷至其歷官後，請同年及第的吳泳為其父寫改葬墓碑，其後兩人亦皆遷居湖州且寓同里，雙方可能情誼交好。吳泳為四川潼川人，⁴²⁸同為蜀人的魏了翁為吳泳的受業師，⁴²⁹亦曾為別湜撰寫墓誌銘，而魏了翁督視江淮荊湖軍馬時，別之傑為參議官，有不少公務往來。因此別之傑可能與四川士人圈關係良好。

（四）鄧城范宗尹

范宗尹（1098-1136），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宣和三年（1121）上舍登第。建炎元年（1127），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建炎四年（1130）拜平章事，年三十二，為最少。⁴³⁰後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⁴³¹紹興元年（1131）為秦檜所擠，落職，命知溫州。退居天台，紹興六年（1136）卒，⁴³²年三十九。（或云生於元符二年，年三十八。⁴³³）

范宗尹為少年宰相，其與襄陽穀城王家為世交，其行狀由王之望撰寫，然已亡佚，未見於《漢濱集》中，故難考其先祖。宗尹退居台州天台時（今浙江台州），王之望亦於紹興三年（1133）以蔭補官於台州，因家台州天台，⁴³⁴與范宗尹再度聚

⁴²⁶ (宋)吳泳《鶴林集》，卷 34，〈別少師改葬墓碑〉，頁 6，總頁 1176-332。

⁴²⁷ (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 12，〈祭別觀文文〉，頁 3。

⁴²⁸ 《宋史》，卷 423，列傳 182〈吳泳傳〉，頁 12625。

⁴²⁹ 《宋史》，卷 437，列傳 196〈魏了翁〉，頁 12966。

⁴³⁰ (宋)莊綽，《雞肋編》，卷中，〈二府除拜要略〉，頁 69。

⁴³¹ 《宋史》，卷 362，列傳 121，〈范宗尹〉，頁 11325。

⁴³² (宋)張守，《昆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0，〈祭范相文〉，頁 28，總頁 1127-795。

⁴³³ (宋)周輝，《清波雜誌校注》（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9 月 1 版），卷 7，〈宰輔年甲〉，頁 320，載：「范丞相己卯生」。則為元符二年（1099）。

⁴³⁴ 徐自明著、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 版），卷 17，〈隆興二年〉，頁 1173。

首。王之望尚未發達，而范宗尹則少年早發，卻不因此影響兩人情誼，王之望〈祭范相文〉稱：

愛等兄弟，恩均父師，悲歡離合，二紀於茲。我困蜀漢，公罷鼎司，攜孥躡屨，萬里來歸。貧賤之交，弗渝故時，口借其譽，心恤其私。饑食公食，寒衣公衣，脫我溝壑，繫公不遺。⁴³⁵

兩人相識二十餘年，情同兄弟，恩如父師，范宗尹罷相歸天台後仍對王之望多所照顧。范宗尹至天台赤城定居，正值壯年，「豈期小疾，奄至膏肓」，⁴³⁶宗尹意外因病逝世，因此應該未歸葬襄陽。而《明一統志》有載：「范宗尹墓，在臨海縣東四十五里。宗尹襄陽人，宋宰相，卒諡忠肅，葬于此」。⁴³⁷關於范宗尹之兒孫，據《卻掃編》載：

范僕射宗尹為參政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略備，豈物理亦有乘除也歟！⁴³⁸

可見范宗尹家族皆早婚，有五子及孫兒數人。其四子孝隆為樓鑰姑爺，樓鑰為浙江寧波人，可見其後代亦融入浙江士人社會。

以上幾個案例雖不能完全代表襄陽地區大族的發展，然而大致還是得以歸納出幾個趨勢。襄陽地區一直未如浙東、安徽、川蜀等地發展出實力雄厚的世家大

⁴³⁵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 16，〈祭范相文〉，頁 1-2，總頁 876-877。

⁴³⁶ (宋)葛崇禮《北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3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36，〈祭范丞相文〉，頁 4，總頁 1134-754。

⁴³⁷ (明)李賢，《明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7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47，〈台州府·陵墓〉，頁 18，總頁 472-1100。

⁴³⁸ (宋)徐度，《卻掃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中，頁 21，總頁 863-776。

族，士族、富族在本地勢力較形薄弱，亦未發展出自身的士人圈，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 戰爭因素

唐末五代戰爭動搖大族在本地的發展，加上入宋後，社會流動較強，打破唐代以來的宗族制度，在當地四代以上可稱為土著之大族極少。至靖康之難，襄陽地區被禍尤甚，嚴重影響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迫使有能力之大族舉家遷往安定地帶，例如：王之望、張嶠等家族。

2. 小農經濟

襄陽地區民風純樸，以小農經濟為主，未積極發展商業經濟，故不利聚財，加上比起其他地區州縣，文教不興，不利取士升官。例如別之傑之父別湜，還特地將戶籍由郢州遷往襄陽，以增加中舉的機率。而幾位發達的士人，多集中在襄陽府，偏僻如房州之地，少從學之士，根本不出產士子，何來士人圈的形成。

3. 富家大族多半只重自家發展

一般說來，富家大族多半重視自身家族之發展，以及個人仕途的出路，因此較少主動關注社會秩序與建設發展問題。除非不影響家族穩定的前提下，才廣施德惠，救助鄉人，尤以濟助貧困儒生為主，然而救濟的主要目的仍在於藉扶持後進，提高聲望，擴大交友圈以求厚植實力。如此一來，自然在鄉里百姓間無法凝聚強大的勢力。

4. 士人圈不發達，對外依附性強

因本地士人圈不發達，大族無論遊學、聯姻皆向外地發展，積極打入當地士人社會中心，並藉此在經濟、文教發達地區落地生根。如此對外依附性強，一旦功成名就即向外遷徙，造成對於家鄉影響力轉趨薄弱。

對於豪族、富族而言，輕財好義可能是為了博得地方名聲，並結交士人、擴大交友圈，以晉升士族之階，然而卻也不可忽略部分家族對地方上的貢獻。以前述穀城王氏而言，王之望曾祖王遷，因樂善好施、與人為善，故鄉人不稱其名，呼為長者，並有「無怨公」之稱。昔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大旱，遂成大饑，群盜紛起，「襄、鄧、唐、汝、光、隨、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儘是盜賊見今往來之處」，⁴³⁹等於亂事遍及整個襄陽地區，其中以張海部隊的勢力最大，王遷聞盜賊張海將至穀城，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凶暴之氣頓銷，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⁴⁴⁰雖王遷此舉可能出於自保，儘量避免與其他勢力發生直接的衝突，然而也真的起了保境安民的作用。此外，王遷更將家財三分之一作為待賓客、賑貧困之用，尤在賑濟方面，使「饑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辦棺槨、具衣衾」，⁴⁴¹而鄉人有因「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⁴⁴²王遷為其償還欠款，使鄉民免於骨肉分離之苦。此外，另有別之傑之父別湜，對家鄉郢州亦有貢獻，別湜辭官歸隱後，十分照顧族里鄉民，其「聞族姻有不給者，稱家有無以賙之。鰥寡孤獨癡疾者，絕甘分少以扶持之。」⁴⁴³如此助濟族人婚喪所需費用，而財貨亦不藏私，對弱勢族群同等分享並給予扶持，實為可貴。

除了上述的士族外，郢州京山有豪民張祥雄於鄉閭，家宅極大，史載有范致虛為其作堂記，朱震做蘭軒記，可見與名士亦交好。因其「名田藏鎰、金、銀、布帛，皆以億計」，故鄉里稱呼其為張十萬。「紹熙（興）初，巨盜桑仲橫行漢沔間，所過赤地。」張祥以貲財孥累之衆不能移避，因此如同王遷一般「整頓舍館，烹牛屠猪多釀酒，先路邀迎之。」剛開始，桑仲甚喜，約以秋毫無犯，然而盜賊豈有信義可言，桑仲先是強娶張十萬之女，其後逗留日久，「哨聚數萬衆，無物

⁴³⁹ (宋)李燾，《長編》，卷 143，「仁宗慶曆三年九月丁丑」條，頁 3451。

⁴⁴⁰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 29，〈贈少保王公墓誌〉，頁 7，總頁 486 上。

⁴⁴¹ 同前註。

⁴⁴² 同前註。

⁴⁴³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85，〈宣義郎致仕別公墓誌銘〉，頁 14，總頁 710 上。

可食，遂盡戕其家」。⁴⁴⁴張祥與王遷同樣施惠於盜，卻落得慘遭滅門之禍。主要是因時值建炎、紹興之際，正逢亂世，群盜據地為王相互拼鬥，而宋廷正對外交戰已自顧不暇，亂事擴張程度與仁宗時之盜亂，已不可同日而語。同時期有另一例，同載於《夷堅志》，云：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⁴⁴⁵

可見時值亂世即便未遷移的豪族亦可能遭遇橫禍，除了內有盜賊作亂，外有金軍南下，俘掠百姓財貨，地域秩序的維持已無法僅由地方家族來維繫。

當然並非所有士族豪族皆樂於救苦濟貧、樂善好施，亦有較為負面的形象，比如部分名門望族輕則漠不關心，自掃門前雪，重則危害鄉里成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大族們未能建設鄰里造福鄉邦也就罷了，權勢名利更成為其為害作亂的利器。負面的例子如：魏泰，字道輔，襄陽人，為元祐名士，有隱而不仕，因其「及試院中，因上請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毆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⁴⁴⁶其為人雖善屬文、工文辭，然而恃才傲物，年少氣盛，也因此斷送前程。魏泰詩名遠播，然而在襄陽當地卻是惡名昭彰的一方惡霸。其姐為執政曾布之妻，又與黃庭堅、章惇、王秀等名人時相來往，尤與王安石兄弟最相厚。因此魏泰利用自身權勢，「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其後更「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時歐陽修三子歐陽棐知襄州，拒絕魏泰賜地之請，屬官勸棐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

⁴⁴⁴ (宋)洪邁，《夷堅志》，支景卷1，〈張十萬女〉，頁8-9，總頁500。

⁴⁴⁵ (宋)洪邁，《夷堅志》，甲卷15，〈十七事·晁安宅妻〉，頁4，總頁471。

⁴⁴⁶ (宋)胡仔，《漁隱叢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前集，卷12，引「桐江詩話」，頁4，總頁1480-110。

然而歐陽棐竟堅持不與地，魏泰勃然大怒，因而譖於曾布，棐遂徙知潞州，旋又遭罷去。⁴⁴⁷可見魏泰權勢之大，官吏與之對抗，還落得罷職下場。史稱魏泰「為人無行而有口，頗為鄉里患苦」，⁴⁴⁸而襄陽百姓更因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言，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⁴⁴⁹

另有胡旦，為濱州渤海人，其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歷官將作監丞，通判昇州，累遷左拾遺、直史館，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再遷祕書監，卒。⁴⁵⁰可能因致仕居襄陽被《輿地紀勝》認為是襄陽鄧城人。⁴⁵¹胡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好學而著作頗多，然而性浮誕，「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⁴⁵²亦是利用權勢貪求財貨，干擾地方州縣吏治，受時人議論，他卒後，子孫因貧甚而無以為葬。而張士遜身為宰相，顯貴後居住洛陽，因其先塋在鄖鄉縣，亦未放棄在均州的祖業，時楊仲元為知縣，「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⁴⁵³雖張士遜請求免役，楊仲元卻不為減除。這些例子皆說明名士、豪族、權貴，即便自身亦為官員，在地方上亦有豪橫無理的一面。

二、其他勢力團體

（一）地方官員

由於前述襄陽地區之大族其地方勢力較為薄弱，因此，本地的社會、經濟發展部分靠地方官員來維持。派任到襄陽地區的地方官員，雖然任期不長，然而若

⁴⁴⁷ 《宋史》，卷 319，列傳 78，〈歐陽脩·中子棐〉，頁 10382。

⁴⁴⁸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史部》，冊 1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1 版），卷 3 下，〈東軒筆錄十五卷·續錄一卷〉，頁 12，總頁 8728 上。

⁴⁴⁹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4，1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2，頁 9。

⁴⁵⁰ 《宋史》，卷 432，列傳 191，〈胡旦〉，頁 12827。

⁴⁵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襄陽府〉，頁 2673。

⁴⁵² 《宋史》，卷 432，列傳 191，〈胡旦〉，頁 12830。

⁴⁵³ 《宋史》，卷 333，列傳 92，〈楊仲元〉，頁 10715。

有心整頓地方，在其職權範圍內盡心盡力，加上政府的支持，往往可以收得不錯的功效。例如本章第二節曾敘述仁宗年間唐州、鄧州地區趙尚寬等地方官員興修水利、招民屯墾，對於當地民生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襄陽古有長渠、木渠二渠，「曹魏時夷王梅敷弟兄，於其地聚民萬餘家，據而食之，謂之祖中，故當時號祖中為天下膏腴。」⁴⁵⁴可見兩渠對當地農田灌溉極為重要。兩宋時期長渠、木渠年久失修，宋廷曾先後組織過幾次大修，如《鄖溪集》中曾記載一次修復木渠過程，曰：

治平二年（1065），淝川朱君為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故道，欲再鑿之，……。即募民治之，凡渠之漸及之家，悉出以授功，投鍤奮杵呼躍而從之，惟恐不及。公家無束薪斗粟之費，不三月而數百歲已壞之迹，俄而復完矣。……，餘澤之所及，浸淫中廬、南漳二邑之遠，異時之耕者，窮力而耨之，不得槁苗，則得稗穗，今見其蒼然、嶷然，皆秀而並實也。刈熟之日，困瘡之容，則委而為露積，雖然此猶未足以見惠也。至於歲大旱，赤地焚裂而如赭，則木渠之田猶豐年也。於是民始知朱君之惠為深也。……然而朱君之為是邑，纔踰歲而去，經始之作，其美利未盡發，如其來者繼緝之，則地力可無遺。⁴⁵⁵

英宗治平二年（1065）在宜城縣令朱紘的主持下，募民而治，不費公家分毫，僅三個月不到即修復頹壞已久的木渠，因而倉廩豐實、物阜民安，遠於中廬、南漳二縣之地亦受澤被，平時百姓不覺木渠作用，至天旱時，僅木渠之田土仍舊豐稔，人民才深感其惠。此次修復行動由於受官方所領導，號召力強，影響力大，故卓有成效，然而文中也指出地方官員在任期間不長，土木初興還需繼任者持續為之，才能使地力得到充分的發展。

⁴⁵⁴ (宋)鄭獬，《鄖溪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5，〈襄州宜城縣木渠記〉，頁 1，總頁 1097-249。

⁴⁵⁵ (宋)鄭獬，《鄖溪集》，卷 15，〈襄州宜城縣木渠記〉，頁 1-2，總頁 1097-249。

靖康之亂，北宋淪亡，襄陽地區一變而為南宋的北部邊陲，長、木二渠也隨之再度湮塞。三十多年後，出於保邊安民的需要，南宋朝廷又先後對木渠、長渠進行修復。⁴⁵⁶其中規模較大的為紹興三十二年（1162）的修復之舉，據《宋會要輯稿》載：

十一月二十九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路軍馬汪澈言：「荆、鄂兩軍屯守襄漢，糧斛浩瀚，悉泝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所遣綱舡來自江西、湖南，率經年不得還，舟人遁逃，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臣今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自兵火之後，悉已堙廢。今臣先築堰開渠，并合用牛具、種糧，就委湖北、京西兩運司措置。渠既成，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饋運，又可安集流亡。……」從之。⁴⁵⁷

由於漢水冬日結冰，水位較低，無法行舟，綱運廢弛，舟人遁逃，致使襄漢地區所需軍糧不足，汪澈經查長、木二渠自靖康亂後業已堙廢，打算重新修復渠道，給予耕牛、耒耜、種糧，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作之。至隆興元年（1163），工部尚書張闡言：「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而主因在於無耕田之游民，而強迫百姓棄己熟田而耕官生田，因此，張闡建議以兩淮歸正之民來耕種荆襄之田。⁴⁵⁸而成效據《宋史·汪澈傳》言：「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⁴⁵⁹可見這次興修水利，雖耗費超過十餘萬，然而對於當地戰後社會經濟的重建，仍有一定的幫助。

而襄陽地區自南渡後成為邊區，經濟、人口皆大受影響，即便較偏遠的房州亦受戰亂波及，如紹興時期桑仲武裝集團過境房州，百姓慘遭蹂躪，而軍民絕糧。

⁴⁵⁶ 黎沛虹、李可可，《長江治水》（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版），頁66。

⁴⁵⁷ (清)徐松輯，《宋會要》，食貨63之125，〈營田雜錄〉，頁6035。

⁴⁵⁸ 《宋史》，卷176，志129，〈食貨上四·屯田〉，頁4273。

⁴⁵⁹ 《宋史》，卷384，列傳143，〈汪澈〉，頁11815。

紹興三年（1133）晉鷺來守，「於蜀郡收取穀種，令軍士開墾。至秋大熟，倉廩富足。凡貧民之能為工匠者，令修製軍器農具，移州治。並州學俾民遣子弟入學，免役稅。」⁴⁶⁰經晉鷺的努力經理下，房州始得以恢復社會安定富足的生活。因此，若非在地方官員的積極主持下以及政府投入財源與人力修復，南宋時期地方秩序的恢復，實難如同北宋時由民間百姓出錢出力即可建設鄉里。

（二）宗教團體

宗教不僅為百姓帶來精神上的平靜與寄託，事實上也對民眾日常生活起了實質上的作用與庇護。尤以宋代靖康之亂，為平靜社會帶來巨大的變亂，自此邊疆不寧，盜賊蜂起，襄陽地區因成為宋金邊界，百姓莫不魚潰鳥散，而身處亂世，即便是宗教佛門清靜之地，亦可能飽受戰亂摧殘與攻擊，例如郢州有趙橫寺，據載：

在京山縣南，靖康間，霍明據郢，遣其徒沒角牛。兵寇復州，過趙橫寺欲縱火，主僧求見，盛怒將斬之，以其貌古而言有理，遂加敬焉。寺寂然無人，但見先師慈護菩薩塑像，懼而焚香，斂兵亟去。⁴⁶¹

當時不少寺廟慘遭焚如之禍，趙橫寺算是個幸運的例子，因在菩薩面前惡人無膽，未遭縱火殘殺。不少位居僻靜山區、地勢險要之寺院，承平之時則興修水力，鄰里受惠，亂時則成為百姓的庇護所，以隨州大洪山之保壽禪院為例，哲宗元祐七年（1092）時，有樞密劉奉世捨俸金買芙蓉湖田，築室延請道楷禪師主持，四方僧侶來歸，而後成為寺院道場。先是芙蓉湖其水匯聚瀾漫百餘里，師嘗謂若決而歸之川，可得良田數千頃。常平使者聞其言，使邑令造訪禪師，並依禪師所言規畫並鑿渠疏導。昔日菰蒲沮洳之地，皆為良田沃壤，鄉人亦受德惠，乃相率捨

⁴⁶⁰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6，〈房州〉，頁 2787。

⁴⁶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4，〈郢州·仙釋〉，頁 2741。

田於寺。寺院歲入既豐，又將其所餘給與馬鞍山，並可贍養數百眾。⁴⁶²此次廢湖為田之舉，因道楷的積極擘畫，加上政府官員的支持，集眾人之力，使溼地為田畝，歲收大增且尚有餘力供養數百人，院方與百姓皆蒙受其惠。

靖康年間，有王在、黨忠、薛廣、祝進等盜賊擾於京西河北。如「王在、黨忠共攻隨州，官吏居民皆棄財物於道路，奔入大洪山；奔走不及者，皆為在等驅擄而去。」⁴⁶³以隨州而言，在亂中得以逃脫者，皆不顧財貨直奔入大洪山區避難，而寺院則成為接納百姓與官員的避難所，寺僧與百姓等避寇之人則於山中結寨自保，並「有帶甲僧千數」⁴⁶⁴，因山勢險要陡絕，難以攀登，故賊兵竟不能攻破。⁴⁶⁵至紹興元年（1131）三月，大洪山保壽禪院則因容納過多難民致使米糧殆盡，據《三朝北盟會編》載：

是時北方僧來投洪山者，戒臘徒有一千六百餘眾，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官及寄居僅百家，皆仰給於寺中。住持僧慶預計糧食將盡不可以支，乃集官員僧眾陞堂為說糧盡之意，見任寄居之家一例更供贍一月，一月之外請自營求，在寺僧行日給米二合，皆以為其言合理，而閒有僧之老者，僧童之小者，皆餓死，官員老小尋路而南，有達者，有不達者，眾僧請慶預別供粥飯，慶預終不從，亦日食米二合而已。⁴⁶⁶

據上文來看，大洪山自靖康以來不僅容納官員、百姓百戶，且飲食皆仰賴寺院供給，紹興元年（1131），又有一千六百多名僧侶，自北方前來投靠，若再加上原有院方僧眾，糧食支應困難是勢所必然。第六代住持慶預，料想糧食將盡，邀集

⁴⁶² (清)張仲忻，《湖北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冊16，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初版），卷10，〈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十方第二代楷禪師塔銘〉，頁34下-36上，總頁11995-11996。

⁴⁶³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73，〈靖康中帙〉，頁9，總頁(二)之112。

⁴⁶⁴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12，〈四正旁通圖〉，頁220。

⁴⁶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3，〈隨州〉，頁2705。

⁴⁶⁶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45，〈炎興下帙四十五〉，紹興元年二月，頁11-12，總頁(三)之136。

眾人商討分配之事，寄居者一家供糧一個月後則必須自求營生，僧眾則日給米二合，不少年長幼小之僧眾皆餓死，而南逃官員百姓或活或死於道中。然而當時「環繞百里地人煙悉為盜境」，⁴⁶⁷而大洪山得以支應數千人，獨全於亂世，且「所活何止萬人，士大夫之家賴以生者猶七八百數。」⁴⁶⁸實為不易。

戰後襄陽地區的開墾修復，寺院往往扮演積極召集者的角色。紹興五年（1135），經歷宋金戰爭後，雖然宋軍收復了襄漢一帶，但遍地卻是滿目瘡痍，寺院自然也不例外，前例隨州大洪山的寺院地亦完全荒廢，〈隨州大洪山遂禪師塔銘〉載：

紹興乙卯（五年），師退居東堂，未數月，宣撫使司居大洪，時襄漢纔復，百里絕人，荊榛塞路，虎狼交跡。山頂僧行，散逃餒死，所存不過百數，日食野菜、橡糜，以度朝昏。供利阻隔，屋宇墮頽，莊夫、耕具十無一、二。師方定居，勸勉緇徒，開通供路，招置人牛，□辟田圃。未期歲，問四方禪衲駢肩而來，檀越、社供如赴約束。逾年，僧及半千，次滿七百。復修院宇，追述先範，大闡綱宗。自此靈濟道場廢而復興，師住持十有三年，叢林再盛，不減疇昔。⁴⁶⁹

由上述可知，襄陽地區在亂後民生凋敝、赤地千里，野獸出沒於道路，屋毀人亡是一片荒涼的景象。即便是官員宣撫使亦居大洪山，可見山上雖受破壞，然仍能自存。在寺院住持遂禪師的主持下，以僧徒開通道路，招置器具、人牛以恢復農耕、開闢田畝。如此不到一年，四方僧侶雲集歸附，一年餘僧侶至五百人，次年則增至七百人之多，道場再次復興，不減以往盛況。

以上雖受限於史料，主要以佛教隨州大洪山保壽禪院一例來探討，未必可以

⁴⁶⁷ 同前註。

⁴⁶⁸ (清)張仲炘，《湖北金石志》，卷 11，〈隨州大洪山第六代住持慧照禪師塔銘〉，頁 17 上，總頁 12006-12008。

⁴⁶⁹ (清)張仲炘，《湖北金石志》，卷 11，〈隨州大洪山遂禪師塔銘〉，頁 22 下，總頁 12009。

推及至襄陽地區境內所有寺院祠廟，然而此地屢遭戰火，隨州大洪山寺院平時可開闢田畝，亂時可組織甲兵予以自保，亂後可在一年內招集僧眾闢地開墾，或許不可忽視部分寺院在地方上的經濟力量，比起朝廷政府力量更形強大，而宗教團體的團結力強、號召力廣，因此在戰亂之餘，隨州大洪山能在襄陽地區安輯流亡，救濟饑貧，這對於當地社會經濟的安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民間武力集團

進入南宋時期，由於襄陽地區連年戰爭加上地處宋金邊界，特殊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一類特殊的族群，作為維持地方秩序與社會發展的主體，即由土豪或官卒或百姓等所組成的民間武力團體。集團的種類與興起因素複雜，大致上一類是地方百姓、鄉民為了在亂世中，保護財產與身家安全而組成的義勇、土豪，對於地方安定與鄉里秩序有一定的貢獻；另一類為因戰亂被迫離鄉的流民所組成的集團，其中成員更形複雜，帶頭者可能原為官卒、土豪、盜匪或者一般百姓，此類武裝集團因戰亂四處流竄，成員複雜，較有紀律者可能幫助地方安業建設，大部分則是剽掠州境，對地方社會秩序之安定反而是一股破壞力。

以第二類的武力集團而言，因騷擾州境之情事不斷發生，因此，高宗時，參知政事范宗尹建議：

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⁴⁷⁰

在這種國家外有強敵壓境，內有盜賊充斥之情況下，與地方武裝集團對抗，不如析出部分州縣之地，給予一些兵權，使盜有所歸，亦可屏障王室。高宗遂起用范宗尹之議，設置藩鎮及任命鎮撫使，希望達到穩定地方的作用。

⁴⁷⁰ 《宋史》，卷 362，列傳 121，〈范宗尹〉，頁 11325。

襄陽地區亦在藩鎮的設置範圍內，其任命的鎮撫使如下表 3-5：

表 3-5 襄陽地區鎮撫使表

姓名	籍貫	出身	鎮撫地區	置罷時間	個人結局	備註
陳求道	不詳	官	襄陽府鄧隨 郢州鎮撫使 兼知襄陽府	始：建炎四年六 月庚辰 罷：建炎四年六 月	1.未赴鎮	進士出身
桑仲	不詳	軍卒 盜	襄陽府鄧隨 郢州鎮撫使 兼知襄陽府	始：建炎四年八 月戊戌 罷：紹興二年三 月戊戌	1.被部將霍明所殺 2.其職為李橫所代	1.原王彥部曲 2.宰相范宗尹 奏任之 3.兵力最初十 餘萬
霍明	不詳	軍卒 盜	權襄陽府鄧 隨郢州鎮撫 使司公事權 知襄陽府	始：紹興二年五 月甲子 罷：紹興二年六 月辛丑	1.未之鎮，被李 橫、李道所逐 2.改任江西兵馬副 督監	桑仲部下 兵力最初兩千
李橫	高密	軍卒 盜	襄陽府鄧州 鎮撫使兼知 襄陽府	始：紹興二年六 月辛丑 罷：紹興三年正 月乙亥	改任	1.桑仲部下 2.仲死橫繼之
			襄陽府鄧郢 隨州鎮撫使 兼知襄陽府	始：紹興三年正 月乙亥 罷：紹興三年二 月庚戌	1.改任神武右副軍 統制，京西招撫使 2.部眾隸趙鼎	1.軍馬數萬
李道	相州	盜賊	鄧、隨州鎮 撫使兼知鄧 州	始：紹興二年六 月辛丑 罷：紹興三年正 月乙亥	1.因李橫不敢拜， 改任知隨州 2.後歸岳飛為統制 官	1.原桑仲部下 2.贈太尉諡忠 毅
范之才	不詳	官	金均房州鎮 撫使兼知均 州	始：建炎四年六 月庚辰 罷：建炎四年六 月庚辰	未赴鎮、死	
王彥	河內	土豪	金均房州鎮 撫使兼知金 州	始：建炎四年十 一月丁巳 罷：紹興五年四	1.改任知荊南府充 歸峽州荊門公安 軍安撫使	1.張浚承制任 之 2.兵力最初七

				月丁未	2.紹興九年十月丙寅死於邵州	百，最盛三十萬 3..改任宋官
翟興	伊陽	土豪	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	始：建炎四年五月乙丑 罷：紹興二年三月癸丑	被部將楊偉所殺，年六十	1.兵力最初數百，最盛有數千 2.在境內屯田
翟琮	伊陽	土豪	權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	始：紹興二年七月己巳 罷：紹興三年七月乙未	1.逃至襄陽，兵歸李橫 2.紹興四年四月庚子，改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 3.後歸趙鼎	1.翟興之子 2.琮實遙領虛名，未實轄之
本表改自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台北：東大，2002年3月初版），頁157-164，表4-1。						

由上表來看，襄陽地區所任命的七名鎮撫使中官員出身者為兩名，土豪一名，曾為盜者就有四名，素質低落，如桑仲在地方上為一「凶逆」，最初桑仲在京西，因「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啗，又數為金州人所敗，欲引眾北去。」至棗陽縣，始「被任命鎮撫使，遂還襄陽駐軍」。續霽曾上書張浚言宋廷以桑仲為鎮撫使「是獎亂也」，等於將「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⁴⁷¹可見鎮撫使的設立，從一開始對於襄陽地區就是個錯誤。此外，由於宋廷除北伐與守區淪陷時才會撥糧，於平時並不供糧，因此全靠鎮帥自行設法解決。以前述來看，數州縣皆無糧食，甚至人吃人的慘劇。為求生存，取得糧食，一部分鎮撫使求助於茶鹽官，或奪取鄰近州縣的財賦，有的發動戰爭肆行抄掠。⁴⁷²例如桑仲欲往房陵，卻被鎮守金、均、房州的王彥從問道出兵斷其糧，⁴⁷³因而有多次爭戰，這對於州縣境內

⁴⁷¹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42，〈紹興元年二月癸酉〉，頁765。

⁴⁷²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台北：東大，2002年3月初版），頁174-175。

⁴⁷³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丁巳〉，頁737。

的秩序，造成極大的破壞。此外，亦有部分採行在地實施屯田，屯田比起破壞性的掠奪而言，雖需要時間耕作，但寓兵於農，自給自足，對於地方秩序的安定有其作用存在。如桑仲屬下霍明以都統制知郢州，時郢州「百室無一二存者」，仲命霍明領兵二千守之。鄰近德安鎮撫使陳規有意與霍明結好，以問其與桑仲，是故霍明遂與陳規通好不絕，⁴⁷⁴亦積極「措置郢州，頗有條理，市井買賣漸有向生意。近城多種二麥，亦有戀郢之心」。⁴⁷⁵

整體而言，由於鎮帥素質參差不齊，其所領導的軍隊多半軍紀廢弛，雖名為鎮撫，然實與盜寇無異。而其內部部屬、官長間彼此相殺，如霍明攻殺桑仲，繼之為鎮撫使，其後被桑仲舊屬李橫、李道所逐，而走漢陽。⁴⁷⁶轄區內戰火瀰漫，為求糧食，雖偶有以屯田、營田等方式自行營生，然而短期內需龐大軍需糧食，仍不免時常滋生事端，引爆戰火。未能平定寇亂、對抗外侮也罷，還因而為亂地方，百姓受荼毒者甚多，但復業者極少，這些皆與原本宋廷所期待成效相去甚遠，加上須時時提防鎮撫使勢力興起，甚至可能尾大不掉等種種因素下，⁴⁷⁷遂於紹興五年（1135）四月盡罷。⁴⁷⁸

南宋以來，襄陽地區邊境多事，破壞社會安定，故人民自組武裝團體，為鄉勇、義勇或曰土豪。宋寧宗以後，由於沿邊正規軍已趨敗壞，「開禧用兵」暴露宋朝正規軍的腐敗與地方官吏不能通力合作，致使襄陽此一邊防重鎮長期被圍，幸得官吏與地方義勇、土豪的悍禦，使金兵無功而退。由於民間地方武力有助於戰區的防守與攻擊，此後，襄、淮一帶的守將，相繼擢用土豪，組織民間武力。⁴⁷⁹襄陽地區最著名的例子為隨州土豪孟宗政、孟珙父子。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親孟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其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因金將完顏董來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

⁴⁷⁴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42，〈紹興元年二月癸酉〉，頁 765。

⁴⁷⁵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50，〈炎興下帙五十〉，頁 8，總頁(三)之 167。

⁴⁷⁶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55，〈紹興二年六月辛丑〉，頁 1466。

⁴⁷⁷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頁 182、201。

⁴⁷⁸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88，〈紹興五年四月丁未〉，頁 6。

⁴⁷⁹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頁 273。

遊擊，因而受宣撫使吳玠拔擢，補承節郎、棗陽令。又加上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紮襄陽。⁴⁸⁰孟宗政在襄陽地區諸戰役中屢敗金人，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者有萬人，宗政發廩贍之，並給田、創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以荊鄂都統制卒。⁴⁸¹可見土豪出身的孟宗政，因威勇善戰而受朝廷重用，為人又好賢樂善，安置北方中原流民，供屋給田，並集結壯士組成「忠順軍」，此種類似以屯田組成部曲親兵之性質，強化了地方武裝力量，並促進地區的安定，這在戰時為求生存是不得不採行的策略。而此舉在抗金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效果。其後其子孟珙繼之，帶領忠順軍。孟珙不僅軍功卓著，並對家鄉隨州棗陽亦繼續積極經理，紹定元年（1228），孟珙規劃興修水利設施，於棗陽創平堰，「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⁴⁸²由於屯田養馬經理得宜，是年收穫量為十五萬石。而孟珙身為南宋後期京湖戰區的重要主帥，坐鎮荊襄，儼然為南宋的一道屏障。

由於許多豪民自小「生長邊城，押近敵眾」，加以「知地利，得人和」，正因為是自己家鄉故有「愛惜骨肉之情」及「保全鄉井之誼」，無論是戰是守皆全力以赴，誓死捍衛。因此，對於國家戰力及防禦能力的增強皆大有幫助，加上招集之義軍亦不輸正規軍，所以端平年間，魏了翁建議，集結京湖諸郡「鄉民丁壯屯聚相保者」，「獎拔而倚用之」。並委派參謀官別之傑「結納襄、隨兩郡土豪」，以及「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官民兵」，共同克復襄陽。⁴⁸³也因加入了民丁、土豪這批生力軍，使宋廷不致於速亡，不得不肯定土豪對於社會安定及保家衛國有一定的貢獻。

⁴⁸⁰ 《宋史》，卷 403，列傳 162，〈孟宗政〉，頁 12211。

⁴⁸¹ 《宋史》，卷 403，列傳 162，〈孟宗政〉，頁 12213。

⁴⁸² 《宋史》，卷 412，列傳 171，〈孟珙〉，頁 12370。

⁴⁸³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30，〈繳奏奉使復命十事〉，頁 3，總頁 264 下。

第四章 文化發展

第一節 學術教育

一、 學校教育

宋代開國之初對於教育並未十分注重，蓋自太宗至仁宗慶曆初年主要為振興科舉時期，國家專重考選。慶曆四年（1044），「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⁴⁸⁴批評當時不重教而重選的科舉辦法，主張興辦學校，應科舉者須先受學校教育，⁴⁸⁵仁宗「乃詔州縣立學」。⁴⁸⁶至此，才帶動興學的風氣。可見由太祖開國至仁宗約八十年間，政府對於教育活動並未積極的推展。宋代官學主要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個體系，以下探討宋代對於地方教育的推行。

（一）地方官學

宋代行政區畫分為三級制：第一級為路；第二級為府、州、軍、監四種名稱，州治常有，府軍監三制隨著地方特殊情形而設立，較不常有；第三級為縣。故宋代普通行政制為路統州，以州統縣。所謂地方官學，包括府、州、軍、監學及縣學，其教育的對象為庶民子弟。以下略述宋代地方官學教育興學概況。

宋代立國之初，天下未定，太祖與太宗雖崇尚儒術，但對地方官學卻未加重視。直到真宗景德三年（1006），始詔天下諸郡修先聖廟；另詔廟中起講堂、聚學徒。四年（1007）五月，詔州城置孔子廟，然而諸項措施仍欠積極。直到北宋慶曆以後，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先後倡導的三次興學運動，即慶曆、熙寧與崇寧興學，並將重點置於州縣學，始大力推動了地方學校教育的發展。

⁴⁸⁴ 《宋史》，卷 155，志 108，〈選舉一〉，頁 3613。

⁴⁸⁵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1 月臺 3 版），頁 141

⁴⁸⁶ 《宋史》，卷 155，志 108，〈選舉一〉，頁 3613。

先是，仁宗於「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並賜田給書，學校相繼而興」。⁴⁸⁷這是屬於較為零星的地方學校建置，無論立學及或賜州學學田、書籍等，皆須朝廷批准，並且僅允許藩鎮之地才可立學。至慶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仁宗大規模的「詔天下州縣立學」，⁴⁸⁸「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⁴⁸⁹如此州郡皆有學，大大開啟各地興學的風氣。在州學主管方面，原以本州最高一般行政長官如知州、通判兼領學事。慶曆四年「始置教授，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⁴⁹⁰設置專職，以教授主管學內之事，雖仍受知州、通判的管轄，然而對於敦促地方教育之發展，大有助益。

第二次興學為神宗熙寧時，王安石上奏：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⁴⁹¹

原有的科舉制度產生重詞藻、輕經義等種種弊端，打算以學校教育選舉考察人才來取代。神宗亦「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⁴⁹²故「熙寧二年（1069），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⁴⁹³並下詔興學以招徠雋賢之士。而知制誥宋敏求提出：「州縣有學舍而無學官。四方之士輕去鄉里者，以求師也」，希望能「請州置學官」，⁴⁹⁴可見原先州縣雖已有設學但始終缺乏師資，使士子不得不離鄉以求師問道。

⁴⁸⁷ (清)徐松輯，《宋會要》，崇儒 2 之 2-3，〈在京小學〉，頁 2174。

⁴⁸⁸ 《宋史》，卷 11，本紀 11，〈仁宗三〉，頁 217。

⁴⁸⁹ 《宋史》，卷 167，志 120，〈職官七〉，頁 3976。

⁴⁹⁰ 同前註。

⁴⁹¹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0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42，〈乞改科條制劄子〉，頁 6，總頁 1105-319。

⁴⁹² 《宋史》，卷 155，志 108，〈選舉一〉，頁 3616。

⁴⁹³ (元)馬端臨，《通考》，卷 31，〈選舉考四·舉士〉，頁 293-1。

⁴⁹⁴ (清)徐松輯，《宋會要》，崇儒 1 之 30，〈太學〉，頁 2163。

第三次興學為徽宗崇寧元年（1102），宰相蔡京建議「天下皆置學，郡少或應書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學，學悉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學，州縣皆置小學。推三舍法遍行天下。」⁴⁹⁵可見其目標主要為大舉擴充州、縣學，建立起由縣學至太學、地方到中央一套完整的學校制度，進而廢止科舉，施行三舍考選升補之法，以達到由學校取士的目的。由於除了州學外，縣層級亦廣為置學，崇寧元年（1102）八月，「請天下諸縣皆置學，令佐掌之。學置長、諭各一人」。⁴⁹⁶可見縣學最高行政主管仍由縣令、縣佐兼領學務，但另置學長及學諭各一人，以專司其事。期間亦多次擴充州、縣學之規模與經費之增減。然而，至宣和三年（1121），「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⁴⁹⁷因此一切又恢復太學與州縣學互不銜接的制度，而州縣學亦縮減為舊有的規模。

至於路學的設置，亦在徽宗崇寧年間。路的層級雖高於州、縣，然而，徽宗以前並未設置專司或派專人管理一路的學政，而係由各路負責掌經度一路財賦的轉運司兼領。崇寧二年（1103），朝廷在路一級設立提舉學事司，其長官稱「提舉學事使」、「提舉學教官」或稱「提舉學事」。主要「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⁴⁹⁸至此，始有專門單位管理一路學政，提舉學事司遂成為地方官學的最高行政主管機構，至宣和三年（1121）始罷。

以上為宋代幾次官學興學的概況，整體而言，北宋初期，地方尚未有官學，主要重視科舉取士。北宋中期官學開始設立，經過慶曆變法，官學漸增。經過王安石的新政更見擴展。但其主要限制仍在於經費缺乏。徽宗崇寧年間，蔡京大事興學，撥用常平款項，官學極盛，但後來一面減費亦有弊端，學風因而大壞。⁴⁹⁹靖康年間，部分州縣學遭兵火焚毀。宋室南渡之初，兵馬倥傯，故學未暇復建。

⁴⁹⁵ (元)馬端臨，《通考》，卷 64，〈學校考七·郡國鄉黨之學〉，頁 432-3。

⁴⁹⁶ (清)徐松輯，《宋會要》，崇儒 2 之 8，頁 2177。

⁴⁹⁷ 《宋史》，卷 157，志 110，〈選舉三·學校試〉，頁 3668。

⁴⁹⁸ 《宋史》，卷 167，志 120，〈職官七〉，頁 3971。

⁴⁹⁹ 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和私學的消長〉，收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出版社，2005 年 10 月出版 4 刷），頁 226-227。

直至高宗紹興中，兵事稍息，⁵⁰⁰於是始於十二年（1142）二月，「詔諸州修學宮」。⁵⁰¹之後，續於紹興十四年（1144）二月，詔天下州縣皆立學。至二十六年（1156）八月，詔頒元豐、崇寧學制於諸路。⁵⁰²至此，南宋地方官學規制始定。。

（二）襄陽地區州縣學的發展

襄陽地區官學教育的發展、教育機構的設立，亦與前述幾次的興學不無關係。以下將襄陽地區各州縣設學概況整理為表 4-1。

表 4-1 宋代京西南路州縣設學暨重修表

府州軍	縣	創建時間	重修時間	位置或修建原因	出處
襄州 (襄陽府)		北宋時	仁宗慶曆五年(1045) 哲宗紹聖元年(1094)	乃湫溢卑濕，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者歎焉。	《道鄉集》，卷 25，〈襄州遷學記〉頁 8-10。
			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六月	襄陽自兵火廢亂邑屋蕩，……。紹興十二年(1142)九月詔書下諸郡修學宮，於是權知府事淮安蔡南公，念茲邦學校久廢，即歡以承命。	《紫微集》卷 32，〈襄陽府重修州學記〉，頁 6-8。 襄陽府原襄州，宣和元年(1119)升府。
襄州	穀城		仁宗康定元年(1040)	置於縣治東南。	《歐陽文忠公集》，〈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頁 33-34，云：「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據此推斷其時應在仁宗康定元年。
襄州	光化	北宋時	哲宗元符三年(1100)二月	洪中孚初至，謁孔子廟祠，怪其堂序失次，而風雨鳥鼠侵	《濟南集》，卷 7，〈襄州光化縣重修縣學記〉，頁 6-9。《宋史·

⁵⁰⁰ 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年 3 月初版），頁 6。

⁵⁰¹ 《宋史》，卷 30，本紀 30，〈高宗七〉，頁 555。

⁵⁰² 《宋史》，卷 31，本紀 31，〈高宗八〉，頁 586。

				敗，屋室土摧木腐，瓴飄壁裂，貌像敬殘，器用缺折。	地理志》，頁 2114 載：「光化軍，……乾德二年，以襄州陰城鎮建為軍。熙寧五年（1072），廢軍，改乾德為光化縣，隸襄州。」
襄陽府	宜城			宜城縣儒學在縣治毓秀山下。	《湖廣通志》，卷 22，頁 20。
襄陽府	南漳			校址位於縣治東南門	《湖廣通志》，卷 93，〈南漳縣御書閣記碑〉，頁 22。碑立於紹定三年十月，但知縣陳治平修學時未詳。
鄧州		北宋時		神宗元豐元年(1078)詔諸路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京東路兗、徐、曹、鄆、青、密州應天府各一員，京西路西京國子監許、陳、襄、鄧州各一員。	《文獻通考》，卷 46，頁 432。
鄧州	內鄉	北宋時			據(清)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二十八)》，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初版)卷9之4，〈宋八行八刑碑〉，頁67，總頁21069載：內鄉縣存，碑立於大觀□年。故可推知當時縣已有學。
隨州					據《鴻慶居士集》卷39，〈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頁10-11，載：「擇善公紹興二年

					(1132)進士出身，後除隨州教授，故推知在高宗時應有學。」另《明一統志》，卷61，頁9載：「隨州學宋建。」
房州			高宗建炎三年(1129)	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	《紫微集》，卷31，〈修房州大成殿記〉，頁13-15。
均州		真宗咸平中(998-1003)		位於治東玉帶街	《湖廣通志》，卷22，頁21，載：「均州儒學在州治東宋咸平中建。」
鄧州		仁宗景祐三年(1036)六月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鄧州立學，各給田五頃。	《長編》，卷118，「仁宗景祐三年六月甲子」，頁2791。
			孝宗淳熙五年(1178)	學校承天府學(即宋之鄧州)，在府治東南。宋初建于州北，淳熙五年移于此，元末毀。	《明一統志》，卷60，頁12。
鄧州	京山	北宋時	徽宗崇寧二年(1103)十月	京山縣學在縣治西，宋崇寧間，因徽宗下詔興學，知縣劉幹建學城南河畔，元因之。	(清)張仲炘，《湖北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十六)》，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初版)，卷91，程祁〈京山縣新學記碑〉，頁15-16，總頁11986，碑立於崇寧二年十月。另《湖廣通志》，卷22，頁13，
唐州		北宋時			《宋會要》，崇儒2之7載：「元符三年(1100)，十月十八日，唐州言：『乞專置

					教官一員。』從之。」 據此可知當時州已有學。
唐州	泌陽	北宋時		泌陽縣儒學，在縣治西。宋建，元初廢縣為鎮，學亦燬。	《河南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 版），卷 42，頁 37。另據《金石彙目分編》卷 9 之 4，〈宋大觀聖作碑〉，頁 62 載：泌陽縣存，碑立於大觀元年（1107），故推知當時縣已有學。
唐州	比陽	神宗元豐間 （1078-1085）	哲宗元祐五年（1090） 八月	知縣閻譽曰：「吾今之政，足以靖一時，未足以移易舊俗，欲此邦之人，回心嚮道，溫溫穆穆，一變為孝秀之行，其惟養之以學校乎！顧吾鄉校摧圯已久，肆習無所，而營繕有制，勿能復興之。」	《濟南集》，卷 7，〈唐州比陽縣新學記〉，頁 12-14。
資料來源：據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附錄二之四〈京西南路設學一覽表〉，（頁 306-307）；附錄五之一〈宋代州縣學修建原因一覽表〉，（頁 438、453）內容編排修改而成。					

首先就襄州來看，據〈襄州遷學記〉載，原本「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1044）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于城中，至是蓋五十年矣。」⁵⁰³可見慶曆興學前，襄州已有州學的設立，原本設在襄陽城外，慶曆五年（1045）重修時才移於城內，若往前推敲已有五十年歷史，至少早在太宗至道元年（995）時襄陽已有設學。其後，至哲宗紹聖元年（1094）時，由於原有學宮，「湫溢卑濕，不與州稱，因

⁵⁰³ (宋)鄒浩，《道鄉集》，卷 25，〈襄州遷學記〉，頁 9，總頁 1121-378。

循不問，識者歎焉」，直祕閣知荊南府呂嘉問調知襄州，看到當地州學因年久失修而低濕狹小，故同京西提點刑獄事胡宗炎奏請翻修。以原有基址修建，總共費時「凡一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有八楹」，整個煥然一新。其規制據〈襄州遷學記〉云：

繇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為閣，以藏書籍；分廡為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厨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為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為燕息之地。⁵⁰⁴

據上述文字可知，襄州州學的規模相當完善，經重門而入，設有前殿、講堂、議道堂作為授業學習之所，並有藏書閣存放圖書。除了學習上必備的一般教學設施外，凡屬師生生活所需者設備亦皆齊具。例如：將廂房作為齋房，成為學生寢居之處，而鳳山堂則為教師的居所；飲食、沐浴所需的廚房浴室無一不缺；設置倉庫存放祭器、錢糧；射圃類似操場，可供師生休憩燕游、射箭習藝等。這些建築設施，等於是政府在提供教學場地之外，亦兼具養士功能。如此完備的設施及空間配置，在全國可說是屈指可數，「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

505

即便州學規模如此宏大也難逃宋金戰火波及，加上「吏治不良，民俗蠹壞，禮義科旨之事不復聞耳矣」。⁵⁰⁶直至「紹興十二年九月，詔書下諸郡修學宮」，⁵⁰⁷在官員蔡南公的主持下，使校舍得以重修。戰火餘生下的襄陽，自然「材物用度一皆省嗇，諸用而取其餘」，⁵⁰⁸又加上時值饑饉，故差遣無食無業之百姓，給以食，藉其力而州學成。建築規模上，張嶠云：

⁵⁰⁴ 同前註。

⁵⁰⁵ 同前註。

⁵⁰⁶ (宋)張嶠，《紫微集》卷 32，〈襄陽府重修州學記〉，頁 6，總頁 1131-623。

⁵⁰⁷ 同前註。

⁵⁰⁸ 同前註。

為屋若干楹，凡學之所宜有畢具。中為殿，以奉先聖十哲，繪從事之賢於兩廡下。屋皆因俗，以竹為瓦，獨殿宇土木雄傑，視承平所為，無甚愧嚴，先聖之居不敢視陋也。⁵⁰⁹

據上可知，凡是學校之所需皆俱全，中有殿堂，旁有兩廡，皆奉祀孔子十哲塑像及諸賢畫像。以竹代瓦，而殿宇雄傑不比承平時遜色。當然這些有可能為溢美之言，一來張嶠對於屋楹數目語焉不詳，僅曰若干，對照紹聖時則指出屋有一百九十八楹；再者，其隻字未提建築內部有無宿舍、圖書室、倉庫、廚房、衛浴設備等其他室內設施，或許此次重修迫於現實，規制無法如同以往。然而州學的重建，對於亂後的襄陽得以「拔取州之秀民，羣聚而教之，擇其德齒可屬衆者，為之表率，使之出則修之學，入則修之家」，⁵¹⁰其所起的教化作用，仍是足以稱道。

襄州之下的縣學也是襄陽地區數量最多、發展較早的，有南漳、穀城、宜城及光化等縣學。譬如穀城縣之設學，早在「隋唐之際，天下之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其後州縣學廢，然而四時之祭仍然於廟舉行。所謂廟係指孔廟，自唐太宗貞觀四年（630）起，「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⁵¹¹並於廟內舉行釋奠禮，另外再配合從祀制以及塑繪諸賢像等措施，⁵¹²而形成所謂廟學制。穀城縣學亦是屬廟學，約仁宗康定元年（1040）時，穀城縣政久廢，縣令狄栗到任後沒多久，即遷文宣王廟（即孔廟，亦稱夫子廟）於縣左，並於廟旁置學舍及藏儒家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並備齊祭祀、宴饗所需各式禮器，以行祭拜之事。⁵¹³如此積極修禮興學，使穀城士民「人知尚文，風俗淳美」。⁵¹⁴

光化縣學於哲宗元符三年（1100）時重建，可見前朝已建，然正確年代不詳。

⁵⁰⁹ 同前註。

⁵¹⁰ (宋)張嶠，《紫微集》卷32，〈襄陽府重修州學記〉，頁7，總頁1131-623。

⁵¹¹ (宋)歐陽修，《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2版），卷15，志5，〈禮樂五·吉禮五〉，頁373。

⁵¹² 前引書，頁375。

⁵¹³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39，〈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頁11-13，總頁296下-297下。

⁵¹⁴ (清)薛剛、吳廷舉，《湖廣圖經志書》，卷8，〈襄陽府〉，頁50，總頁833。

因縣官洪中孚初到任，謁孔子廟祠，發現堂序失次，屋舍因受風雨鳥鼠侵蝕而腐朽敗壞，而屋內磚瓦、神像、器物皆殘缺損毀，不禁喟然而嘆。洪中孚詢問當地耆舊得知，當光化縣為光化軍時，無論祭祀之禮、器物用具皆精省簡陋，如同虛應故事，即便有所修繕，也不過是稍補缺漏，而產食之學田也被徵收，自是無講學之士，久而久之學風日趨衰弱凋敝。縣官有意移風易俗，然而財用不足，因此發起捐獻個人資財，自是士民們紛紛響應，「願獻貲以助用者，願獻地以益基者，願新繪塑者，願新祭器者，願按圖指位，則治材董工自作其處者，板築樸斲，塗泥丹雘，惟恐或後」。⁵¹⁵在眾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合作下，使得無論是殿宇廳堂、聖賢塑像、各式祭器等，皆有所考徵，並合於禮儀規制，奉祀先聖先賢皆恭敬嚴整。在建築設施上，「重堂沉然，扉闔洞然，藏書有府，藏粟有庾，廡序戶牖，一皆從便，藩垣庖廡，一皆有法」。⁵¹⁶可見，有廳堂門戶、窗牖、籬笆矮牆等建築結構，到講堂廂房、府庫藏書、穀倉藏粟、廚房衛浴等生活所需空間，皆一應俱全。縣學的落成，有助於使百姓回心向道，尊聖賢，崇道德，提升當地的教化。

南漳縣縣學修建時間已不可考，然而在慶曆年間詔郡皆立學，縣內興學的情況可藉由碑記一探究竟，據載：「縣或左支右吾，摩挲他務。聖謨普頒，往往藏諸夫子廟，登受弗專，未足以奉揚休命也」，⁵¹⁷可見至少南漳縣內對於仁宗時所頒布的詔令，不是含混敷衍、應付了事，就是忙於他務，未能專意奉行，是故天子的旨意無法實際發揚於縣內，由此可知當時雖下詔立學，然縣學卻未能有所發展，此後南漳縣內教育情況即未可知。而南宋時期，因宋室南渡，南漳「始距行在所四千里，中更開禧邊烽倏擾，稽古禮文之事多闕焉。」⁵¹⁸直到理宗紹定年間，在縣令陳治平的主持下，「首節先聖先師十哲像，且繪七十二賢於兩廡，修明倫

⁵¹⁵ (宋)李廌，《濟南集》，卷 7，〈襄州光化縣重修縣學記〉，頁 8，總頁 1115-807。

⁵¹⁶ 同前註。

⁵¹⁷ (清)張仲忻，《湖北金石志》，金石志十二，〈南漳縣御書閣記〉，頁 37 上，總頁 12039。

⁵¹⁸ 同前註。

堂，闢進德、復禮二齋，請沒入官田以贍生員」，⁵¹⁹而後又新建宸奎之閣，高大華美，過者莫不肅敬。因論，襄陽地區位於邊境，事以多故，開禧之後兵端復起，能有縣官不忘教育事業，尚且興學並照顧士子，實屬不易。

除了襄州以外，其餘唐、鄧、均、房、隨、郢州皆設有州學，而唐、鄧、郢三州則另設有縣學。例如唐州至少於哲宗元符三年（1100）以前，即有州學設立，泌陽與比陽兩縣北宋時亦設有縣學。據〈唐州比陽縣新學記〉載：

元豐間，今翰林蜀公范公之守唐也，其僚曰：「是邦寇攘歲比滋繁，願奏于朝，治以重法。」范公曰：「……吾厚之以忠信，彼當自愛」。……乃大興學校，又從而教字之。范公之德，其澤遠矣。唐之士民獨憾，屬縣大夫未有以范公之心為心者也。其後十年，吾友師文來比陽，……顧吾邑鄉校，摧圯已久，肄習無所，而營繕有制，勿能復興之。奈何邑之士民皆曰：「以大夫之賢，猶能立祠植碑，以頌遺愛，況興黌舍以教養吾類乎。異時奉釋老，媚鬼神，猶且殫力，況孔子之宮乎。」乃胥勸胥傲相地基，遂鳩工集材，惟恐後時，祠殿廊廡，翼翼耽耽，游於斯者，藹然有慕仁義之心，肅然有尊道德之意。⁵²⁰

由上文寫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來看，往前推十年大約神宗元豐三年（1080），時值「翰林蜀公范公之守唐」，范公當指范鎮，其為成都華陽人，封蜀郡公，曾為翰林學士，⁵²¹可能短暫守唐州。⁵²²因唐州時有寇亂，依往例守臣治民皆施以嚴刑峻法，但范鎮獨不然，因此大興學校，教民習字，人民深受其恩德，然而卻也感嘆唐州轄下諸縣長官，未能有如范公者，有心以德育感化百姓。相隔十年後，

⁵¹⁹ 同前註。

⁵²⁰ (宋)李廌，《濟南集》，卷7，〈唐州比陽縣新學記〉，頁13-14，總頁1115-809。

⁵²¹ 《宋史》，卷337，列傳96，〈范鎮〉，頁10783、10789。

⁵²² (宋)范鎮，《東齋記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3，頁6，總頁1036-594：「王景彝，性嚴謹，與予同在唐。」

閻譽出知比陽縣，雖有移易舊俗，推廣德教之心，但原有鄉校早已損毀，鄉民無學習場所，然而工程修建又有其定制。閻譽認為縣學難以修復，但士人百姓卻認為以官員之能力，興建校舍、重建孔廟應該沒有問題，在士民勸說下，因而招集工人、準備材料，祠堂、殿宇、廂房俱備，學校遂成，百姓於此啟發仁義道德之心，並使人材得到更多培育的機會。可見當地士人雖有重視教育之理念，也表明並非不能竭力建造校舍，然而仍難以集結自身力量行建設之事，需藉由官員的行政效令為之推廣才得以設學。

位襄陽地區最南端的郢州，其州學始興學時間不詳，僅知「宋初建於州北」，⁵²³至孝宗淳熙五年（1178）移於州治東南。郢州有縣學設於京山，縣學最初設置可能早在徽宗之前已有，但因京山地形四境環山，而夏秋之間，易有暴雨，縣內官私廬舍與學校常因大雨而侵蝕敗壞。徽宗崇寧時，「登用舊臣，首頒學制，於是敷天下畫士成邑者，皆得以置學」。由於「郢州京山縣，地廣以遠，民能自力於本務，耕鑿織紉，循楚之舊」，而「朝廷之所常育人材者，不在茲乎」。就是時受朝廷忽略且民不向學，當地士人、長者初聞詔書時，莫不感激涕零。縣令劉幹為人爽朗，勤學好古，因而聞詔響應，擇地興建廟堂校舍，頗有次序。縣學設立後，「晨講分齋以聚，朋來衰衣之士，鼓篋而至者，蓋相望也」。⁵²⁴可見希冀向學，自四方集聚而來的士子儒生，絡繹不絕。受到徽宗崇寧間大興學校政策的影響，即便是襄陽地區較為偏僻的房州，同樣也因而設學。舊有州學設在州城之南西偏，以原有孔子廟加以修飾以符合詔命，然而其後經歷宋金戰爭、寇盜流竄等變故，再加上此地一向不重教育，又缺乏從學之士，因此州學倒塌毀壞而未加修復。至高宗建炎三年（1129）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太守王公乃命都監趙侯更作新廟。趙都監在州治之東找了一塊地，其地勢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頗有

⁵²³ (明)李賢，《明一統志》，卷 60，〈興都·學校〉，頁 12，總頁 473-230。

⁵²⁴ 本段京山縣設學引文，皆據《湖北通志》，卷 91，程祁〈京山縣新學記碑〉，頁 41-42，總頁 105-106。

往昔學宮的形制，遂以此形勢而改築成孔子廟大成殿。⁵²⁵

由上述所言襄陽地區州縣學設學情況，可知北宋在仁宗、徽宗兩朝大力興學下，各州幾乎皆設有州學。此外，縣學設置的狀況亦不算太差，縣學設立的情形與到任官員有極大的關係，雖政府曾下令州、縣興學，然而我們從史料敘述來看，地方縣政常因財用不足，對於中央下令設學一事，多半敷衍了事，即便設立，也常因缺經費難以延請儒者至當地講學，加上部分百姓專務生產、不重教育，久之遂文教不興。前述不少縣學得以設置，且頗有規模，可說是由於縣官的積極辦學才有了此德政，使文教事業並未完全阻絕在襄陽地區之外。雖說州、縣漸次有學，然而實際收到的成效、培育人才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有關運作的狀況，徽宗大觀二年（1108）五月，據提舉京西南路學事路瑗報告：

臣所領八州三十餘縣，比諸路最為褊小，學舍乃至三千三百餘區，教養生徒三千三百餘人，贍學田業等歲收斛斗六萬三千餘貫、石。⁵²⁶

由路瑗的奏陳可知，宋初至徽宗大觀年間，官學教育在襄陽地區的發展規模，每州平均學生約四百餘人，所需設備、校舍、經費也堪稱足夠，似乎在地方教育上頗有成效。然而，隨後大觀三年（1109）路瑗受罰一事可知本路教學狀況。據《宋會要》載：

四月二十八日，祠部員外郎、前京西南路提舉學事路瑗罰銅八斤。以臣僚言：「近試貢士，京西南路上中下等並無中選者，若槩罰一路太守、教官不勝其眾，提舉官不得其人，則人才等進，濫中者多。」故有是罰。⁵²⁷

⁵²⁵ (宋)張嶠，《紫微集》，卷31，〈修房州大成殿記〉，頁12-13，總頁1131-617。

⁵²⁶ (清)徐乾學編，《資治通鑑後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97，〈宋紀九十七〉，大觀二年五月庚戌，頁13，總頁343-779。

⁵²⁷ (清)徐松輯，《宋會要》，職官68之15，〈黜降官五〉，頁3903。

大觀年間朝廷試貢士，該路學生無論上、中、下等第並無一人中選，因此前京西南路提舉學事路瑗遭到罰銅八斤的處分。即便是由崇寧元年至大觀三年（1102-1109），七年的時間，三千多名的學生卻未能培養任何一名學生可以中選。可見，歷經多次下詔興學，在地方官吏的努力之下，雖然廟堂、校舍等硬體設備已有改善，整體設學數量亦有增加，然而實際教學內容、師資與學生素質仍有待提升。

（三）書院教育

官學之外，尚有書院以及私人講學等教育形式。以宋代私人書院而言，源起於五代，代寺院而興。其興起原因，呂祖謙有言：

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⁵²⁸

朱熹亦言：

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⁵²⁹

兩人之言點出，在北宋初年，始脫離五代紛亂局面，宋廷致力於統一大業，尚無

⁵²⁸ (宋)呂祖謙，《東萊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6，〈白鹿洞書院記〉，頁 8，總頁 1150-54。

⁵²⁹ (宋)朱熹，《晦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79，〈衡州石鼓書院記〉，頁 35-36，總頁 1143-650、651。

暇顧及教育事業，北宋初期四十年，地方上少有正式學校，因此學者往往在山林曠野間，擇良地，建精舍，聚眾講學，成為私人書院的前身。

然而劉子健則指出所謂四大書院，在北宋初期可說是言過其實了，而前述呂、朱兩人所言，是為重新辦學，故推崇久已中斷的往事。實際上，宋初少數書院，規模很有限。政府經由地方官的申請，僅是稍與獎贈而已。至真宗咸平四年（1101），經官員申請，才對於少數私學予以優待，或准許開辦少數半官立或官立的學校，⁵³⁰如《宋論》言：「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⁵³¹因此論者雖皆言宋代書院教育發達，然則實際上書院始於北宋中葉，其後受到仁宗、神宗及徽宗朝三次大興官學的影響，令州縣皆立學，因而不免打擊書院發展，因此書院大興還是要到南宋才有長足的發展。

以襄陽地區整體而言，北宋時期政府官吏於此大力倡導的幾次州、縣學興學運動，然而州縣設學時有財政困窘的狀況，加上當地學風不盛，不是虛應故事，就是過不了十餘年學舍又頹圯荒廢。光是官方大力主導下的興學，就可能遇到經費不足的問題，何況私人書院要募集經費更是不易，再加上官學教育多少遏阻了書院教育的發展，因此書院在襄陽地區並不盛行。北宋時期，地近京城的鄧州，曾短暫有兩所書院：一為鄧州城東南隅百花洲上的花洲書院，⁵³²仁宗慶曆六年（1046），時范仲淹知鄧州，見百花洲風光旖旎，因而進行整治與修建工作，「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⁵³³並重修春風閣、覽秀亭諸名勝。覽秀亭為謝絳任州守時所創，至范仲淹來鄧州時亭早已壞，因而重修，並有〈覽秀亭詩〉為記。⁵³⁴范仲淹公餘之暇常偕友往游百花洲上，飲酒攬勝、賦詩抒文，留有

⁵³⁰ 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和私學的消長〉，頁 213-215。

⁵³¹ (清)王夫之，《宋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初版），卷 3，頁 45。

⁵³² 苗春德主編，《宋代教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 版，頁 105-106。

⁵³³ (宋)王得臣，《塵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2，〈賢德〉，頁 1，總頁 862-611。

⁵³⁴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集部》，冊 45，1976 年 1 版），卷 1，〈流民嘆〉，卷 2，〈覽秀亭詩〉，頁 9，總頁 22 上：「南陽有絕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危亭，屹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我來亭蚤壞，何以待英遊，試觀荆棘繁，欲步瓦礫稠。嗟嗟命良工，美材

多首詩詞，如中元夜至百花洲賞月，詩云：「南陽太守清狂發，未到中秋先賞月。百花洲裏夜忘歸，……主人高歌客大醉，客醉起舞逐我歌。……」⁵³⁵等語，可謂一派率真狂放，與民同樂的景象。閒暇之外，范仲淹並不忘育才，於百花洲畔建花洲書院，並親講學於春風堂，後為歷代學宮；⁵³⁶另一為賈狀元書院，位在鄧州城西南隅紫金山，⁵³⁷據傳為宋狀元賈黯讀書之所，後登第建書院。⁵³⁸賈黯為鄧州穰人，仁宗慶曆六年（1046）中進士第，為天下第一，時年二十五，⁵³⁹故人稱賈狀元。書院建置與發展情況因缺乏相關資料而不詳，然賈黯原於此地讀書，後因其以「狀元及第歸鄧州」，時值「范文正公為守」，⁵⁴⁰賈黯受教於范仲淹，可能受到范公勉勵後進之言，因此亦於原讀書之處設置書院，吸引士民前來讀書。

及至南宋，受戰爭影響成為邊區的襄陽地區，整體社會經濟皆受到極大打擊，在教育上，也因戰事頻仍，校舍或毀於兵火，或囿於經費難以維持，等於本地已無餘力發展教育文化事業。官學教育如此，書院教育亦然，因此，書院教育雖盛於南宋，然而在戰火激烈的襄陽地區根本難以自存，且遺留下來的資料極為缺乏。戰爭期間，襄陽士子百姓多流徙深山窮谷之間，或舉家向南方遷移。理宗淳祐年間（1241-1251），時值孟珙任京湖安撫制置使，坐鎮江陵，他眼見自有兵難，「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聚於荆鄂之間。四民皆窮，而士為甚。」⁵⁴¹因而上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

肆爾求，曰基復日構，落成會中秋。……。」

⁵³⁵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2，〈中元夜百花洲作〉，頁8-9，總頁21下-22上。

⁵³⁶ 季嘯風，《中國書院辭典》，杭州市：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版，頁161

⁵³⁷ 《河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3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43，〈學校下·南陽府〉頁51，總頁536-530。

⁵³⁸ (清)蔣光祖，《鄧州志》（乾隆二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初版），卷4，〈山川〉，頁1，總頁102。

⁵³⁹ (宋)王珪，《華陽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54，〈賈黯墓誌銘〉，頁14，總頁1093-400。

⁵⁴⁰ (宋)邵伯溫，《聞見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8，頁11，總頁1038-760。

⁵⁴¹ (宋)高斯得，《恥堂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4，〈公安南陽二書院記〉，頁6，總頁1182-56。

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⁵⁴²孟珙所建的兩座書院之中，位在武昌的南陽書院，即是取諸葛武侯躬耕之地為書院名，而目的就是為了容納流連在外、無所歸依的襄陽士人於此。據〈公安南陽二書院記〉所載：

南陽餘六十楹，田租歲入六千石有奇，山澤鬻征之利為錢四百萬，養士百有四十人。擇文學行義之士，眾所推服者以師表之。旬有課，季有試，暇日則教之射。士無饑渴以害其心，咸自砥礪，以成其業，居無幾何。……襄人試于大廷，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勸。⁵⁴³

由上述所言來看，書院規模不小，約有六十間房，其田租及收入頗豐，共養士一百四十人，並且經眾人推選具學問德行之士為師。關於書院生活與課程內容方面，除了平日自習讀書，每十天則聚眾講課，三個月測驗一次，閒暇時不忘鍛鍊身體練習射箭。在如此豐沛的資源下，使讀書人無後顧之憂，故得以砥礪身心、精進學業，而在廷試上亦有不錯的表現。而此一南陽書院直到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仍持續留存並重新翻修，且規模更為宏大。⁵⁴⁴在如此兵連禍結的時代，身處戰爭第一線的孟珙，仍不忘盡一己之力，猶能設學養士、敬教勸學，實為難能可貴，更使得南宋時期襄陽地區之士人百姓，不因家鄉戰亂、文教發展不易，而喪失了受教的機會。

二、私人教育及其他

除了官方與私人興辦學校的教育體制外，部分士人或富豪注重子弟教育，因

⁵⁴² 《宋史》，卷 412，列傳 171，《孟珙傳》，頁 12380。

⁵⁴³ (宋)高斯得，《恥堂存稿》，卷 4，〈公安南陽二書院記〉，頁 6，總頁 1182-56。

⁵⁴⁴ (元)程鉅夫，《雪樓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0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1，〈重修南陽書院記〉，頁 28，總頁 1202-143。

而有私人藏書閣，猶如小型圖書館，對於鄉里間學術文化的傳播尤有助益。而一些百姓可能因經濟環境因素或教育體制的不健全，未能進入學校或書院讀書，故常向鄰里中有名望之士族求教或借閱書籍。例如：唐州方城人（今河南方城）范貺「富而善教子，作經史閣以藏書，諸子皆有時名」，范貺請友人向李廌求詩，故有詩云：

隱君扁舟離五湖，初聞邑子驚陶朱，多金不用五字術，高閣惟藏萬卷書，
牙籤玉軸比四庫，縹帙錦囊過五車，河間闕遺應復購，汲冢蠹簡嗟無餘，
碧山學士解傳業，黃卷古人相與居，謝庭芝蘭信靈秀，竇家椿桂皆芬敷，
朱欄翠瓦照空碧，秋山晚林共扶疏，寒溪送月出幽谷，白雲因風生坐隅，
道山三館限清禁，山中此樂彼所無，異時聯華陟嚴近，白虎東觀文石渠，
願待善本校中祕，毋令後儒爭魯魚。⁵⁴⁵

詩中先言訝異范貺富甲一方可比陶朱公，致富不必飼養牛、馬、豬、羊、驢五種母畜，⁵⁴⁶只需藏書萬卷於高閣。經史閣藏書數量與種類豐富，書籍畫卷之豐富可比四庫，書卷詩稿更多過五車，且蒐羅古今圖書、竹書蠹簡皆無遺漏。經史閣不僅為藏書之處，亦為文人學士傳授學業之所，居有書籍古人為之相伴，因而門下子弟傑秀，詩文精妙。朱薨碧瓦的樓閣與晴空映照，望去是林木扶疏美景佳勝。如此徜徉山光水色、晴雲秋月之中，此種讀書之樂是人文薈萃但出入森嚴之三館所無。李廌詩末期許范貺覽書、藏書之外，亦能校閱善本，刊定謬誤，以嘉惠後儒。據詩中所言，范貺藏書量驚人，可比官方藏書樓。經史閣的設立，除了滿足富族喜好藏書之樂趣，亦提供士人一個良好讀書講學的場所，雖詩中未言明，然而對於後代子弟人才的培養，甚至整個鄉里好學風氣的提升，皆具有正面的影響。

在州縣學不發達的地方，又缺少名儒碩望在書院聚眾講學，想要接受教育，

⁵⁴⁵ (宋)李廌，《濟南集》，卷3，〈經史閣〉，頁16-17，總頁1115-738。

⁵⁴⁶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6，〈養牛馬驢騾〉，頁2，總頁730-68，有言：「子欲速富，當畜五牴。」

所能依賴的反而是地方上大家族所提供的教育資源。例如以隨州的教育發展情況而言，據前述表 4-1 推知，較確切的州學建立時間，至少至南宋高宗紹興初年始有。北宋開國至南宋初年，如此長的一段時間，即使曾設有州學，因缺乏記載想必規模也不大。年少時居住在隨州的歐陽修（1007-1072）曾言：

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耶？予少自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⁵⁴⁷

隨州雖近京畿千里之內，然而百年間卻未出一士，土地瘠陋貧瘠，無可上貢之物，反觀朝廷中的達官顯貴，卻往往由福建、浙江、嶺南等偏遠地區出身，可見隨州不僅經濟落後，長期以來文教不興亦不產士，更遑論有爲官之人。歐陽修自幼在隨州生活將近二十年，以在地人的生活經驗，道出當地風土民情，認為由於土地貧瘠，人民求食謀生已相當不易，即使五穀豐收的好年頭，生活無虞的大族也不注重生活品質之提昇，未能種植花木建置園林，享受休憩遊賞之樂。對於教育事業更不在意，僅城南大族李氏，家有藏書且注重子弟教育。

歐陽修四歲而孤，與母依隨州做推官的叔父歐陽曄，隨州地區僻陋無學者，歐陽家又貧困無藏書，歐陽修在母親的教育下，至以荻畫地學書，刻苦學習。其後結識城南大姓李氏，李氏其子堯輔，頗好學，歐陽修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與李氏諸兒嬉戲，想來兩家感情交好。李氏家喜好收藏古今圖書，某日，歐陽修「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⁵⁴⁸雖然歐陽修仍年少，讀之未能悉究其義，但甚為傾慕韓愈之

⁵⁴⁷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 13，〈李秀才東園亭記〉，頁 8，總頁 474 上。

⁵⁴⁸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 23，〈記舊本韓文後〉，頁 8，總頁 547 下。

文。其後時常向李氏借書以觀，奮發勤學，至忘寢食，希冀某日得與韓愈相比肩。因此，若無隨州李氏豐富的藏書與慷慨借閱，也難以啟迪歐陽修對文學的愛好，成為日後古文大家。雖然未有更多的史料佐證，然而部分大族因為重視子弟教育，多有藏書，等於在當地成為教育學術中心，連帶促進了學術傳播與推廣，並提升重教興學的風氣。

另外，由於富族、士族多半重視子弟的教育，因而著姓有學，士族有藏書，即使其後轉化為寒素之家，仍舊訓子好學者，比比皆是。例如應山連舜賓，⁵⁴⁹其先本閩人，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後葬於應山，遂家焉。⁵⁵⁰連氏作為外來大族，在應山並無根基，加上自連光裕之後其子孫皆未仕，可能由士族轉化為富族，所幸家貲尚稱豐厚，因此連庶之父連舜賓將家財「悉散以賙鄉里」，並積極參與當地公共事業。連舜賓對於子弟的教育亦十分注重，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⁵⁵¹連氏家族因樂善好施，賑窮濟貧，在地方上頗有聲望。然而連氏至連庶一代耗盡了家財，連庶致仕時，家甚貧，⁵⁵²雖淪為庶姓寒門，卻未丟棄重教樂學的家風，且於應山尚保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故至其孫輩連南夫官至中大夫、⁵⁵³連萬夫在建炎時卓有戰功。⁵⁵⁴

而對於部分窮困士子而言，為了尋求教育資源，可能離家至鄰近的州縣求學，或者盡可能拓展人際關係結交士族富族，融入當地社會。如前述歐陽修的例子，由江西至湖北生活，除了結識隨州李氏外，與隨州城東應山連氏亦常相往來。歐陽修與寓居應山的宋庠兄弟貧賤時，皆依連庶。⁵⁵⁵宋庠、宋祁與連庶、連庠兄弟曾一同在應山法興佛舍讀書講學，因而有同舍情誼，彼此相好。其後，歐陽修

⁵⁴⁹ 應山縣地屬安州，非屬襄陽地區境內，因鄰近隨州，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曾一度劃歸為隨州境內。參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3，〈隨州〉，頁 2699。

⁵⁵⁰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 24，〈連處士墓表〉，頁 7，總頁 198 上。

⁵⁵¹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 24，〈連處士墓表〉，頁 8，總頁 198 上。

⁵⁵² （宋）鄭獬，《鄖溪集》，卷 14，〈送連君錫公分司歸安陸序〉，頁 15，總頁 1097-247。

⁵⁵³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6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9，《連公墓碑》，頁 11，總頁 1165-299。

⁵⁵⁴ 《宋史》，卷 453，《忠義八·連萬夫》，頁 13337-13338。

⁵⁵⁵ （宋）李燾，《長編》，卷 237，「神宗熙寧五年八月甲申」條，頁 8。

與二宋官運亨通，宋庠更官至宰相，二連雖亦登科，然仕途不振，卻不願攀附其三人，故官終不顯。⁵⁵⁶鄉里之人因二連有德、二宋有才而尊為四賢，於法興寺設有四賢堂。⁵⁵⁷仁宗朝曾為宰輔的張士遜，其年少時，貧寒無依，曾讀書於武當山。⁵⁵⁸關於其較詳細的讀書求學的情況，據〈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載：

幼即穎特，習貫如素。及其長也，身長七尺，天骨峻擢，隤然志量，莫挹其際，受經于嵩陽張恕先生。恕，有道之士，見公學尚根本，行中儀矩，歎謂之，曰：子天機如法，未易可涯。後與濟北戴國忠、廬陵歐陽慶（疑為歐慶），學於鄴城。⁵⁵⁹

張士遜從小即聰穎出眾，習慣樸素自然。其身高有七尺，骨骼特異高聳，然而其志氣度量從不顯露，旁人亦不可得知其才能發展的邊際。曾向河南嵩陽張恕學習經術，張恕為有德行道藝之人，見張士遜學習追求本源，言行舉止皆合法度，因而感嘆其天賦極高，前途難以限量。其後張士遜則與濟北（今山東長清縣南）戴國忠，廬陵（今江西吉安）歐慶在鄴城，即光化的陰城一起讀書。〈行狀〉所稱歐陽慶極可能為歐慶，歐陽修著有〈永春縣令歐君墓表〉一文，時歐陽修嘗為乾德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即太傅贈太師中書令張士遜、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與歐慶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同里亦同有賢德，皆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鄉閭。三人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然而彼此際遇卻不同，張士遜已貴顯於朝，然歐慶因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尚為州縣吏，然歐慶不改節操，因此歐陽修作此表以記歐慶德行。⁵⁶⁰張士遜雖家貧未能就學於州縣學，然而為求學問至學術教育發達的河南嵩陽學經，在光化時更與同鄉之士

⁵⁵⁶ (宋)張耒，《張耒集》（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版），卷49，〈二宋二連君祠堂記〉，頁764。

⁵⁵⁷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3，〈隨州〉，頁2706、2714。

⁵⁵⁸ (宋)張耒，《張耒集》，卷49，〈二宋二連君祠堂記〉，頁764。

⁵⁵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3，〈隨州〉，頁2706。

⁵⁶⁰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24，〈永春縣令歐君墓表〉，頁12-13，總頁200。

人共同研讀學問，相互砥礪。這些例子皆是讀書人有志於學，不放棄可能的學習機會，積極尋求教育資源，始能學有所成。而此種求教於私人的教育類型，某種程度上替代並彌補了官方或私人學校教育功能的不足，並顯示出教育資源極度缺乏。

第二節 藝文成果

襄陽地區自古以來人文薈萃，文學發展、藝術成就極高。至唐代，襄陽因南北水陸交通便捷，商業發達，往來行舟，絡繹不絕，騷人墨客多會於此，帶動文化產業發展，使藝文發展達於鼎盛，擅於文學詞章之士輩出，如杜審言、孟浩然、杜甫、席豫、鮑防、張繼、皮日休等。宋代以降，政治中心與文化重心的轉移與唐末五代戰亂影響，襄陽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皆遭受一定程度的衝擊，藝文發展也略顯消沉。南宋時期，襄陽做為防禦國土的第一線，時常遭受戰火襲擊，因而造成經濟衰退、社會動盪、文教停擺，在此種社會背景下，藝文發展更是少有所可稱述者。雖然整個社會環境不利於藝文活動，然而北宋襄陽地區仍舊有著緩慢發展，故本節主要以文學、藝術與工藝科技三大方面論述如下。

一、文學

宋代襄陽地區亦有不少愛好文學之士，專意於寫作而有專著，以下列舉襄陽地區著名文人及其在文學上的特點與成就。

（一）魏泰

魏泰，字道輔，號漢上丈人，晚號臨漢隱居，襄州鄧城人，生卒年不詳。⁵⁶¹

⁵⁶¹ 劉瑞光，《魏泰《東軒筆錄》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5月，頁2-3，推論魏泰出生不會早於其姐魏玩出生之年仁宗景祐二年（1035），卒年則以魏泰〈荆門別張天覺〉與李廌〈從德鄰至鄧城訪魏道輔故居懷道輔〉二詩推論魏泰卒於徽宗大觀三年

出身世族，魏氏一家在襄陽頗有勢力和影響，屬於官宦世家、書香門第。魏泰為曾布夫人魏玩之弟，個性詼諧，然而恃才豪縱，因毆打考官而終身未仕，主要生活在宋神宗、哲宗、徽宗時期。魏泰個性狂傲偏激，時倚仗姊夫曾布之勢，危害鄉里。《郡齋讀書志》亦載魏泰「晚節卜居漢上，人頗言其倚子宣之勢，為鄉里患苦云。」⁵⁶²雖然在言行上頗受爭議，然而其有口才，長於文辭，「博極羣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亶亶終日，作詩自成一家」。⁵⁶³因為人豪邁，交遊廣泛，與王安石、王安國、王雱、黃庭堅、呂大臨、徐禧，章惇、米芾、李廌等人皆有交誼。

由於魏泰親歷、親聞了許多朝廷軼事，又善於為文，故著有《東軒筆錄》十五卷、《續錄》一卷、《襄陽題詠》二卷、《臨漢隱居集》二十卷、《臨漢隱居詩話》一卷等書。《東軒筆錄》是一本史料筆記，作於宋哲宗元祐年間，記載了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舊事，包括朝廷掌故、瑣聞軼事等，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魏泰用自己的獨特視角及不同於正史的敘述方式，記載其所見聞之社會現象，尤其關於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事例記載甚詳，包括王安石性格特徵、生活興趣及社會交遊的片斷軼事、王安石兩次罷相及其與變法集團的關係等，⁵⁶⁴若將其內容與其他史料相互對照印證，可補正史之不足，因此本書具有其參考價值。

至於《臨漢隱居詩話》一書，則專論唐宋詩人的詩歌創作並予以評判。內容編次主要以記事與議論相間，評論則以簡短詞句描述唐宋詩人寫作特色，例如論唐代白居易「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⁵⁶⁵並直指白詩千篇一律，讀而多厭；於宋代則褒王安石詩為佳句，論歐陽修之詩「才力敏邁，句亦雄健，但恨其少餘味爾」，⁵⁶⁶諷黃庭堅的喜用奇字，「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⁵⁶⁷

(1109)。

⁵⁶² (宋)晃公武，《郡齋讀書志》，卷4下，〈臨漢隱居集二十卷〉頁19下，總頁8782。

⁵⁶³ (宋)胡子，《漁隱叢話·前集》，卷12，頁4，總頁1480-110。

⁵⁶⁴ 劉瑞光，《魏泰《東軒筆錄》研究》，頁40。

⁵⁶⁵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頁9，總頁1478-296。

⁵⁶⁶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頁6，總頁1478-295。

⁵⁶⁷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頁8，總頁1478-296。

雖品評詩人不隨世論，端憑己意，為言偏頗，但論詩歌創作的本質頗有見地，如其言：「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⁵⁶⁸

（二）魏玩

魏玩，字玉汝，北宋襄州鄧城人，其為文學批評家魏泰之姊，丞相曾布之妻，生卒年不詳，主要生活在宋神宗年間。封魯國夫人，世稱魏夫人。其夫曾布（1035-1107），字子宣，為江西南豐人，進士出身，任宣州司戶參軍，後任海州懷仁縣令。神宗熙寧二年（1069），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宋神宗，遂留京，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夫婦有長達五年的安定生活，直至熙寧七年（1074），因市易法與王安石政見相左，遂去位。元豐初年（1078）至元祐年間，朝廷任命異動頻繁，使曾布疲於奔命徙知桂、秦、陳、蔡、慶州、太原府等。直到哲宗紹聖初年（1094），曾布徙江寧，過京城時，章惇留為翰林學士。在近二十年的漫長歲月間，夫妻聚少離多。這一時期恰為魏夫人文學作品形成的重要時期。哲宗紹聖四年（1098）二月曾布任樞密院使，重新成為能夠左右朝政的關鍵人物，仕途生涯達到頂峰。直到徽宗崇寧元年（1102）六月，曾布罷相，知潤州，至大觀元年（1107）卒于此。⁵⁶⁹

魏玩自幼博覽群書，有文采，以詩詞見長，是北宋著名女詞人，與南宋李清照齊名。朱熹曾評論曰：「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⁵⁷⁰清人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云：「魏夫人詞筆頗有超邁處，雖非易安之敵，亦未易才也。」⁵⁷¹由這些評論足見其在宋代詞壇上的地位。魏夫人現存作品有詞十四首，詩一首，內容較為單一，多描寫閨情與離愁別恨。⁵⁷²如〈好事近〉云：「不堪希望去

⁵⁶⁸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頁6，總頁1478-295。

⁵⁶⁹ 《宋史》，卷471，列傳230，〈曾布〉，頁13714-13717。

⁵⁷⁰ (宋)朱熹，《朱子語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0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140，〈論文下·詩〉，頁14，總頁702-813。

⁵⁷¹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7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版），卷2，頁23，總頁239。

⁵⁷² 周聖弘、周達斌，〈魏玩：詞筆超邁女中才〉，《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7卷9期，2007年9月，頁42。

程賒，離腸萬回結」；⁵⁷³〈菩薩蠻〉曰：「何處是離愁，長安明月樓。」⁵⁷⁴這是由於丈夫宦遊，二十年來夫妻總處在聚少離多的狀況，除了寥寥的幾封家書外，此外即是無盡的孤單和寂寞，怎不會有滿腹的怨懟與離情愁思，「錦屏繡幌與秋期。腸欲斷、淚偷垂。月明還到小窗西。我恨你，我憶你，你爭知。」⁵⁷⁵如此直白的描寫內心情境，大膽的宣泄內心的情感，雖稍嫌缺乏雅致，然而其內容真實、感情真摯，表達了官宦貴婦們的情感世界。⁵⁷⁶

當然，魏玩作為官宦夫人，雖有與丈夫離別的愁苦，但畢竟不像李清照那樣顛沛流離，歷經國破家亡和與丈夫生離死別的痛苦，因此魏玩的詞未能反映社會生活諸多的面相，多以簡潔明白的詞句抒發個人內在情感。然而也不可否認在北宋女性作家中，魏玩表現出宋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無論其內容與風格，皆對其後的文學創作者產生一定的影響。此外，雖未能有更多史料說明魏玩自小接受何種教育，然而魏家有此著名女詞人，足以顯示對子弟教育的重視，即便女子亦然。

（三）米芾

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元章，號襄陽漫士、鹿門居士，又號無礙居士、海岳外史。祖籍太原，北宋時徙居襄陽，世稱米襄陽，後長住兩浙。因其母曾為英宗高皇后的乳母，英宗時授予校書郎，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徽宗時召為書畫學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人稱米南宮。米芾「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善書畫，富收藏、精鑒賞。詩詞頗有特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好潔成癖，不喜與人共用布巾器

⁵⁷³ (宋)曾慥，《樂府雅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下，頁 66，總頁 1489-274。

⁵⁷⁴ (宋)曾慥，《樂府雅詞》，卷下，頁 68，總頁 1489-274。

⁵⁷⁵ (明)陳耀文，《花草粹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3，〈中調〉，頁 16，總頁 1490-396。

⁵⁷⁶ 張明華，〈魏夫人的文學作品與宋代貴婦的感情歸宿〉，《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2 卷 3 期，2004 年 9 月，頁 60。

具，然而個性瀟灑狂放，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⁵⁷⁷又被稱為米顛。與蔡襄、蘇軾、黃庭堅並稱宋四大書家。所著有《書史》、《畫史》、《硯史》、《寶章待訪錄》、《寶晉英光集》錄詞一卷。

米芾的詞以山水為主，兼及擬古、抒懷、贈別、思鄉等內容，題材內容明顯比前人擴大，風格不再僅限婉約嫵媚一路。米詞中的山水大多清雅絕俗，並且以畫家的眼光觀察山水景物，景色描摹如畫，詩詞極富色彩，充滿意象。如〈西江月〉（秋興）描寫秋日山光水色的壯麗，云：「溪面荷香粲粲，林端遠岫青青。楚天秋色太多情，雲捲煙收風定。」米芾的〈水調歌頭〉（中秋）也同樣寫的俊逸超脫：「清時良夜，借我此地倒金甌。可愛一天風物，遍倚欄杆十二，宇宙若萍浮。醉暈不知醒，軟枕臥江流。」⁵⁷⁸如此月夜，飲酒作樂，醉倒江邊，是多麼的豪放不羈。米詞詞風的爽朗狂放，正反映著北宋中後期詞風，已經擺脫五代詞風的局限，開始了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題材和風格的多樣化正是宋詞走向成熟的標誌。

（四）張嶠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為張士遜的玄孫，陳與義的表侄，少時曾從陳與義學習。而陳與義少則學詩於石淙，張嶠復問詩於與義，⁵⁷⁹故其詩風格與陳與義相似。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五言古詩「辭語高簡，意味深遠」，絕句「精麗宛轉有思致」較勝與義，⁵⁸⁰其他詩體亦氣體高朗，頗足以自名一家。其古文典雅沉穩，有北宋諸家之規矩法度。著有《紫微集》三十六卷。

張嶠的詩詞多圍繞四時節氣，借景抒情，思鄉懷古等題材，亦有詠物、贈別

⁵⁷⁷ 《宋史》，卷 444，列傳 203，〈米芾〉，頁 13123-13124。

⁵⁷⁸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5，〈水調歌頭〉，頁 9，總頁 1116-120。

⁵⁷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7，〈光化軍〉，頁 2804 載：「石淙，字會川，光化人。博通古今，其詩淡泊，時出以偉麗。仕既不遭，晚遂自晦於田里，官至朝散郎，有《滄浪集》十卷。……陳去非少學詩於會川，巨山復問詩於去非。」

⁵⁸⁰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4，頁 12，總頁 1481-344。

等類型，其常以日常生活及所見景物為描寫對象，時有因觸景傷情、感懷故舊往事之作，如「故園墳樹想青蔥，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僮父子，紙錢猶掛樹頭風。」⁵⁸¹「陰陰綠柳子規啼，風送餘聲夜轉悲，山月籠明蘭氣馥，恍然如在鹿門時。」⁵⁸²可見其文詞清和婉約、情景交融。

（五）王之望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歷官亦頗有政績。之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湯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⁵⁸³所著《漢濱集》十六卷，存詞二十首。其詩文皆疏暢明達，具有北宋遺風，如：「作客他鄉久，宜人此界稀。身閒長挾策，地僻慣披衣。妻有齏鹽樂，兒因筍蕨肥。出門何所適，終日掩荆扉。」⁵⁸⁴大部分的詞作多為酬唱應答，如〈坐中贈朱尉慶長〉：「君尉襄陽日，吾方首善游，素交微半面，青顧乃雙眸。有喜一尊共，相期三徑幽，溪山許分老，為我繕菟裘。」⁵⁸⁵雖詞藻清麗、風格閑雅，多數詩作卻缺少對現實生活內容的寫照。其諸筇子亦多以考見時事，與正史相參照，頗具有參考價值。

二、藝術

中國書畫藝術的發展，由於在宋代商業手工業的迅速發展與技術的提升，使產品種類日益豐富、產量也因而增加，社會繁榮富裕，為書畫藝術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無論民間、宮廷、士大夫書畫皆各成體系，彼此亦相互影響、吸收、融合，而構成豐富多彩的面貌。在藝術領域方面，襄陽人米芾及其長子米友仁的書畫堪稱一絕。

⁵⁸¹ (宋)張嶠，《紫微集》，卷 10，〈建炎庚戌潰兵犯襄漢寒食阻趨光化拜掃迫慕痛哭因成二詩〉，頁 4，總頁 1131-425。

⁵⁸² (宋)張嶠，《紫微集》，卷 9，〈山中月夜聞杜鵑憶鹿門舊遊〉，頁 3，總頁 1131-413。

⁵⁸³ 《宋史》，卷 372，列傳 131，〈王之望〉，頁 11537、11539。

⁵⁸⁴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 2，〈龍華山寺寓居十首〉之四，頁 1，總頁 1139-677。

⁵⁸⁵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 2，〈坐中贈朱尉慶長〉，頁 3，總頁 1139-678。

（一）米氏父子

米芾在詩詞文學方面，已介紹過其生平、著作、性格等，故此略。藝術的書法方面，其諸體皆精，行、草書取前人之所長，用筆豪邁奔放，為世人所稱道。其學書早期師法歐陽詢、柳公權，字體緊結，筆劃挺勁。中年摹魏晉書法，行、草得力於王羲之、王獻之，用筆渾厚爽勁。⁵⁸⁶米芾生平對於書法最為用功勤力，臨帖學書手不釋筆，自言：「人謂我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⁵⁸⁷可見米芾書法是汲取各家之長，終自成於一格。米友仁評其書法「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同為四大家的蘇軾言：「海岳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樯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愧而已。」⁵⁸⁸黃庭堅則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書家筆勢亦窮於此。」⁵⁸⁹米芾傳世之作頗多，最著名為行書中的〈蜀素帖〉及〈苕溪詩〉。

繪畫方面，米芾善繪花卉、人物，然而尤精水墨山水。其山水源出董源，天真怪奇，時出新意。其自言：「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烟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⁵⁹⁰每望山明水秀，目見心受，而日漸摹仿之，遂得天然之意趣。信筆而作，因此畫山水不求功細，多用水墨點染，作成煙雲掩映狀，表現出一派煙雲瀰漫、氣韻蒼茫的自然景趣。因突破了勾勒加皴的傳統技法，開創獨特風格，故世稱「米家山」或「米氏雲山」。

米芾長子米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⁵⁹¹米友仁在山水畫方面發展了米芾之技法，成一家法。傳世畫作

⁵⁸⁶ 魯文忠、魯偉著，《極品的故事：中國書畫印藝術史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8月1版），頁193。

⁵⁸⁷ （宋）米芾，《海嶽名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頁1，總頁813-63。

⁵⁸⁸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9下，引〈雪堂書評〉，頁14，總頁817-363。

⁵⁸⁹ （宋）黃庭堅，《山谷外集詩注》，卷29，〈跋米元章書〉，頁19。

⁵⁹⁰ （宋）米芾，《畫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頁18，總頁813-11。

⁵⁹¹ 《宋史》，卷444，列傳203，〈米芾〉，頁13124。

有〈瀟湘奇觀圖〉、〈雲山小幅〉等。「米氏雲山」可說為米芾父子對中國傳統文人畫、山水畫的一種變革與發展。

（二）張友正

張友正，字祖義，為宰輔張士遜幼子。據《卻掃編》云：「自少學書，常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自名。神宗常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⁵⁹²喜愛藝術的張友正，雖其父位極人臣，然而張友正卻無意於仕，一心專研書法，因此其草書甚得神宗喜愛評為本朝第一。若說米芾書法是自得於天資稟賦，那麼張友正則在於勤學，自少至老未嘗停筆。由於對於書法的熱愛，曾盡賣其別業得價三百萬用以買紙。其原有房舍在甜水巷，一日棄去，搬到水櫃街租了間小屋，與染工為鄰，問其緣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友正打算向染工借欲染黑的白絹用來習字，約一疋布酬賞兩百金，如此每日寫數疋布。若有人以紙餽贈，友正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可見努力習字至此。除了埋頭苦練，張友正仍不忘與名家切磋。元祐末年（1094），知雍丘縣蘇軾自州召還，張友正便邀蘇軾來家中用飯，蘇軾一進門，見有筆、墨、紙三百張列於長案上，而酒食菜餚置於案旁，不禁大笑而就坐。兩人遂把酒揮毫，兩位侍童於旁磨墨幾不能供。時至傍晚，酒罷，紙亦盡，乃相互交換墨跡而去，而知平日之書仍莫及也。⁵⁹³

張友正尤工于草書，其自云得漢人心法。董道評其草書曰：

其用筆過為鋒長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故自不能用。今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知古人用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⁵⁹⁴

⁵⁹² (宋)徐度，《卻掃編》，卷中，〈張友正〉，頁4，總頁863-768。

⁵⁹³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下，頁7，總頁863-676。

⁵⁹⁴ (宋)董道，《廣川書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由於友正用筆，筆鋒長而氣力弱，是故運筆飄搖，筆勢溫婉曲折，而後其書法別具一格，自有成就，雖書法之風格氣韻不及古人，然而端正自然，瀟灑曠達有其過人之處。然而今人不知古人用筆運氣之法，或妄加詆毀，是不知漢代書法，而友正用筆，實蓋有所本。由於張友正習於閱讀古書，故其筆蹟高簡，久之詞語皆如晉宋間人，家書亦是僅數十字。⁵⁹⁵其既未嘗仕，個性耿介又不多與人來往，因此其書知之者甚少，但其書法並不落於米元章之後。⁵⁹⁶

三、工藝

宋代生產與經濟的發展繁榮，造就出遠較前代豐富的物質條件，而物質條件的提升亦帶動了文化與產業技術的提升。原本主要以實用為主的工藝品，在經濟與技術提升下，不僅製造數量有所增加，品質方面也大為提升。在社會文化的持續進步下，工藝產品也由日常用品，日漸走向精緻化的藝術品。以下即介紹襄陽地區著名工藝與生產技術。

（一）漆器

襄陽地區山林中漆樹茂密，故能生產上等好漆。戰國時期，楚國即產有漆器，荊楚地區遂為漆器製造的重要產地。唐中宗時，張廷珪曾指出：「山南諸州，椒漆為利」。⁵⁹⁷這些上等好漆，經過精心加工後，製成精美的漆器，時人稱：「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⁵⁹⁸可見襄州漆器製作工藝水準技術居全國首位，被稱為「襄樣」，視作典範。據《新唐書·地理志》所載，當時襄州的貢品主要為「漆器，庫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碎

年初版)，卷 7，〈張友正艸字〉，頁 18，總頁 813-416。

⁵⁹⁵ (宋)徐度，《卻掃編》，卷中，頁 4，總頁 863-768。

⁵⁹⁶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頁 8，總頁 863-676。

⁵⁹⁷ 《全唐文》，卷 269，張廷珪〈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頁 4，頁 3456-2。

⁵⁹⁸ (唐)李肇，《唐國史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中，頁 7，總頁 1035-432。

石文」。⁵⁹⁹唐代詩人皮日休〈誚虛器〉詩曰：「襄陽作髹器，中有庫路真；持以遺北虜，給云生有神」。⁶⁰⁰可見當時襄陽製造漆器中有名為庫露真者，「庫路真」可能為西北少數民族的方言稱呼。根據皮日休詩自注：「玲瓏空虛，故曰庫露」來看，庫露真或許為一種鏤空漆器，由於襄州的漆器傳至邊區，深受少數民族的喜愛，甚至被神化了。給云為哄騙之意，意思是襄陽漆器，可以哄其有神，足見其在少數民族中影響之大。

及至宋代，《宋史·地理志》記載：「襄陽府，貢麝香、白穀、漆器。」⁶⁰¹說明在襄州生產的漆器仍是上貢朝廷的貢品之一，而且直到南宋初年才正式停止生產進貢用的漆器。關於襄陽漆器的產銷，由出土文物可供考證。1965年11月，在武漢市漢陽十里鋪發掘的北宋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漆器十九件，其中有五件漆器書寫有朱文，與襄陽直接相關連者為兩件漆鉢，分別在器外壁朱書「己丑襄州邢家造真上（牢）」十字、「戊子襄州胎馬巷西謝家上（牢）□□」十四字。據文物工作者推算，此墓約在北宋大觀以後，這批漆器出土後依舊光亮。⁶⁰²再由漆器上的朱文來看，所記載的邢家、謝家都應為當時當地較有名的漆器家庭作坊，而其所製造的漆器產品將作坊的姓氏，製作的時間，甚至作坊的地址等，都書寫在產品上，以示對產品質量的保證，這也表明當時襄州漆器具有較高的生產技術。而襄州漆器可遠銷到數百公里外的漢陽十里鋪一帶，表示其生產規模及產品數量都是較為可觀的。

雖說襄陽曾有如此高的漆器工藝，然而從北宋中期開始，漆器的製作中心漸以南移，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以越州，德音……罷……襄陽漆器」⁶⁰³可知襄陽漆器上貢至南宋建炎三年乃罷，亦表明了製作技術與產量皆不如以往。

⁵⁹⁹ 《新唐書》，卷 40，志 30，〈地理四·山南道〉，頁 1030。

⁶⁰⁰ (唐)皮日休，《文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8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0，〈誚虛器〉，頁 11，總頁 1083-224。

⁶⁰¹ 《宋史》，卷 85，志 38，〈地理一·京西路〉，頁 2113。

⁶⁰²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武漢市十里鋪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 年第 5 期，頁 56-59。

⁶⁰³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29，「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條，頁 569。

（二）墨

由於宋代造紙、印刷業的發達，也帶動相關的墨、筆、硯等行業生產技術的進步。以製墨業而言，因原料取自松木，因而其產業分布主要取決於松煙原料的產地，北宋時期北方尚多松林，因此保持著製墨業的優勢。受到大量印刷書籍的影響，墨的需求量因此大增，製墨技術也隨之提升，不僅出現專門記載製墨方法的專著，如李孝美《墨譜法式》、晁季一《墨經》等，且出現許多製墨名家，其產品精美，享譽四方。⁶⁰⁴襄陽地區亦出產墨，唐州桐柏山有墨工張浩，「製作精緻，妙法甚奇」，其舅吳順圖按其法每年製造百斤，「遂壓京都之作矣」，成為一時名產。⁶⁰⁵製墨名家皆是從一般墨工之中脫穎而出，代表著製墨水準極高，張浩手藝精湛，甚至超越人文薈萃的汴京。在宋代社會，製墨不僅只是出於實用價值，佳墨是具有藝術收藏價值。宋代士人喜愛藏墨、品墨，甚至有士大夫喜自行造墨。蘇軾有言：「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閒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白為尚，墨以黑為勝。」⁶⁰⁶蘇軾本身即喜蓄墨，有佳墨七十丸，⁶⁰⁷每遇佳日，即自賞玩。而《墨莊漫錄》作者張邦基亦有收藏好墨之癖好，曾收古今名墨數百種，可惜南渡時被竊，殊可惜也。

（三）硯

常言文房四事，調筆、硯、紙、墨，文房所必資也。然而筆最不耐久，紙次之，墨又次之，惟硯為最耐久，因此歷來受到文人雅士的喜愛，故自米芾、李之彥等輩，率譜而藏之，以為藝林佳話。但製硯受到資源的限制，產地不多，加上硯石極其耐用，不易耗損，因此製硯業的規模及從業人數皆不如製筆、墨及紙等行業。關於宋代硯石產地，以米芾《硯史》對硯的產地記載較具系統，從玉硯至

⁶⁰⁴ 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頁495。

⁶⁰⁵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6，頁10，總頁864-57。

⁶⁰⁶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10，頁4-5。

⁶⁰⁷ (元)陸友，《墨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下，〈宋〉，頁13，總頁863-85。

蔡州白硯共二十六種，所記皆為親見親用之硯，非此皆不著錄。襄陽地區有「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巖石」，據米芾所載：

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著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而不熱生泡。生泡者，膠也，古墨無泡，膠力盡也。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剛生熱，故膠生泡也。此石既不熱，良久，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也。歲久不乏，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亦有澹青、白色，如月如星而無暈。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⁶⁰⁸

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巖所產硯石，在日光下檢視猶如玉石晶瑩透亮，而墨稍磨之，墨色已下，然硯石不熱生泡，磨出之墨猶如漆和油般有光澤，發墨色濃艷而不易滲紙，歲久亦不褪色。硯石為紫色，亦有淡青、白色者，而上好唐州硯石出產量極少，近日始見十餘枚而已。

世間皆以為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今廣東肇慶）之石，然米芾獨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為冠，認為方城硯發墨快，僅十磨，端石需三十磨方相及。⁶⁰⁹張邦基實際考察唐州方城硯，有紫、青、白三種石也，部分石材除製硯外，亦製成鼎、斛、盂之類器皿。米芾所言者，稱之為「太陽坑石」，產於山頂，石色如同端溪硯石，質料堅重縝密，作為硯石，雖墨不數磨則盈，但極易耗損筆墨，士人稱之「筆墨劖子」，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衡。張邦基認為米芾喜好唐州硯是因其性子急，唐州硯不數磨即發墨快且墨色濃艷，故米芾用來甚為合意。⁶¹⁰天下皆以端州硯石為第一，尤以紫端為上品，產量大，售價高。由於「唐州紫石色澤可愛，膩不發墨，人以為端石」，⁶¹¹若有絕佳者，更是與端石亂真，肉眼難以辨別。因此

⁶⁰⁸ (宋)米芾，《硯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頁 1-2，總頁 843-66、67。

⁶⁰⁹ (宋)米芾，《硯史》，頁 3，總頁 843-67。

⁶¹⁰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 7，頁 16-17，總頁 864-71、72。

⁶¹¹ (宋)高似孫，《硯箋》，卷 3，〈唐石硯〉，頁 8-9，總頁 843-102。

商人常喜以端州硯石之名號販售唐州硯石。⁶¹²若暫且不論硯石之排名，畢竟人常因好惡或所見而有不同評價，但由前述可知唐州硯之質量絕不在端州之下，而石硯不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美術藝品。

（四）蠟燭

蠟燭是中國古代主要的照明用具，延長了人們在日落天黑之後，工作及生活時間的重要物品。據近代學者章太炎、俞樾等人考證，人們目前仍在使用的固態細柱狀蠟燭，至遲出現在東漢末期，其雛形是以蜂蠟製成的蜜燭。蠟燭在早期尚屬豪奢之物，並非人人皆能使用，多半作為宮廷或富族照明、喜慶或祭祀典禮之用。直到唐代，蠟燭才得以普及，但一般寒士們仍然使用著價廉的膏油燈。⁶¹³所謂的油燈主要在豆型燈具或圓盤裡倒了膏油，浸一根燈心草，即可點著使用。然而油燈火光微弱，若非使用胡麻油，以菜籽油、桐油等油料，燃時易產生臭味或濃煙污物，極易薰染書籍衣物。⁶¹⁴至宋代「富人燒燭，寒士點燈」的觀念仍舊留存，例如寇準知鄧州時，「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而杜衍「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⁶¹⁵歐陽修借燃燭與點燈一事，對比名臣為官之奢儉大不相同，可見宋人對於使用蠟燭相較於油燈而言，仍是豪奢的代表。朝廷主要使用蠟燭作為照明之用，因而河東、陝西、福建路皆有上貢。襄陽地區亦產蠟燭，以鄧州花蠟燭最為著名，據《元豐九域志》記載，鄧州的花蠟燭曾上貢百條。⁶¹⁶歐陽修曾言：「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⁶¹⁷想見製作精美，技法獨特，連工匠人才集聚之汴京城皆無人能造，可惜史書不載，僅知相傳技法與寇準有關，無法得知製造方法及其獨特之處。

⁶¹² (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 29，頁 7-8，總頁 1480-566、567。

⁶¹³ 唐玄之、劉興林，〈中國古代燈、燭原始〉，《中國科技史料》，1998 年，19 卷 2 期，頁 59。

⁶¹⁴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頁 32。

⁶¹⁵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 126，頁 21，總頁 985 上。

⁶¹⁶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1，〈京西路〉，頁 18，總頁 471-21。

⁶¹⁷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 126，頁 21，總頁 985 上。

綜上所述，文學藝術作為一種精神創造活動和社會意識型態，強烈傳達著個人意念，亦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而詩文創作、書法繪畫以及工藝技術的流傳，除了不斷提昇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外，亦提供了歷史研究的素材，更是將不同時代與地域的審美觀念流傳下來，這些皆是人類文明發展中寶貴的文化資產。

第三節 宗教與民間信仰

一、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長期的發展，至隋唐時期宗派林立，中唐以後禪宗大為盛行。入宋後，禪宗幾乎壟斷了佛壇，尤以慧能所創南宗，主張頓悟成佛，佛在心中不假外求，只須靜心參禪，即可明心見性，見性即可成佛。如此修行法，自然吸引大量信眾與弟子追隨，故其南宗一派，尤是大盛，隨後發展演變為禪門五家之格局。北宋元祐二年（1078）哲宗下詔全國革律為禪，⁶¹⁸更是助長禪宗在中國本土發展的趨勢。

襄陽地區極早接受佛教的洗禮，自東晉時期的道安於此講經弘法十五年，使襄陽成為著名佛教中心，而隨著道安被苻堅擄掠北去至長安，其佛教中心的地位也被江陵所取代。南北朝時期，襄陽地區仍聚集為數不少的高僧前來弘法，然寓居時間較為短暫，相形之下影響力也不如道安來的廣大，如：劉宋時期慧遠弟子道溫、⁶¹⁹南齊的智秀法師等。⁶²⁰

隋唐時，佛教掀起宗派法嗣的熱潮，三論宗、天台、律宗、禪宗等宗派皆有

⁶¹⁸ (清)張仲炘，《湖北金石志》，金石志十，〈靈峰禪寺記〉（宣和六年），頁8，總頁11982。

⁶¹⁹ (梁)釋慧皎，《高僧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冊50，台北：大藏經刊行會，1983年1版），卷7，〈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頁372-2：「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

⁶²⁰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冊50，台北：大藏經刊行會，1983年1版），卷6，〈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頁475-1：「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

僧人於襄陽境內弘法，而如前所述，禪宗的興起，無論是北宗神秀或南宗慧能，皆在此形成影響，尤以南禪興起之後，據《景德傳燈錄》所載，慧能弟子懷讓、行思以下歷代法嗣，寓居於襄陽弘法者達二十餘人之多。⁶²¹及至宋代，襄陽境內佛教仍不脫禪宗五家七宗之影響，即滄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宗與黃龍、楊岐兩派。由於宋代佛教受禪法「頓悟成佛」影響頗深，對佛教古籍經典捨本逐末、較不重義學律法之結果，造成有游方四海的僧眾，而較缺乏講經弘法的一代大師。是故，以佛教僧眾供佛和聚居修行的場所——寺院之分布與規模，來解讀宋代佛教在襄陽地區的發展概況。

先就寺院數量上而言，由表 4-2 的統計數量來看，雖統計表內未全蒐羅詳盡，然宋元明等方志可考者皆已錄。僅襄州境內之襄陽、南漳、穀城、宜城縣內史籍有載之古剎名寺，至少有二十餘所，且泰半為自兩晉南北朝時期即已興建，並留存至宋。郢州、隨州亦有八至十餘所，即便較偏僻的房州與以道教聞名的均州武當山境內也有寺院，況多為前朝早已興建，可見佛教於襄陽境內分布極廣，主要以襄州為中心，成輻射狀向四周之州縣擴散，而影響久遠傳播之盛，始自兩晉即被受佛法。

表 4-2 襄陽地區寺院表

州縣	寺名	沿革位置	資料出處
襄州南漳	靈泉寺	南漳縣中盧鎮景山鄉，寺中有靈泉。	《輿地紀勝》，頁 2655
南漳	海會寺	在南漳縣西二十五里，原名雙泉寺，有蓮花泉、跳珠泉	《輿地紀勝》，頁 2658
襄陽縣	萬山寺	在襄陽縣，晉太興中（疑為有誤，為東晉元帝大興年間）立寺	《輿地紀勝》，頁 2658
襄陽縣	龍興寺	襄陽縣西北三里，有金銅像，釋道安所立。	《輿地紀勝》，頁 2659
襄陽縣	紫金寺	1.在襄陽縣東南十三里谷隱	《輿地紀勝》，頁 2660-2661

⁶²¹ 張偉然，《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頁 76。

	(谷隱寺)	山，舊名興國院，習鑿齒隱遁之所。元微之詩云：「貪過谷隱寺，留讀峴山碑。」 2. 在襄陽縣南一十里，東晉寧康間（373-375）建，唐元稹有詩：「貪過谷隱寺，留讀峴山碑。」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6
襄陽縣	雲封寺	在襄陽縣東三里，即龐統宅也。	《輿地紀勝》，頁 2661
襄陽縣	月嶺寺	在襄陽縣	《輿地紀勝》，頁 2661
襄陽縣	延慶寺	在襄陽縣，梁韋叡所立。 又，(另有)無量寺釋道安所建。	《輿地紀勝》，頁 2661
襄陽縣	檀溪寺	1.今在襄陽縣西五里，在檀溪側。晉釋道安之寺，有金像六焉，皆道安所造。 2.縣西七里，東晉寧康初（373）建。	《輿地紀勝》，頁 2661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6
襄陽縣	臥佛寺	在襄陽縣東南六里，梁太清二年（548）立，以山坐東南，西因坐臥佛以鎮之	《輿地紀勝》，頁 2661
襄陽縣	隆慶寺	在城內，原名圓通寺，唐開元初建，宋代名不詳。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6
襄陽縣	華嚴寺	俱在樊城，宋景定初（1260-1264）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6
襄陽縣	仁王寺	俱在樊城，宋景定初（1260-1264）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6
襄陽縣	廣德寺	在隆中書院旁，唐時建書院祀諸葛亮，以寺僧主之。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6
襄陽縣	鹿門寺	在襄陽縣東南五十里，舊名萬壽寺，西晉時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6
南漳縣	普濟寺	在南漳縣東一里許，宋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南漳縣	靈泉寺	在南漳縣東南五十里，即靜林寺，晉隆安初（397-401）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穀城縣	崇寧寺	在穀城縣東南半里，宋崇寧間（1102-1106）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穀城縣	不二寺	在穀城縣東南七十里，梁太清初（547-549）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穀城縣	金牛寺	在穀城縣東南八十里，宋宣和間（1119-1125）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穀城縣	大承恩寺	在穀城縣東南□安山，舊名廣德，隋大業間（605-617）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隨州	長慶寺	龍安山，有綠野堂。	《輿地紀勝》，頁 2703
	太平興國院	在隨城山，有雙檜亭。	《輿地紀勝》，頁 2704
	金燈院	在城東，慶曆中，尹洙曾謫居此寺。	《輿地紀勝》，頁 2704
	崇寧保壽禪院	隨州西南大洪山上，原為奇峰寺，後改為靈峰寺。山崛起一方巉然雲間，四面陡險，山絕頂峰，巒崖石中有大湖，寺人經行數常見雲氣在下。靖康避寇之人立寨柵自保，賊竟不能破，以斗絕不可躋攀也。	《輿地紀勝》，頁 2705
	雙泉院	隨州雙泉院，有東雙泉；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曰西雙泉。	《輿地紀勝》，頁 2705
應山縣	法興寺	在應山縣，有四賢堂。	《輿地紀勝》，頁 2706
	善光寺	在州東南八十里仙城山上，昔有僧立庵，時祥光示現，山又名善光山。	《輿地紀勝》，頁 2706 2607
	智門寺	龍居山上，隋文帝微時所居宅基。	《輿地紀勝》，頁 2707
應山縣	東惠濟院	應山縣東北一百里跳石山上，石上有巨人跡。	《輿地紀勝》，頁 2708
棗陽縣	報恩寺	在棗陽縣東北一里許，宋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棗陽縣	興國寺	在棗陽縣東南一十五里，宋延祐（有誤）初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棗陽縣	椒山寺	在棗陽縣東北七十里宋淳祐初（1241-1252）建。	《湖廣圖經志書》頁 827
郢州	龍興寺	州城內，西北有蘭臺、南臺	《輿地紀勝》，頁 2730 《方輿勝覽》，頁 820
京山縣	聖水院	在京山縣西二十里，山半有泉，湫激飛瀉，其流遶寺，溉田數百頃，寺多名公詩。	《輿地紀勝》，頁 2732
	石城寺	不詳。	《輿地紀勝》，頁 2734
	龍回寺	在城南八十里，舊傳光武尋嚴光至此而返，故曰龍回。	《輿地紀勝》，頁 2735
京山縣	多寶寺	鄭文寶在京山日有寒食經秀上人詩	《輿地紀勝》，頁 2735

	興陽寺	不詳。	《輿地紀勝》，頁 2736
	彌勒院	在城東門外，有白乳高僧塔。	《輿地紀勝》，頁 2739
京山縣	趙橫寺	1.在京山縣南，靖康間，霍明據郢，遣其徒沒角牛領兵寇復州，過趙橫寺欲縱火，主僧求見，盛怒將斬之，以其貌古而言有理，遂加敬焉，汨入寺，寂然無人，但見先師慈護菩薩塑像，劇而焚香，歛兵亟去。 2.趙橫寺在縣南四十里，宋建。	《輿地紀勝》，頁 2740 《湖廣通志》，卷 78，頁 32
均州	乾明寺	本唐濮王泰墓，妃閭氏捨宮地建延福寺。宋興國中，降旨以乾明寺為額，有大唐經藏碑銘。	《輿地紀勝》，頁 2760 《方輿勝覽》，頁 821
	太平興國寺	唐廣德二年（764），代宗調惠忠師曰：「朕有一兒，乞保延昌。」乃以太平延昌為寺額，御筆書字賜之，今在本寺。太平興國二年（977），改賜今額。	《輿地紀勝》，頁 2760
房州	龍光寺	在州治南，即廬陵王故宮。	《輿地紀勝》，頁 2781、2782
房陵縣	昌聖寺	在房陵縣北二百哩，晉釋道安所建	《輿地紀勝》，頁 2784
鄧州	兩菖蒲寺	後魏典畧云：「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潭水而見菖蒲，乃歌曰雨（兩）菖蒲新野樂，遂建雨（兩）菖蒲寺以美之。」	《太平寰宇記》，卷 142，頁 10 《太平御覽》，卷 168，頁 10

接著，由州縣中的著名寺院逐一分析，襄陽地區分布許多著名的寺院，先就曾為佛教中心的襄陽府而言，僅襄陽縣內即有四座自東晉時期所建立的寺廟：檀溪寺、無量寺、龍興寺與谷隱寺。

檀溪寺一說在今「縣西五里」，⁶²²一說為「縣七里，東晉寧康初建」，⁶²³因寺位於檀溪側，故以名之。檀溪寺的建立可說為道安一手草創，時梁州刺史朱序出鎮襄陽，請人在江陵的道安復還襄陽，「道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

⁶²²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襄陽府〉，頁 2661。

⁶²³ (明)薛剛、吳廷舉，《湖廣圖經志書》，卷 8，〈襄陽府〉，頁 826。

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和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可見規模之宏大。而寺內「有金像六焉」，其一為道安發起，以涼州刺史楊弘忠所送萬斤銅所造，「眾共抽捨，助成佛像」，像有一丈六高，光相明亮顯著。餘五座為苻堅所贈，為「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至講經，必羅列佈置，四方往至者，莫不肅然禮敬，⁶²⁴而此六金佛像至宋仍存。檀溪寺至道安北去長安後，其後仍有道溫、智秀等名僧至此講經暫居或於此出家禪行，為當地重要佛教據點。除檀溪寺外，襄陽縣內的無量寺與縣西北三里遠的龍興寺內金銅像，甚至遠至房州房陵縣北之昌聖寺，皆為釋道安所立。⁶²⁵

另一名寺谷隱寺曾名為「興國院」、「紫金寺」，位於「襄陽縣東南十三里」之谷隱山，為東晉孝武帝寧康間（373-375）建，據載為「習鑿齒隱遁之所」，宋時成為遊人墨客憑高望遠、尋幽訪勝、拜佛參禪的著名景點。而諸名公遊歷造訪，留有詩詞題詠，如宋人彭汝礪〈谷隱寺〉詩云：

樓臺寄山巔，屹屹與雲齊。登臨覽昭曠，感慨發悲悽。

西顧隆中廬，北睨漢陰畦。願言脫樊籠，超然此幽棲。⁶²⁶

其五言詩描述登山至谷隱寺居高遠望，山林幽靜悠然自得，希冀得以超脫俗世之牢籠，而幾乎來此地遊覽之人，皆因谷隱山「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而有著「但恨絀塵羈，無繇數追尋」⁶²⁷的相同感慨。有趣的是，美景佳勝之地，必聚集商賈販夫於此招徠遊客，行買賣交易之事，故有詩云：「山光晚相照，空翠濃欲滴。行當就墟市，幽棲買泉石」⁶²⁸之語。

⁶²⁴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7，〈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頁351-3~354-1。

⁶²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82，〈襄陽府〉，頁2659、2661、2684。

⁶²⁶ (宋)彭汝礪，《鄱陽集》，卷2，〈谷隱寺〉，頁22，總頁1101-196。

⁶²⁷ (宋)曾鞏，《元豐類藁》（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4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臺三版），卷5，〈谷隱寺〉，頁11，總頁47下。

⁶²⁸ (宋)李廌，《濟南集》，卷2，〈谷隱寺〉，頁21-22，總頁1115-725。

再看隨州西南大洪山上，有「崇寧保壽禪院」。唐文宗時賜所居額為「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為「奇峰寺」。北宋元豐元年（1078），又改為「靈峰寺」。元祐二年（1087）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峰寺革律為禪。⁶²⁹至紹聖元年（1094），詔改隨州大洪山律寺為禪院，因大洪山寺蕪廢已久，並請移洛陽嵩山少林寺長老報恩，是為第一代住持，乃為曹洞宗之法嗣。⁶³⁰禪院的興起建立，據《雲麓漫鈔》載：

隨州大洪山，本名大湖，介於隨、郢之間。其山高峻，上有三峰，中有積水，實為龍淵，云昔有二龍鬪，穿崖而出，水遂涸，落石尚存山下，今日落湖。唐有僧自五臺來，遇異人云：「遇湖即止」。僧至，問地名，遂止。適逢大旱，鄉人皆屠牛祈雨，僧為祈禱，成豐歲，遂入山，斷足祭龍以謝。鄉人張素敬之，父子俱入山，與之俱逝。節帥以聞，僧賜號靈濟菩薩，二張封將軍。土人相與即水落處建伽藍，本朝尤盛。⁶³¹

其所謂唐僧人即為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後人稱之為「慈忍靈濟大師」⁶³²。因曾「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故謂自五臺山來。善信至隨州大洪山正值天旱，故為民祈雨，而後斷足捨身祭龍，鄉民為其興建寺院，而後屢次受封敕額而為崇寧保壽禪院。保壽禪院自北宋仁宗以前即為當地名剎，時歐陽曄任隨州推官，因遭逢天災，便使寺院將餘糧移作賑濟之用。史載：

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奸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

⁶²⁹ (清)張仲忻，《湖北金石志》，金石志十，〈靈峰禪寺記〉（宣和六年），頁8，總頁11982。

⁶³⁰ (清)張仲忻，《湖北金石志》，金石志十，〈恩禪師塔銘〉（政和三年），頁20，總頁11988。

⁶³¹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8月1版），卷12，〈四正旁通圖〉，頁220。

⁶³² (清)張仲忻，《湖北金石志》，金石志十，〈靈峰禪寺記〉（宣和六年），頁8，總頁11982。

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以盡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

飢民賴以全活。⁶³³

此事暴露出仍稱奇峰寺的保壽禪院，僧侶眾多，積穀萬石，可見寺院經濟狀況良好，規模宏大，才得以供養數百口僧眾並有餘糧達六、七萬石，雖不知田產之數目，但可想見其耕種面積應不小才能有如此收穫量，並有營利販售之行為，甚至或為不當獲利而受到官方注意。

襄陽地區佛教興盛，即便以道教名山聞名於世的均州武當山，仍有著名佛寺於此。自唐代以前，武當山事實上為多樣宗教的修習場所，無論佛教、道教及修練習靜之道者、隱士皆至此山。宋人李廌〈武當山賦並序〉有言：

彼佛藏之文，暨道家之書。辨須彌與鐵圍，矜蓬萊與方壺。或以為西天之所治，或以為列仙之所居。既莫究其信誕，又安議其有無。⁶³⁴

可見佛、道兩教皆視武當山為淨土仙山，卻也提不出有利證據，於是佛道兩家相繼爭取統治者的支持。⁶³⁵南陽慧忠禪師曾言：「若欲得道，衡岳武當」，即視武當山為得道之所，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正月，慧忠奉詔赴京講經，而「天子欽之待以師禮」，稱其為「國師」。慧忠便奏請，「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並於鄧州淅川縣「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⁶³⁶至廣德二年（764），太一延昌寺因「代宗謂慧忠師曰：『朕有一兒，乞保延昌。』乃以太平延昌為寺額，御筆書字賜之」，⁶³⁷宋時仍存於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改賜額為「太平興

⁶³³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 27，〈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頁，總頁 217 上。

⁶³⁴ (宋)李廌，《濟南集》，卷 5，〈武當山賦（並序）〉，頁 10，總頁 1115-772。

⁶³⁵ 祝建華，〈唐宋時期武當山佛道之爭〉，《武當縱橫》，總 127 期，2004 年 12 月，頁 59。

⁶³⁶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 9，〈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頁 763-1。

⁶³⁷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均州〉，頁 2760。

國寺」。真宗後，武當山因附著「真武升天」傳說，使道教的勢力日漸抬頭，並大興宮觀，南宋後期佛教勢力在此山遂不敵焉。

二、道教

與佛教相比，道教在宋代的發展主要有兩個特點，一為雖其為本土宗教，然傳播力卻不若佛教般強，信眾亦不如佛教多；其次道教的興盛往往依仗朝廷的權勢。例如宋真宗、徽宗的兩次大力崇道運動，曾使道教顯赫一時，但不久旋即歸於低潮。⁶³⁸而兩宋時期襄陽地區道教勢力的發展，亦不若佛教發達，除了同上述兩點因素外，或許與本地自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即以此為傳播中心有關。

襄陽地區最主要且著名的道教勝地為均州的武當山。武當山位於湖北西北部，為大巴山脈東段分支。起自湖北、陝西兩省邊境，止於襄樊市南，隔漢水和大洪山遙對。主峰武當山，又名「峯山」、「太和山」，⁶³⁹海拔 1,612 米。⁶⁴⁰早在南北朝以前，由於武當山因位置僻靜，故被學道之人、道士、僧侶作為習靜修道之地。陶弘景之《玉匱》稱：太和山有神靈棲憑之者甚多，⁶⁴¹其所謂的神靈，其實即是指一些來此修行而得道之人，因此此地主要以修道者飛昇成仙而聞名，此後亦吸引欲學道者來此求訪仙人，如史載：陰真人，「字長生，聞馬先生有道，隱武當山，從其學，後在忠州仙都白日飛昇。」⁶⁴²；尹喜，人稱尹真人，棲於武當山石門石室；⁶⁴³南朝宋人郭仲產《南雍州記》載：「武當山廣圓三、四百里，山高壘峻若博山香爐，苕亭峻極，干霄出霧，學道者常數百，相繼不絕。若有於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輒為百獸所逐。」⁶⁴⁴可見南朝時期的武當山已是靄靄香煙，氤氳繚繞不絕，學道者繼踵而至，並且蒙著一層神祕的面紗。

⁶³⁸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頁 279。

⁶³⁹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 24，〈山南道·均州〉頁 11，總頁 468-411。

⁶⁴⁰ 周積明主編，《湖北文化史》，下冊，頁 1019。

⁶⁴¹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3，〈山南東道二·均州〉，頁 4，總頁 470-363。

⁶⁴²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5，〈均州〉，頁 2766。

⁶⁴³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43，〈山南東道二·均州〉，頁 4，總頁 470-363。

⁶⁴⁴ 同前註。

至宋代，武當山興起了真武傳說，據載：

真武，生於開皇元年（581）三月三日生。生而神靈，誓除妖孽，救護群品，捨家入道，居武當山四十二年，功成飛昇，遂鎮北方。及召而至，語以其故，妖氣遂息，因謂曰：「爾後每遇庚申、甲子及三七日，當下人間斷滅不祥。」今飛昇臺即飛昇之地，五龍觀即其隱處。⁶⁴⁵

這一傳說對於武當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所謂真武，原名為玄武，本屬星辰，即二十八星宿中之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戰國後，逐漸把二十八宿分為四組，據其形象分別以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四靈命名，⁶⁴⁶《楚辭補注》謂：「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⁶⁴⁷而據《後漢書》載：「玄武，水神之名」，⁶⁴⁸章懷太子則注「玄武」為「北方之神，龜蛇合體。」⁶⁴⁹可見玄武的形象為龜蛇合體，然又因其居北方，北方屬水，故一說為水神。

東漢末，道教創立後，常以四靈為守護神，又加以附會，此後納玄武入神仙體系，被奉為玄武大帝。而趙宋立國以「火帝為感生帝」，封火氣之精黑煞將軍為翊聖保德真君。《長編》載：「天造皇宋，運膺火德」。⁶⁵⁰因考慮火德之盛兆不利國家之長久，故據陰陽五行，水火既濟，相生相剋的道理，亦同時奉祀水神真武，⁶⁵¹然真武信仰未見興盛。真宗時大為崇道，為避宋宣祖趙元朗之諱，將玄武改名為真武，⁶⁵²真武之名遂定。天禧元年（1017）六月，真武將軍加號曰「真武

⁶⁴⁵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5，〈均州·仙釋〉，頁 2766；(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33，頁 7，總頁 471-821，所引《圖經》與此個別字稍異，其曰「開皇三年三月三日生」。

⁶⁴⁶ 唐代劍，〈論真武神在宋代的塑造與流傳〉，《中國文化研究》，2000 年第 3 期秋之卷，頁 43。

⁶⁴⁷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 3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卷 5，〈遠遊章句第五·離騷〉，頁 10。

⁶⁴⁸ 《後漢書》，卷 22，列傳 12，〈王梁〉，頁 774。

⁶⁴⁹ 同前註。

⁶⁵⁰ (宋)李燾，《長編》，卷 25，「太宗雍熙元年夏四月甲辰」條，頁 6。

⁶⁵¹ 祝建華，〈唐宋時期武當山佛道之爭〉，頁 2

⁶⁵²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8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74《宛委餘編十九》，頁 14，總頁 1281-751：「真武蓋北方玄武之神，以避宋宣祖諱，改名真武」。

靈應真君」。天禧二年（1018）將武當山最早的宮觀建築「五龍祠」升為五龍觀，並賜額曰：「五龍靈應之觀」。⁶⁵³五龍祠的建立為唐貞觀中（627-649），均州太守姚簡「禱雨是山之麓，五龍化見」，得甘霖，遂於其地建「五龍祠」。⁶⁵⁴因此，此地最早的宮觀建築與古代祀龍祈雨習俗有關。而受到真武昇天傳說之影響，原以祭祀五龍之五龍觀，也因其為真武求道隱居之處，再加上真武為北方之水神與祈雨之神龍皆掌管雨水，兩者有相似之處，真武與神龍信仰遂因此合流。

武當山成為玄武的神靈之宅、飛昇之所，使其宗教地位大為提升，而相關傳說與經典的刊刻，推動武當真武信仰在民間流布。如今存河南嵩山刻於北宋元符二年（1099）的《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即稱真武入武當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⁶⁵⁵此外，宋人張端義淳祐元年（1241）所撰《貴耳集》載：

均州武當山，真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響。均州未變之前，敵至。聖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之。」繼而真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有范用吉之變，敵犯武當，宮殿皆為一空，有一百單五歲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⁶⁵⁶

可見南宋理宗年間，因遭受范用吉之變亂影響，使先行降筆現身示警於民的真武名號更加響亮，不期到了後世，非但前人所謂的去意未能實現，相反地真武附著武當的觀念，越發深入人心。⁶⁵⁷兩宋文治極盛，武功卻乏善可陳，其邊患始終來自北方，真武作為北方之神，此時附會於武當山，⁶⁵⁸或許有其特殊背景因素，然而這對於民間百姓的信仰，與武當山升格為道教名山地位的提昇，其影響是不

⁶⁵³ (明)張恒，《(天順)重刊襄陽郡志》，卷4，頁30，總頁430

⁶⁵⁴ (明)張恒，《(天順)重刊襄陽郡志》，卷4，頁30，總頁430

⁶⁵⁵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1版），冊41，頁7。

⁶⁵⁶ (宋)張端義，《貴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下，頁25，總頁865-461。

⁶⁵⁷ 張偉然《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頁88。

⁶⁵⁸ 梅莉，〈武當歷史地位的變遷〉，《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6期，2004年11月，頁666。

可言喻的。

除了武當山五龍觀一處，均州陸續也興建不少宮觀，徽宗政和四年（1114）於武當山展旗峰敕建紫霄宮供奉真武。而後廢於靖康之難的五龍觀，先於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重修，均州知州王德顯，奏降敕牒，賜「靈應觀」為額，有碑存焉。⁶⁵⁹南宋寧宗時期，蘇皖三茅派道士孫元政重新修建「五龍靈應觀」，然又廢於金末之兵。⁶⁶⁰

三、民間信仰與其他

民間信仰與宗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宗教是一種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而民間信仰則是一種在特定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以鬼神信仰和崇拜為核心的民間文化現象。民間信仰甚至常與其他宗教信仰相混而難以區別。⁶⁶¹中國民間信仰的特點主要則是：一為信仰內容龐雜，帶有較多原始宗教的痕跡；二為著重明確的目的性與功利性；⁶⁶²三為有較強的地域性、社會性及傳統性。⁶⁶³以下將闡述襄陽地區民間信仰之發展與型態。

（一）自然崇拜

除了前述佛、道信仰外，最早衍生出的宗教信仰為自然崇拜。古代先民面對強大且人為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既無法解釋亦難以控制，故對於自然界之萬物與天象，產生敬畏之心，便將一切變幻莫測的自然現象，認為背後都有神靈支配著，於是，對於日月星辰、山川、岩石、風雨雷電及某種特定的動植物等，就可能被當作尊崇和膜拜的神靈。因此，先民百姓為祈求平安，由是依乎天理，按四

⁶⁵⁹ (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收入《道藏要籍選刊》，冊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5年2月1版），卷中，〈五龍靈應宮傳記〉，頁431。

⁶⁶⁰ 《(天順)重刊襄陽郡志》，卷4，頁30，總頁430

⁶⁶¹ 李雲華，〈民間信仰與宗教〉，《論壇》，第9期，2004年，頁50。

⁶⁶² 羅偉虹，〈中國的民間信仰探討〉，《社會科學》，第8期，1994年，頁55-56。

⁶⁶³ 姜彬，《吳越民間信仰民俗：吳越地區民間信仰與民間文藝關係的考察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1版），頁12。

時祭拜，經年累月積習而為歲時節日與習俗信仰。

襄陽地區亦如前面章節曾提及，其社日必祭祀土地之神等信仰。此外，與生活及作物息息相關的即為降雨，無論天旱無雨或天雨成潦，皆對於人民生計產生重大影響，是故祭天祈雨的儀式自古已然。求雨的祭典，稱為「雩祭」，漢代時已有「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⁶⁶⁴之儀式，而儀式需請「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皐，興土龍」。⁶⁶⁵可見求雨需遮陽、著黑衣並製土塑之龍以行祭典。

龍與祈雨的關係，據裘錫圭先生研究，早在商朝就有用泥土製作龍的形狀，利用它招來雨水的習俗。春秋時期，有關祀龍祈雨的材料更多。如：《左傳·桓公五年》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⁶⁶⁶ 龍指蒼龍七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當蒼龍七宿出現在天際，古人以為龍神現身，於是舉行儀式，祭祀龍神，祈求雨水。⁶⁶⁷對於龍神崇拜的信仰，襄陽地區除了前述均州武當山上的五龍祠，即是因祈雨，天現五龍，而因此立祠外，隨州大洪山原也傳為大湖神龍所居，慈忍靈濟大師至此，因天旱為民祈雨，而後捨身祭龍，因而於此立寺。當然崇龍信仰絕不僅只上述兩例，襄陽地區亦有許多人文與自然景觀，以龍為命名，並於此流傳著民間傳統習俗，如「伏龍山」，在襄陽縣西南三十里，又穀城縣亦有伏龍山，曾鞏知襄州日祈雨此山，祝文有云：「眾山雲起，此山無雲，終不降雨。眾山無雲，此山雲起，必降大雨。」⁶⁶⁸ 鄧州有「五龍堰」在城東，舊傳嘗云有五龍見於此，故亦立廟。⁶⁶⁹

（二）巫覡信仰

⁶⁶⁴ (漢)劉向，《說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9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18，〈辨物〉，頁 7，總頁 696-159。

⁶⁶⁵ 《後漢書》，志 5，〈禮儀中·請雨〉，頁 3117。

⁶⁶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文化，1982 年 4 月再版），冊 1，頁 106-107。

⁶⁶⁷ 宋晶，〈武當五龍宮龍神崇拜初探〉，《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8 年 2 月，頁 2。

⁶⁶⁸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襄陽府〉，頁 2659。

⁶⁶⁹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4，〈鄧州〉，頁 2735。

楚俗信巫鬼、重淫祀，位於秦楚文化區之間的襄陽地區亦有崇巫信鬼之風，並仍延續至宋。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因人們對自然界許多現象不能正確解釋和理解時，巫與巫術便應運而生，⁶⁷⁰若從「巫」之字義作解釋，《說文解字》曰：「能齋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⁶⁷¹可見女巫男覡最早的職能即是祭祀侍奉神明者，並為鬼神世界與人界之間的溝通者。而由大量的豐富的史料中可看到，巫師的職能演變為歌舞事神、占卜、祈福禳災、驅邪避鬼、預卜豐歉、除疫治病等，幾乎與百姓日常生活各層面息息相關。⁶⁷²對於平民百姓而言，宗教信仰在於能否改善與創造美好的生活，及達到內心平靜與解除煩憂，因此神學教義的知曉，不如卜算治病的靈驗與否來得重要。緣是之故，即便佛、道等宗教傳播再廣、力量再大，崇信巫鬼等習俗並未在宋代民間消失。如《玉壺清話》載：

張士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於鄉里。京西。舊有淫祀曰大戒，其設頗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門。公幼往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門下坐。」後果以師儒之重相仁廟，出處皆太平，壽八十六。⁶⁷³

由上述可知，均州人張士遜，少時曾至京西的神祀觀看，巫師傳神語預言士遜未來發展，而日後張鄧公果為相。《玉壺清話》成書於元豐元年（1078），可見直至北宋神宗時，京西地區雖近開封，然淫祠祭祀仍不絕，且設立雄偉，而巫師為主其事者並且為神明發聲傳話。張士遜雖身為讀書人，但對於民間信仰仍不免俗的好奇觀看，況為一般百姓，此事之傳載，更加強地方淫祀之風。

⁶⁷⁰ 龍群、潘欣頌，〈巫的含義、特徵、發展和傳承方式一兼以新疆為例〉，《百色學院學報》，第20卷第4期，2007年8月，頁35-39。

⁶⁷¹ (漢)許慎，《說文解字》（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經部》，冊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臺三版），卷5上，頁4-5，總頁40下。

⁶⁷² 劉蘭婷，《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巫術心理探究一兼論中國巫術心理的發展》，蘭州：蘭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年6月，頁8。

⁶⁷³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收入《湘山野錄、續錄、玉壺清話》合刊本。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卷1，頁9。

當然，並非所有的巫師皆行事正當，亦有巫師施法害人，使人心生畏懼以斂財，如《夷堅志》載：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為一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盡作糞臭。」……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

674

鄧城縣在襄州府城北二十里，時有巫師能以巫術敗酒，開酒坊者皆畏之，每歲春秋皆奉其錢物，每年一家二萬錢，而巫師賴此為生。某次因有急用再求坊主與錢，然被拒之，巫師遂壞酒坊之酒。正值道士經過，焚香做法以解救之。而巫師的下場極慘，道士施法上告玉帝「百日內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巫師遂生腳瘡，無法行走，身有惡臭，以行乞為生，「歷十年乃死」。由此觀之，宋代道士有取代巫師角色之勢，亦能施行法術，以此例而言，道士法力更在巫師之上。

鬼怪作祟亦時有所聞，或告人未來或預示生死，例如宋人賈直孺，襄州居喪，聽到家中似乎有人呼「侍中」。而為其父尋覓葬地時，亦有人前引曰：「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時，鄰婦亦稱呼其為賈侍中。賈直孺沒多久也真的成為侍讀學士、給事中。三呼侍中為偶然，抑或是鬼告之乎？⁶⁷⁵宋人筆記為此事憑添靈異傳奇。而另一例則為鄧州崔公誼被索魂一事，史載：

⁶⁷⁴ (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 10，〈十三事·鄧城巫〉，頁 1，總頁 322。

⁶⁷⁵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卷 47，〈休祥夢兆一·賈直孺〉，頁 13，總頁 874-399。

崔公誼者，鄧州德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因舅氏賈魏公蔭，補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急叩門……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迨開門，寂無所覩。……崔度其必死，遂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⁶⁷⁶

夜半叩門者，不明來者何人，僅告知崔公誼為河北地震中壓殺人數之一，因崔公誼先行過河，故未遭死傷，然已收其魂魄於泰山，公誼次日即死。可見宋人認為壽終之時為天注定，來者索魂與之應答，終難逃一死。人將死必見鬼神真可信焉？對此，宋人亦有破除迷信的說法。謫官監均州酒的尹洙，「因得疾，以後事屬范仲淹」，一旦，尹洙感知死期將至，遣人招范希文，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不久告知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⁶⁷⁷

（三）各類宗教信仰雜揉

民間信仰除了原始自然崇拜外，尚與其他宗教及地方神祇與傳說相互雜揉，衍生出更多元豐富的信仰與宗教觀。例如由佛教教義衍伸出有關現世報與果報觀，在襄陽地區亦有類似的案例，足以說明民間百姓有此種信仰觀念，如史載：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縫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鐵爪使爬土，或糞諸布囊，以錐刺之。

⁶⁷⁶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收入《湘山野錄、續錄、玉壺清話》合刊本），卷中，〈崔公誼蔭補任丘簿〉，頁31。

⁶⁷⁷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卷10，〈尹洙以後事屬范仲淹〉，頁12，總頁1036-407。

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
獄具，以倡非正堂，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
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為野犬齧墓，揭棺銜
首，擲之縣門外而去。⁶⁷⁸

由上文敘述，可知張三之妻虐殺奴婢、數名妾室甚至媳婦，手段兇殘，其後被正法，而張三因縱容其妻暴行，隨後亦得病，左肢殘廢，顏面神經失調，涕淚失控且就食困難。三年卒後葬之，卻被野犬齧其墓，使其屍首分離。故事雖未指明張三與其妻為受因果報應，然而張三之妻因殺害數人而在現世受到應得的處罰，張三雖未殺人然猶如共犯，須承擔共業，而所受報應更為淒慘，死後不得安葬，還需受椎刺齧齒之罪。

另一例則除果報思想外，亦雜以菩薩顯靈一事。唐州有娼名馬望兒，以能柳歌耆卿詞，著名籍中。望兒死時，「未及歛，輿置空室中」。隔日買棺至其處，發現望兒身赤裸，「乃在門掩間，倚壁立。」而人謂其為娼時，少年來遊，或謝錢不如意，剝取其衣冠，「是以及此報」。可見當時人認為馬望兒未入殮而身赤裸是因生前所為之報應。而馬望兒之子「名運，居宜都田間」，紹興二十七年（1157）六月，於烈日下的田中，突然雲罩其身，見菩薩現身，未久，「運已仆於地，親身之衣皆焚灼，而汗衫碧裙無傷」。隨後，「入一民家，猶呻吟稱苦，數聲遂死，時年三十四」。⁶⁷⁹是故，馬望兒之子亦未能倖免，同遭衣毀人亡之報應。

（四）民間人物崇拜信仰

民間信仰中還有一類為人物崇拜，所謂人物包含古今歷史人物，類型大致可分為古代君王、賢臣良吏、英雄武將、文人詩人等。因感念這些人物對地方的貢獻，並彰顯其賢德以為後世之師法，而為其立祠建廟，進行追念與從事祭祀活動

⁶⁷⁸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 15，〈十七事·犬齧張三首〉，頁 5-6，總頁 1264-741~742。

⁶⁷⁹ (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 19，〈十三事·馬望兒母子〉，頁 10，總頁 1265-123。

之現象，將人物神格化則為崇拜行為。襄陽地區各州縣亦留有許多歷代前朝的帝王先賢之祠廟，如襄陽府有「楚昭王廟」、「漢高廟」、「劉表廟」、「諸葛威烈武靈仁濟王廟」、「關將軍廟」等，鄧州有「申大夫廟」祭申包胥、「李靖廟」，均州有「唐濮王泰廟」，房州有「尹吉甫廟」，光化有「蕭相國廟」祭蕭何等。⁶⁸⁰

宋代當朝人物亦有死後立廟建祠者，最靈異與著名當以寇準之事見於史籍。寇準貶死雷州，喪還，過荊南公安縣，民懷其德，為寇萊公立祠。而鄧州亦為其立祠，據載：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夾子忽就櫟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榜示百姓，依舊祭享。⁶⁸¹

鄧州當地人士因感懷寇準德行，為其立萊公祠。知州陳和叔有閉廟禁祀之舉，而萊公顯靈，仍享祭祀，此事甚為靈異，卻也提升寇準由人格化轉為神格化。

民間信仰當不只上述幾類，然而因其信仰內容龐雜繁複，並傳承融合歷朝歷代各宗派之教義思想，故難以一一細述。對平民百姓而言，所謂民間信仰則是取其對於自身生活具有實用價值的部分，亦即祭祀祈求靈驗或發生神蹟顯示者，才加以取信。而這些民俗信仰充實豐富著百姓日常生活，並帶給民眾心靈上的慰藉與寄託。

⁶⁸⁰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82，〈襄陽府〉，頁 2665；卷 84，〈鄧州〉，頁 2738；卷 85，〈均州〉，頁 2764；卷 86，〈房州〉，頁 2785；卷 87，〈光化軍〉，頁 2801。

⁶⁸¹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 69，〈神異幽怪·寇萊公〉，頁 929。

第五章 結論

以往對於宋代襄陽地區的研究，多注重於政治與軍事戰略價值方面。關於社會經濟與工商業發展方面的研究，總地來說，北宋時期襄陽地區經濟呈現持續且穩定的發展；兩宋之際，因襄陽頻遭戰火，經濟受嚴重破壞；南宋時期當地經濟與工商業發展亦在軍事影響下，極不穩固。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議題，多數為概略性或片斷的描述。故本文以宋代襄陽地區社會生活與文化發展為論述中心，探討要點分述如下。

首先，概述襄陽地區地理自然環境。地理位置上，襄陽地區位居漢水谷地中上游，北接南陽盆地通往華北黃淮平原，西北為秦嶺山地，東南為江漢平原與兩湖盆地。地形上則具有獨特的地理形勢，在河南、湖北間的崇山峻嶺間，襄陽地區為一片平坦的平原地形，故形成天然孔道並成為南北往來之要津。水文上，最主要的河川為漢水，北可由白河往南陽，南則下長江通往江南等地。氣候上，北為溫帶乾燥氣候，近南則為副熱帶濕潤氣候，兼有華北、華南氣候的特色。其後則針對襄陽地區歷代行政轄屬之劃分，以及宋代以前的歷史發展與兩宋時期當地政治軍事情勢作背景說明。

次就人口與移民而論，戶口數量於北宋承平時增加迅速，尤其神宗至徽宗崇寧元年(1102)，為全國增長最快速的地區。南宋時戰亂紛起，紹興三十二年(1162)因宋金交戰造成戶數僅崇寧元年時的五分之一，至嘉定十六年(1223)更銳減為六千兩百五十二戶。移民則填補了本地原有人口的不足，北宋初期的移民主要受朝廷政策影響，為了削弱北漢與遼國政權的實力，因而採行遷移北漢及遼境之人戶於襄陽地區。此外，為了改善自唐末五代以來土曠民稀之景象，太宗至仁宗年間，多次下詔招集流民墾荒，尤其唐鄧地區，在地方官員興修水利改善生產條件下，吸引淮南、湖北、河東等地的貧民百姓前來居住開墾，遂達到充實人戶的效果。兩宋之際，靖康之難造成大規模移民浪潮，襄陽地區因位於南北往來之交通孔道，因而成為接納北方南逃軍民的第一線。隨著宋金戰事激烈，百姓四散潰逃，

襄陽境內多為派駐的南、北軍。至端平年間，因宋蒙戰爭兵端復起，戰事越烈，荊襄一帶猶如荒地。

再論風俗民情與節慶方面，襄陽地區因四通八達，南北移民匯聚於此，帶來多元豐富的文化，加上地處巴蜀、秦隴與荊楚文化三大文化邊緣區，尤其北接河洛、關中，南為荊楚發源地，故其民實兼有秦楚之俗。人民性格上亦呈現極端現象，兼有南北氣質，如朴檢梗直亦好利夸奢、文野兼雜、淳頑相半。當地民生物產豐富，主食原以稻米為主，南宋時北人南下，因不喜食稻米，故改種粟、小麥等糧食作物。果蔬類有枇杷、柑橘、黃橙、鮮筍等等，此外因有漢水流經，漁產豐富，尤以鮪魚為當地名產，襄人亦食鼈魚，部分漁獲則喜製成魚乾，以延長保存時限。飲品方面喜飲茶、酒，尤其房州等偏僻山區，民多飲茶以防受瘴癘侵襲，酒類幾乎各州皆有產，然而多僅知酒名，未能曉其釀製之法，其中以襄州宜城春天所出的竹葉酒為當地佳釀。百姓平日多著麻布衣，天寒雪日可能著皮裘以禦寒。住屋方面，因襄人不善於製陶瓦，多利用當地盛產的竹子製成竹瓦，蓋為竹屋，至於經濟條件較差者，則多居茅屋，襄陽城內及官舍、廟宇、州縣學舍等建物，才較多瓦屋。江漢地區本有好游之風，因此每逢歲時節日不免慶祝宴飲一番，而春季更是百姓白日踏青賞花，及夜晚至漢水大堤賞月踏歌的好時節。而穿天節於漢水弄珠灘撿拾圓孔石子以求子的活動，更是襄陽特有的習俗。

在地方勢力與社會秩序方面而言，通常在政府中央與地方之間有一族群因有著資源優勢，因此主導著政府與百姓雙邊溝通以及地方社會控制的作用，形成一股民間勢力。擁有經濟實力者為富族，而擁有文化、社會資源者則為士族。整體而言，北宋一百六十八年間，襄陽地區大家族甚少，如王之望家族五代居襄陽實屬少數。進入南宋接連不斷的災禍，大家族更形缺乏，因此襄陽地區相較於兩京、四川、東南地區等社會經濟與文教發達地區而言，不僅家族代數不深，且家族勢力與社會、文化實力則較為薄弱。襄陽地區主要因兵戎之禍不斷，以農業生產為主，故不利於商賈聚財，文教不盛故士子產量少，難以形成士人圈。且大族間專意於個人榮祿，不注重鄉里建設與文教發展，使得鄰里之間難以形成一股愛鄉愛

土的共識及向心力。若家中子弟得以中舉，在朝為官，更是舉家遷往經濟文教發達之區，並積極投身當地士人社會中心，如此種種之因素，自然不利於襄陽地區大族長存以及地方勢力的拓展。在社會秩序的維護上，以豪族、富族而言，仍有部分屬於樂善好施、扶弱濟貧之人，然而多半僅捐助本族之人，對於地方上之貢獻有限。此外亦有危害鄉里，成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大族在地方上的勢力較為衰弱，因此形成不同的社會群體掌控襄陽地區社會秩序與地方發展。以北宋而言，地方官員對當地建設起了不小作用。雖官吏任期不長，但若積極施行政策，鳩集百姓建設鄉里，往往成效卓著。此外，宗教團體平時開闢田畝，贍養百姓，戰時則因寺院多位在深山窮谷之區，不僅可結寨自保並接納官員百姓，戰後僧侶則致力於恢復社會經濟與促進地方安定。至南宋時期，襄陽成為前線地區，如此特殊社會背景下，掌控社會秩序者除了派駐的官員與將領外，出現了一批民間武力集團，可能為地方鄉民義勇或土豪，為了保家衛民，手持干戈投身戰場，對於地方安定付出貢獻；另一類則為因戰亂形成的流民所組成的武裝集團，由於成員複雜，大多數皆四處流竄、剽掠州境，對於地方社會秩序之破壞及社會經濟的危害極大。

至於文化發展方面，就學術教育活動而論，宋代襄陽地區官學教育的發展與教育機構的設立，多與仁宗慶曆、神宗熙寧與徽宗崇寧年間三次大舉興學有關，在政府積極興學下，幾乎襄陽各州皆有設學，尤其襄州州學規模宏大偉麗，建制完善，教學設施與日常所需生活機能皆一應俱全。至於縣學設置方面，以襄州設置數量最多，其餘各州地處偏遠，或屬山區，如均、房、隨州則未設縣學。縣學的設立主要與地方官員積極辦學有關，由於地方州縣常囿於財政不足，需籌措經費並招集人力、物力才得以興學，因此縣學設立實屬不易。雖然州縣學在數量上並不算太差，硬體設備亦有所改善，然而據大觀年間朝廷選材，本地卻無中舉者，可見學生素質與師資等質量方面仍有待加強。至於在官學不發達的地區，想要接受教育，則需倚賴地方上富族或大族所提供的教育資源與豐富藏書，或者離鄉至文教事業較為發達的州縣負笈求師，並儘可能拓展人際關係，結交公卿士子，藉

以融入當地士人社會中心。

藝文發展與成果方面，襄陽之藝文發展可說至唐代達於頂峰且人才輩出，時至宋代，受前朝戰亂影響，宋初社會經濟尚未恢復，藝文發展也因此較為沉寂，且人才多集中於襄州。在文學上，如魏玩、魏泰姊弟、米芾、張嶠、王之望等喜好寫作，並有著作或詩稿傳世。其中魏玩為宋代少有的女性作家，雖為官宦夫人，詩詞創作多抒發個人情感，然而情意真摯，大膽表露內心獨白與女性自我意識，在當時仍是不可多得的女詞人。在書畫上，則以米氏父子最為著名，米芾書法堪稱一絕，繪畫亦有新意，極富個人風格，並獨創水墨點染繪成煙雲之技法。其子米友仁承襲米芾「米氏雲山」之獨特畫風，並予以變革發展。此外，被神宗評為本朝第一的張友正，名氣雖不如米芾響亮，然而其專意於書法，自成一格，頗有古人筆法之氣韻風範。另外在工藝方面，襄陽地區在漆器、墨、硯及蠟燭等工藝製作上，有獨步一時的精妙技法，成品精美，除了實用價值之外，部分藝品甚至具有藝術收藏價值。可惜許多名揚一時的工藝技術，至南宋時期，因戰亂工匠百姓四散奔逃，技法遂為失傳且史籍不載，難以一窺堂奧。

最末，則論宗教信仰，佛、道教與民間信仰兼而有之，然而整個襄陽地區因極早受佛法的洗禮，自東晉道安於此講經弘法十五年，使襄陽成為當時佛教中心，一時間寺院林立，至宋仍存有東晉時所建的寺院，而寺院主要以襄州數量最多且最為密集。道教在襄陽地區的發展，相形之下不若佛教發達。主要以均州武當山為據點，因宋代相傳武當山為真武飛昇成仙之所，加上相關傳說與經典的刊刻，使其宗教地位大為提升，成為日後著名的道教勝地。除佛、道教之外，民間信仰亦充斥著襄陽百姓的日常生活。所謂民間信仰並非宗教，而是特定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主要以鬼神信仰和崇拜為核心的民間文化現象。其信仰內容龐雜，舉凡原始自然崇拜、祭龍神祈雨、巫覡信仰、民間人物崇拜信仰，甚至雜揉各類宗教信仰等，對於百姓而言，所謂信仰取決於實用的價值上，並得以改善並創造美好生活，希冀帶來內心的平靜與心靈的寄託。

由上述襄陽地區之社會文化發展概況，主要可歸結為下列兩項主要特色：

1.南北文化兼容，具有二重性。由於襄陽地區地跨秦嶺淮河南北，在自然環境方面，地形上為山地與平地的過渡地帶。水文上，漢水雖屬長江流域，但漢水支流可上溯河洛地區，溝通長江與黃河水域。在氣候上，因介秦嶺與淮河一月攝氏零度等溫線分界之間，兼有華北與環華南氣候特色。社會文化深受北秦隴與南荊楚文化之浸潤與影響。表現在民風語言上則是兼有秦楚之俗，民多秦音卻好楚歌；人民性格上，則是兼具南人與北人氣質；飲食方面則米麥兼食；歲時節慶雖類同汴京，然而亦保有荊楚依農時祭祀等習俗；宗教上雖受佛教影響較深，卻雜有荊楚尚鬼之遺風；而學術教育上，則主要往文教發達地區依附，無分南北學派，河洛、川蜀、浙江、福建等地士人皆有所往來；文學上，不若南方人長於詞章、詞藻華美，較擅長議論之文，文辭簡練樸實，然而詞風清麗。

2.具有流動性與不穩定性。此種特色主要受戰爭影響而來，因戰爭促使移民人口帶來不同文化與社會習性，因此社會及文化發展具有變異性，卻難以穩定持續發展。表現在社會風俗上，雖雜有多元文化，卻難以維繫當地特有的風俗；在工藝技術上，雖有良好且精細的手藝，因人民流動性強，亦無法傳承保留下來；在社會秩序上，由於在如此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各類地方勢力以不同形式操控並影響著當地社會秩序。緣是此故，襄陽地區比起他處，時有變易且較為動盪不安，這使得整體社會環境與地方秩序更形紛亂。

綜上所述，襄陽既然自古為軍事戰略要地，自漢至隋唐，此地亦不乏戰事發生，然而戰後政府多能致力恢復民生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並未因戰爭而有所阻礙。尤其唐代時期，交通繁盛，商賈雲集，行人遊客，絡繹不絕，騷人墨客，紛至沓來，當地更是人才輩出，為襄陽留下斑斕絢爛的詩章。及至宋代，雖歷經五代時期之紛亂，宋廷亦致力恢復當地社會經濟，然而整個北宋超過百年的時間，襄陽地區社會文化卻未見長足發展，甚至重要性日益低落。南宋時期的宋金、宋蒙戰爭，對此地的社會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甚至降為荒落之地。造成襄陽地區社

會文化衰弱的可能因素眾多，故試作統整為下列四點：

1. 交通路線的轉移。唐時襄陽仍為南來北往要地，無論由南陽陸路北通河洛，西北通關中，往南至江陵，或由水路順漢水東下，經長江流域往江南一帶，皆為便利，且當汴河漕運阻塞時，東南貢賦多經由襄陽北運物資。⁶⁸²然而北宋時，隨著國都的東移，以及經濟重心的南移，交通運輸路線重心亦轉換，在在均使襄陽的交通地位下降。南宋時，國都偏安，交通線轉移至江南運河、長江水系。因此，宋代政治與社會經濟重心的轉移，亦造成交通路線的轉換，襄陽地區南北通衢的重要性被取代，使車馬船隻所帶來的遊人、商販及經濟效應日益減低，經濟難以蓬勃發展，社會文化也不易發達。

2. 文教競爭力薄弱，人才流失嚴重。由於襄陽地區地理自然環境使然，本區農業較為發達，民風則較為樸實保守，除了襄、鄧、唐州，因地近二京，民多從事商賈，習文之人較多外，整體社會文風不盛，政府雖提倡教育，三次興學使襄陽地區州縣有學，然而實際師資、學生素質、教學品質等方面未達標準，士子產量少，難以形成士人圈，因而造成學子與大族們遊學或聯姻皆向外發展，對外依附性強，因此人才流失嚴重，多外移他鄉，更無法提升本地文教學術之風氣。

3. 淪為經濟邊陲地帶，襄陽地區地位下降。北宋時期，因定都汴京，亦有西京洛陽於北方，襄陽雖歷經唐末五代藩鎮割據與亂事，曠野荒田甚多，但宋廷尤其仁宗時致力恢復，因而人戶增長、經濟漸有發展。在交通區位上，仍有陸路北通東、西京，南達荊湖、水路直驅長江的交通便利性，以及南方糧食物資供應京城上的需求，因此，經濟地位並未嚴重下滑。至南宋靖康亂後，北方落為荒蕪之地，而襄陽地區經濟受宋金戰爭影響尚未恢復，加上國都南遷後交通格局的轉變，荊鄂長江幹道上的鄂州日漸興起，成為長江中游重要工商業城市之一，並取代襄陽成為重要貨物轉運中心，襄陽因而落為邊區旁支。整個江漢流域的經濟發展重心南移至江陵再轉為鄂州後，使襄陽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下降，而經濟的

⁶⁸² 《舊唐書》，卷 49，志 29，〈食貨下·漕運〉，頁 2117 載：「是時淮、河阻兵，飛輓路絕，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

不發達，導致社會文教的落後，實亦為主因之一。

4.戰事頻仍與宋廷消極以對。襄陽地區於兩宋之際，由地近京畿之地轉為邊防重地，先與金國，後與蒙古交戰。襄陽城被金國攻破後，高宗紹興四年（1134）由岳飛收復經理，然而紹興至孝宗乾道年間，荊襄地區猶為榛莽遍野、猛虎出沒的地帶。其後在孝宗銳意恢復下，襄陽經濟略有回復。六十年間戰火稍息，至理宗紹定時期（1228-1233），做為緩衝的金國滅亡後，宋蒙關係開始尖銳化，此後宋蒙戰事頻仍。對於北邊頻仍戰火，宋廷多採消極態度，加上財政的支絀、軍費的浩繁，已無力對戰事頻仍且已成荒地的邊區多加建設。宋朝甚至曾採取種植林木之作法，作為隔絕宋金交通屏障之用。如紹熙二年（1191），光宗曰：「淮上一望都無阻隔，時下栽植榆柳，雖未便何用，緩急亦可為藩籬。」三年正月，則「詔兩淮、京西、湖北、四川統兵主帥並本路帥憲，密切差人點檢各處近邊私小便路，有礙邊防去處，共同措置斷塞，多種林木，令人防守，州縣常切巡察，不得容人行往。」⁶⁸³若要達到以林木隔絕之效果，非短短數十里可行，少說需百里，京西沿邊之地全成林地猶如荒漠，並嚴禁行人往來，如無經濟建設又何來社會文化之發展。度宗咸淳四年到八年間（1268-1272），京湖地區亦曾採取堅壁清野的政策，⁶⁸⁴襄陽地區更形荒蕪。

此外，不同於歷代前朝，戰爭型態的改變，戰備武器、砲石的製造與運用，如回回砲等，使戰爭對城池破壞性加劇，加上蒙軍戰力精強、戰術靈活，攻掠後，輒以擄民焚城，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與破壞，地方經濟之恢復極為不易。戰爭帶來經濟型態的轉變，安土重遷的農戶被往來行走的商販所取代，邊區仍有經濟上的交易，卻無益於當地社會民生之發展，社會不安定、經濟不發達，吃不飽穿不暖，遑論讀書識字及各項文化產業，無怪乎自南宋時期，襄陽地區未有人材取士，世家大族有能力者幾已搬遷至安定地區，遠避戰端，僅剩流民佈滿境內，苟且偷安只求溫飽。

⁶⁸³ (宋)徐松輯，《宋會要》，兵 29 之 44，〈備邊三〉，頁 7300。

⁶⁸⁴ 李天鳴，《宋元戰史（二）》，頁 1096。

當然，或許不僅止於上述四點因素，但的確這些因素皆限制著襄陽地區社會文化的發展，也因此即使歷經北宋百年承平之時，雖經濟水準有所提升，對於社會文化上的發展仍然有限。至於南宋時期，襄陽地區與金國、蒙古間的戰役，更是嚴重打擊甚至破壞襄陽地區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



參考書目

一、史料

(漢)毛亨，《毛詩注疏》，30卷、卷首1卷、考證1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漢)許慎，《說文解字》，30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經部》，冊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臺三版。

(漢)劉向，《列仙傳》，2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5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漢)劉向，《說苑》，2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9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東漢)班固，《漢書》，100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2版。

(劉宋)范曄，《後漢書》，90卷、至30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11月3版。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40卷、目錄1卷、附錄2卷、水經注箋刊誤12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7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10卷、附雜說1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梁)沈約，《宋書》，100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2版。

(梁)宗懷，《荊楚歲時記》，1卷，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3025，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初版。

(梁)釋慧皎，《高僧傳》，14卷，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冊50，台北：大藏經刊行會，1983年1版。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50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11月再版。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71卷，江南圖書館藏日本活字本，《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8月臺1版。

(唐)皮日休，《文藪》，1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4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6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唐)李肇，《唐國史補》，3卷、目錄1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唐)杜佑，《通典》，20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0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唐)房玄齡等，《晉書》，30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2版。

(唐)姚思廉，《梁書》，56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11月再版。

(唐)魏徵，《隋書》，85 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月 2 版。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30 卷，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冊 50，台北：大藏經刊行會，1983 年 1 版。

(後晉)劉煦，《舊唐書》，200 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5 年 3 月 4 版。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29 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6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

(宋)王之望，《漢濱集》，16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3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10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7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100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0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王珪，《華陽集》，60 卷、附錄 10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王得臣，《塵史》，3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200 卷、補闕 10 卷、校勘記 52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 版。

(宋)王應麟，《玉海》，204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4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16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294 卷、附錄 12 卷，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 版。

(宋)石介，《徂徠集》，20 卷、附錄 1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朱弁，《曲洧舊聞》，10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朱熹，《朱子語類》，140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0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朱熹，《晦庵集》，100 卷，目錄 1 卷、續集 5 卷、別集 7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朱熹，《詩集傳》，20 卷，收入《四部叢刊廣編》，冊 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初版。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63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米芾，《海嶽名言》，1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米芾，《畫史》，1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米芾，《硯史》，1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8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吳自牧，《夢粱錄》，2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吳泳，《鶴林集》，4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7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10卷，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 版 2 刷。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18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呂祖謙，《東萊集》，15卷、別集 16卷、外集 6卷、附錄 3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20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4 月初版。

(宋)李昉，《太平御覽》，1000卷，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子部》，冊 1-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臺 1 版。

(宋)李昉，《太平廣記》，50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25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3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初版。

(宋)李曾伯，《可齋雜稿》，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84，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6 月 1 版。

(宋)李曾伯，《可齋續稿》，34卷，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84，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6 月 1 版。

(宋)李廌，《濟南集》，8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李綱，《梁谿集》，180卷，總目 1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600卷，新定本，台北：世界書局，1964 年 9 月再版。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首 1卷、200卷、附錄 5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4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周密，《齊東野語》，2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初版。

(宋)周輝，《清波雜誌校注》，12卷、附錄 1卷，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9 月 1 版。

(宋)孟元老，(民國)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10卷，香港：商務印書館，

1961年初版。

(宋)岳珂，《金佗粹編》，28卷，附續編3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4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邵伯溫，《聞見錄》，2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17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3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臺三版。

(宋)洪邁，《夷堅志》，50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264-12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初版。

(宋)胡子，《漁隱叢話》，前集60卷、後集4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胡宿，《文恭集》，4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20卷，收入《四部叢刊續編·集部》，冊45，1976年1版。

(宋)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55卷，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24，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1版。

(宋)范鎮，《東齋記事》，5卷、補遺1卷、附錄3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30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冊2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臺三版。

(宋)徐自明著、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4冊20卷，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版。

(宋)徐度，《卻掃編》，3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250卷，光緒四年歲次戊寅越東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9月初版。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4卷、附志1卷、後志2卷、二本4卷、考異1卷，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史部》，冊1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1版。

(宋)祝穆，《方輿勝覽》，70卷、目錄1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7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袁說友，《東塘集》，2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5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馬永卿，《嬾真子》，5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高斯得，《恥堂存稿》，8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8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張守，《毘陵集》，15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27，台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張耒，《張耒集》，10卷，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版。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1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張嶠，《紫微集》，36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3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張端義，《貴耳集》，3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莊綽，《雞肋編》，3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版。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4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6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彭汝礪，《鄱陽集》，4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曾慥，《樂府雅詞》，3卷、拾遺2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9，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曾鞏，《元豐類藁》，50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4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臺三版。

(宋)黃庭堅，《山谷外集詩注》，14卷，收入《四部叢刊續編·集部》，冊3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1版。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2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葛勝仲，《丹陽集》，24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2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董道，《廣川書跋》，1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鄒浩，《道鄉集》，4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2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15卷、附錄5卷，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8月1版。

(宋)綦崇禮《北海集》，46卷、附錄3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3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14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8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193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69-47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歐陽忞，《輿地廣記》，38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7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宋)歐陽修，《新唐書》，225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2版。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153 卷、附錄 5 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49-5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

(宋)蔡戡，《定齋集》，20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鄭獬，《鄖溪集》，28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22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6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韓維，《南陽集》，30 卷、附錄 1 卷、行狀 1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0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109 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6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臺 3 版。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1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8，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宋)蘇軾，《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25 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5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

(宋)蘇轍，《欒城集》，50 卷、後集 24 卷、三集 10 卷，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 5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臺三版。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10 卷、佚文 1 卷、附錄 1 卷，收入《湘山野錄、續錄、玉壺清話》合刊本，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 1 版。

(宋)釋贊寧，《筍譜》，1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金)李俊民，《莊靖集》，10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元)佚名，《兩朝綱目備要》，16 卷，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冊 10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出版年不詳）。

(元)姚燧，《牧庵集》，36 卷、附年譜 1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0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348 卷，武英殿本，台北：新興書局，1963 年 10 月初版。

(元)脫脫，《宋史》，496 卷，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版。

(元)陸友，《墨史》，3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元)程鉅夫，《雪樓集》，30 卷、附元史本傳 1 卷、年譜 1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0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元)劉祁，《歸潛志》，14 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3 卷，收入《道藏要籍選刊》，冊 7，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1版3刷。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174卷、續稿207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8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明)吳道邇，《襄陽府志》，明萬曆十二年刊本，8冊51卷，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

(明)宋濂等，《元史》，210卷，標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3月再版。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52卷、附圖9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7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明)李賢，《明一統志》，9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72，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12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7，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明)張恒，《(天順)重刊襄陽郡志》，全4卷，明天順三年(1459)刻本，收入《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明)陳耀文，《花草粹編》，24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90，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明)薛剛修、吳廷舉續修，《湖廣圖經志書》，全20卷，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1991年1版。

(清)王夫之，《宋論》，15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

(清)吳式芬，《金石匯目分編》，20卷，收入《石刻史料新編(二十八)》，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初版，

(清)孫灝、(清)顧棟高等編纂，《河南通志》，80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36，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17類，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10月初版。

(清)徐乾學編，《資治通鑑後編》，184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43，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清)張仲炘，《湖北金石志》，14卷，收入《石刻史料新編》，冊16，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初版。

(清)清聖祖御定，《御定全唐詩》，900卷、總目12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24，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8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7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版。

(清)陳衍，《元詩紀事》，45卷，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初版。

(清)章學誠，《(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4卷、未成稿1卷，據民國十一年(1922)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6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1000 卷、拾遺 75 卷、續拾 16 卷、札記 2 卷，台北：大通書局，1979 年 7 月 4 版。

(清)蔣光祖，《鄧州志》，24 卷、首 1 卷、末 1 卷，乾隆二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初版。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130 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6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 版。

二、近人論著

甲、中文

(一) 專書

丁寶齋編，《襄樊名城保護與建設》，出版地不詳：人民出版社，1993 年 9 月 1 版，383 頁。

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 11 月、1990 年 5 月 1 版，463、727 頁。

王益匡，《中國地理》上、下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70 年 10 月臺 7 版，789 頁。

王益匡，《長江》，台北：正中書局，1957 年 7 月初版，125 頁。

王晴佳，《台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台北：麥田出版，2005 年 5 月初版，267 頁。

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9 年 6 月 1 版，545 頁。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1 月臺 3 版，433 頁。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 年 1 版。

甘霖，《變局——前 11 世紀以來至 21 世紀中國區域發展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 1 版，313 頁。

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台中：高文出版社，2004 年 1 版，496 頁。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2 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年初版，817 頁。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年 4 月初版，181 頁。

朱瑞熙等著，《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8 年 8 月 1 版，451 頁。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 1 版，692 頁。

李天鳴，《宋元戰史》，4 冊，台北：食貨出版社，1988 年 3 月 1 版，2199 頁、

附圖 189。。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0 月 1 版，503 頁。

杜瑜，《中國經濟中心南移：唐宋間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台北：五南，2005 年 4 月初版，545 頁。

周振鶴編、李昌憲著，《中國行政區域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 1 版，800 頁。

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年 3 月初版，514 頁。

周積明主編，《湖北文化史》，2 冊，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2 月第 1 版，1477 頁。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 2 月 1 版，680 頁。

季嘯風，《中國書院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8 月 1 版，1083 頁。

尚園子、陳維禮編著，《宋元生活掠影》，瀋陽：瀋陽出版社，2002 年 1 月 1 版，317 頁。

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 月 2 版，278 頁。

林文勛，《宋代四川商品經濟史研究》，昆明：雲南大學，1994 年 1 版，274 頁。

金毓黻，《宋遼金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臺 1 版，124 頁。

南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南陽市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 月 1 版，962 頁。

姜彬，《吳越民間信仰民俗：吳越地區民間信仰與民間文藝關係的考察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年 1 版，685 頁。

姜道章，《湖北棗陽鄉土志》，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06 年 7 月初版，368 頁。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 年 1 版，720 頁。

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1 版，862 頁。

胡阿祥等著，《兵家必爭之地：中國歷史軍事地名要覽》，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年 8 月 1 版，664 頁。

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1 版，499 頁。

苗春德主編，《宋代教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 版，530 頁。

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台北：帛書出版社，1985 年 3 月出版，171 頁。

張偉然，《湖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 1 版，296 頁。

張錦鵬，《宋代商品供給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3 年 8 月 1 版，348 頁。

張錦鵬，《南宋交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1版，392頁。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558頁。

陳高華、徐吉軍主編，《中國風俗通史》冊7，〈宋代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版，885頁。

陶晉生，《宋遼金元史新編》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10月初版，261頁。

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1版，604頁。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529頁。

湖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湖北簡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2月1版，699頁。

湖北省襄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襄陽縣志》，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1版，786頁。

湖北省襄樊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襄樊市志》，武漢：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初版，1048頁。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1版，432頁。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台北：雲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381頁。

程有為、王天獎主編，《河南通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台北：東大，2002年3月初版，384頁。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文化，1982年4月再版，1736頁。

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1版，276頁。

賈大泉、周原孫，《四川通史(五代宋元卷)》冊4，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1994年1版，412頁。

鄒豹君、蔣君章，《中國地理》，下冊，台北：教育部社會教育司，1959年1版。

漆俠，《中國經濟通史·宋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418頁。

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版。

魯文忠、魯偉著，《極品的故事：中國書畫印藝術史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8月1版，259頁。

黎沛虹、李可可，《長江治水》，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454頁。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2月，重印 London: Allen & Unwin, 1936，144頁。

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1版，245頁。

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版，369頁。

（二）論文

1.期刊論文

- 方震華，〈賈似道與襄樊之戰〉，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三十四輯》，台北：蘭臺出版社，2004年7月初版，頁131-152。
- 白俊奎、張學文，〈襄樊市「樊」城得名新探—兼論廩君系巴人的起源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總22卷6期，2001年6月，頁69-73。
- 匡裕徹，〈淺析宋元襄樊戰役勝敗的原因〉，《歷史教學》，1984年4期，頁13-16。
- 艾愷（Guy Alitto）〈論目前在西方的中國地方史研究的趨向〉，《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3年12期，頁439-468。
- 何忠禮，〈試論南宋孝宗朝初年與金人的和戰〉，《浙江學刊》，1998年6期，頁102-106。
- 宋晶，〈武當五龍宮龍神崇拜初探〉，《鄭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8卷第1期，2008年2月，頁2。
- 李雲華，〈民間信仰與宗教〉，《論壇》，第9期，2004年，頁50。
- 杜漢華，〈襄樊穿天節考辨〉，《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頁239。
- 杜漢華，〈襄樊旅遊的形象定位與開發〉，《襄樊學院學報》，25卷3期，2004年5月，頁90-93。
- 周聖弘、周達斌，〈魏玩：詞筆超邁女中才〉，《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7卷9期，2007年9月，頁42。
- 林天蔚，〈南宋時四川特殊化之分析〉，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十六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7月初版），頁599-645。
- 林明敏，〈宋代對兩浙路的經營〉，《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8期，1996年。
- 柯美成，〈襄樊建城考辨〉，《襄樊學院學報》，24卷6期，2003年11月，頁93-96。
- 唐代劍，〈論真武神在宋代的塑造與流傳〉，《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秋之卷，頁43。
- 唐玄之、劉興林，〈中國古代燈、燭原始〉，《中國科技史料》，1998年，卷19，2期，頁59-67。
- 祝建華，〈唐宋時期武當山佛道之爭〉，《武當縱橫》，總127期，2004年12月，頁59。
- 張明華，〈魏夫人的文學作品與宋代貴婦的感情歸宿〉，《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2卷3期，2004年9月，頁60。
- 梅莉，〈武當歷史地位的變遷〉，《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6期，2004年11月，頁666。
- 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文史哲學報》4，1952.12；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
- 傅駿，〈端平年間京湖襄陽地區的戰事〉，《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1期，頁95-101。

曾冠雄，《從化外到門戶——論政權南移與南宋廣西的發展》，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武漢市十里鋪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頁56-59。

黃寬重，〈宋元襄樊之戰〉，收入氏著《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豐，1985年8月初版，頁1-18。

黃寬重，〈宋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頁67-90。

楊果，〈北宋時期主戶與客戶的地理分布——以今湖北地區為例〉，《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6月，頁63-66。

葛紹歐，〈北宋對四川的經營〉，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十六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7月初版，頁523-597。

龍群、潘欣頌，〈巫的含義、特徵、發展和傳承方式——兼以新疆為例〉，《百色學院學報》，第20卷第4期，2007年8月，頁35-39。

魏平柱，〈樊城建城考辨〉，《襄樊學院學報》，26卷1期，2005年1月，頁94-96。

王先福，〈鄧城—樊城演進歷程考〉，《襄樊學院學報》，28卷1期，2007年1月，頁82-85。

羅偉虹，〈中國的民間信仰探討〉，《社會科學》，第8期，1994年，頁55-56。

2. 學位論文

石文濟，《南宋中興四鎮》，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74年6月。

何晉勳，《宋代地方士大夫家族勢力的構成——以鄱陽湖地區為例》，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李天鳴，《宋元襄樊戰役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6月。

李錫全，《南宋福建路的經濟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金強，《宋代嶺南謫宦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4年。

俞垣濬，《北宋前期（西元九七八~一〇六七）太湖流域賦稅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俞垣濬，《北宋前期太湖流域賦稅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年。

馬繼業，《宋代城池防禦探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5年4月。

梁賢章，《宋代邕、宜、融、欽、廉五州控管西南地區的軍事與經貿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陳家秀，《區域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之關聯：探討宋代成都府路》，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陳麗霞，《溫州人地關係：960-1840》，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 年。

陳曦，《宋元時期江漢平原經濟開發若干問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4 年。

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4 年。

馮波，《宋代襄陽地區工商業發展初探》，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

楊宗霖，《宋代嶺南的對外關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廖寅，《宋代兩湖地區民間強勢力量與地域秩序》，武漢：武漢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05 年。

劉瑞光，《魏泰《東軒筆錄》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5 月。

劉蘭婷，《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巫術心理探究—兼論中國巫術心理的發展》，蘭州：蘭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

蔡尤惠，《宋代福建路的對外貿易》，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

蔡惠如，《南宋的家族與賑濟：以建寧地區為中心的考察》，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鄧振男，《三至六世紀江漢地方豪族的發展歷程：以襄陽、江陵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

乙、日文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の地域的展開》東京：龍溪書舍，1979 年。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東京：農業總合研究所，1962 年。

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市：同朋舍，1990 年。

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京都：京都大學，日中國際共同研究，1988 年。

岡崎文夫、池田靜夫，《江南文化開發史：その地理的基礎研究》，東京：弘文堂書房，1940 年。

斯波義信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 月 1 版，據日本汲古書院 1988 年版譯出。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 年 8 月初版。

丙、英文

-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s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中譯本：何炳棣著、葛劍雄譯，《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 版。
- John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85. 中譯本：賈志揚，《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初版。
- Paul J. Smith,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 the Szechwan tea monopoly and the Tsinghai horse trade, 1074-1224*, Thesis (Ph.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3.
-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n of Ming-C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ichard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2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JAS* 42 : 2, pp.365-442, 1982.
-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William Skinner(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32 . 中譯本：施堅雅著，陳橋驛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 Winston W. Lo, *Szechwan in Sung China :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aipei :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Press, 1982.